

学术研究

XUESHU YANJIU



4

一九六三年

評刘节先生的以人性論为核心的唯心史观	金应熙 (1)
論馬克思主义的階級分析方法	张江明 (11)
关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問題	伍仁思 (20)
关于矛盾問題的精髓初探	齐 云 熊茂生 施蔭民 (32)
无产階級階級斗争学說的实质 (讀書札記)	云 阶 (45)
論明代里甲法和均徭法的关系	梁方仲 (49)
氏族的起源及其早期发展	梁釗韜 (56)
略論中日甲午战争中的美帝国主义	谷 南 (67)
重工业以农业为重要市场的意义	王安民 (75)
对“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的一点理解	田璜一 (81)
論农业生产合理布局問題	吳文輝 (87)
批判地对待优秀的文学遺產 (学术評論)	黃达文 (94)
爱国詩人黃居石	謝公惠 (100)

关于学术研究方法論問題的討論 (三)

抽象概念的階級內容例說	唐陶华 (104)
从“循名責实”看孔子的“仁”——与刘节先生商榷	丘陶常 (106)
对开展自然辯証法研究的一些意見	黃友謀 (107)
心理学研究与联系实际	阮鏡清 (110)
对形式邏輯要概括现代思維的一些看法	楊芾蓀 (113)
我看“論”“史”結合	曾庆鉴 (117)

动 态

- 广东教育界座談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問題 (55)
- 广东經濟学会討論农业技术經濟效果的实质等問題 (80)
- 方孝岳作关于中国古代語言学研究方法的学术报告 (86)
- 广东历史学界就刘节的《怎样研究历史才能为当前政治服务》一文观点展开討論 (119)
- 广东古典文学研究工作者座談如何批判地繼承文学遺產問題 (封三)

評刘节先生的 以人性論为核心的唯心史观

金 应 熙

刘节先生在《怎样研究历史才能为当前政治服务》一文^①中提出了一个关于历史研究上的重要的根本問題。这个問題已經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广泛注意和討論。刘节先生的主要論点是：“孔子发现‘仁’，好象牛頓发现万有引力一样。万有引力只能也用公式表示的抽象定律，只可以从各种不同的事实中表现出来。‘仁’呢，也是从‘自古及今’，人类社会上各种具体事件中归纳出来的抽象名詞。”“当时用孝、悌、忠、恕說‘仁’，我們现在就要用阶级友爱等等方面說‘仁’，其为‘仁’一也。”如果用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說来研究历史和历史人物，就是“把我們这时代的问题不恰当地摆在他們身上”，就是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事实的总和”。“如果真正体现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两句話的精神，可能在无形中会减少了许多敌人也不一定。”根据一系列的論点，刘节先生作出如下的結論：“总而言之，阶级斗争的理論用之于当前政治是切实有效的，用以解释古代历史事件，是不是可以不要这样教条化，机械地利用起来呢？这确实成为問題。”

从去年初开始，刘节先生先后发表了《中国思想史上的“天人合一”問題》、《孔子的“唯仁論”》、《墨子的“兼爱”和实利思想》等論文，^②和最近发表的这篇文章，在內容上是密切联系的。四篇文章一起比較系統地重新提出了刘节先生的唯心主义哲学观点和历史观点。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天人合一”問題》中，刘节先生开宗明义即声言要与“按照馬列主义的理論处理中国思想史”的方法不同，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即“天人合一說”的角度来看中国思想史上的問題。刘节先生宣称，他就是要以此为“綫索”去探討中国思想史。这条“綫索”，就是如何从“天性”中追回“人性”（同一篇文章的另一个地方，刘节先生又提出如何从“人性”中追回“天性”的問題），以实现“天性”与“人性”的統一。如果說，在这篇文章里，刘节先生的話还說得隱晦含蓄，那么，在《孔子的“唯仁論”》里，刘节先生就說得稍为露骨些了。他說：“把古代的历史事件样样都糾纏在阶级观点上去，也是不容易搞得通的。”

我們当然不同意刘节先生的这些論点。但是，我們之所以不得不这样不厌其烦地引述刘节先生的这些論点，其一是以保持刘节先生的原意，其二是便于說明討論的实质。

① 见《学术研究》1963年第2期。

② 分别见《学术研究》1962年第1期、第3期，1963年第1期。以下凡引刘文，其不另注明的，均见此四篇。

我們認為，刘节先生的这些論点，实质上是以资产阶级的⼈性論为核心的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它是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論和阶级分析方法相对抗的。因此，我們認為，目前我們与刘节先生关于方法論的爭論，不是別的，乃是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之爭。

刘节先生反对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的⽣要立論根据，是他的人性論。不論是从他的旧著，还是从他近年来的新作，都可以看到他是如何万变不离其宗地以人性观点研究历史。这就是：他認為凡属人类，不論任何时代或任何阶级，都具有共通的善良的人性。这个人性是出于天性而又和天性协调的。

这种“超阶级”的人性論和馬克思主义关于人性或人的本質的学說是根本对立的。現从下列三个方面來說明两种观点的根本分歧。

第一，在人性的生成問題上，刘节先生認為人性既出于天性，自是与生俱来的，而人性与天性协调，故又是不变的。与此相反，馬克思主义認為人性是一定社会生产条件的产物，而且是随社会历史的变化而变化的。

自从人类产生的一天开始，人就不是一种自然的动物，而是一种社会的动物。沒有脱离集体而孤立生活的人，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之中的。把人和其他动物根本区别开来的人的本質，就是人的社会性。所以人性是社会形成的，而不是天生的。

至于人生下来就具有的，那是自然方面的一些特点。这些并不是把人从其他动物根本区别开来的本質。正如馬克思所說：“……‘特殊的人格’的本質，不是人的胡子、血液、抽象的肉体的本性，而是人的社会特質”。^①如果离开社会条件来孤立地考察人的自然特点，那就势必将人看成仅仅是动物的一个类，也就是把人的本質归結为动物的本質。

刘节先生主张人类除了天生的自然特点之外还有天赋的不变的人性，并以孟子所举的“四端”为例。我們認為这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人性是随着社会历史条件而变化的，不同的社会、不同的阶级各有不同的特性，怎么能說人有天赋的不变的本性呢？奴隶社会的人，他的天赋人性是奴隶主的人性呢？还是奴隶的人性呢？以“四端”中的仁來說吧，代表不同阶级的思想家对它就給以不同的解释和内容，这个天赋的仁是孟子所說的仁呢？还是墨子所說的仁呢？

刘节先生的人性生成論，在他自己的哲学观点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他認為人性出于天性。所謂天性，亦即天理，依他的講法即是客体精神的別名，是超越自然界和人类的先驗存在。他把人性消融在这个天性当中，就立刻把人性神秘化了，仿佛宇宙間果真預先就有那么一套“无穷的理則”，而人性則是它的体现和开展。其实这个天性說穿了不过是上帝的代名詞，本身就是不存在的，而刘节先生却要从它当中去找寻和“追回”人性。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版（下同），第270頁。

第二，在人性的內容問題上，刘节先生抽象地談善良人性，說“性之体是理，而其用是情”，“主观中有理有情，仁是兼理与情而言的”，把人性解释为人类共有的理智与感情，而抽去了理智和感情的具体内容。与刘节先生相反，馬克思主义認為“只有具体的人性，沒有抽象的人性”^①。人的理智、感情等等也是社会的产物，受到社会条件的制約和影响，不是抽象的东西。早在1844年1月馬克思就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人并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②一年以后，他又在《費尔巴哈論綱》中說明：“人的本質并不是各个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就其现实性說来，人的本質乃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馬克思并且批判了費尔巴哈的錯誤，即在研究宗教时“撇开历史的进程，孤立地观察宗教感情（Gemut），并假定出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类个体”^③，而沒有看到宗教感情本身是社会的产物。

研究人的理智和感情是不能离开其具体社会內容的。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不同阶级的人有着不同的理智和不同的感情。正如魯迅所說：“……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检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④刘节先生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談論抽象的人性，其所进行的乃是非科学的抽象，即抽去了人性的本質內容——社会性（在阶级社会里即是阶级性）。这种抽去具体內容的抽象人性，并不存在于任何活人的身上，而只能是“存在于哲学冥想的渺茫太空”^⑤的虛构。

第三，在人性和阶级性关系問題上，刘节先生肯定在阶级社会里有超阶级的人性，并且将它与阶级性对立起来，从而否定人的阶级性。他認為哲学思想、道德规范等等都是沒有阶级性的，不受古今的限制和阶级的限制，誰要說这些有阶级性就是抹杀人性，例如他說礼是各种社会共行的秩序，如果把孔子克己复礼解释为恢复周礼，那就是刻舟求剑，把好东西糟塌掉了。

与刘节先生相反，馬克思主义認為在阶级社会中“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沒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⑥。在各个阶级的根本利益針鋒相对的阶级社会中，人的社会性只能通过阶级性而存在。不論在互相对立的阶级的阶级性之中或者在互相对立的阶级的阶级性之外，都不可能再找到任何具体存在的共通的人性。整部人类文明史和当前政治生活中有无数事实証明这一条真理。試問，秦始皇与驪山苦作的刑徒，羅馬貴族与斗兽场中的角斗士，能有什么共通的超阶级的“人性”？我国广大农民为土地改革的胜利而欢欣鼓舞，而許多地主則私藏变天賬，时刻不忘俟机反攻倒算，又那里有什么共通的“人性”？

刘少奇同志在《人的阶级性》中曾經指出：“在阶级社会中，人的阶级性，就是人的本性，本質。”他并且进一步說明，先秦时代許多思想家，对人性問題爭論个不清

①⑥ 均見《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871頁。

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2頁。

③ 恩格斯：《費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終結》，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下同），第52頁。

④ 《魯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164頁。

⑤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96頁。

楚，“就是因为他們不懂得或者故意要掩藏人們这种社会本质（本性）的階級差异。”^①因此，我們就可以明白，在階級社会中，人的階級性和人性就是一个东西，既不容割裂，更不能把它們对立起来。声言強調階級性就会抹杀“人性”的人，正是由于“不懂得或者故意要掩藏”人性的“階級差异”，其实他們所謂“人性”就是某一階級的階級性，“人性”只不过是尖銳的階級斗争中涂上的一层薄薄的保护色而已。

很明显的，刘节先生所主张的抽象的、先驗的、超階級的人性事实上是不存在的。那么，刘节先生所讲的人性实质上是什么呢？

每个讲抽象人性的思想家，在他們所标榜的抽象人性的背后，沒有例外地都隐藏着具体的内容，为一定的階級利益服务的。毛泽东同志說：“我們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资产阶级則主张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們口头上不这样說，却說成为唯一的人性。”^②許多談論抽象人性的思想家正是如此。譬如孟子，他“道性善，言必称尧舜”，还主张“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是标榜抽象人性，可是他讲的性善，却还是有具体的階級内容。他說：“未有仁而遺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孟子·梁惠王》上）又說：“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孟子·离娄》上）这样，孟子的仁义礼智就有了忠君爱亲的具体内容，并且成为他討伐“无父”“无君”的扬墨的思想武器了。同样，在刘节先生的“善良”“人性”背后，自也是有其“呼之欲出”的具体内容。

刘节先生的人性，以理为体，以情为用。其修养的方法，是仁，是忠恕，是克己复礼，是“制服我們的感情，勿使冲动”，“恢复到理知的客观标准”。这里情和理的关系是值得注意的。理来自天理，即所謂“善体客观事物”，是善的化身，情是“发于血气心知，是一种本能的动”，必須加以制服，訓練，使“理能胜情而不失其情”，所以它是恶的化身，只有在經過制服和“理化”以后才能发挥作用。这个理性对欲望的斗争，我們认为即是階級社会中封建統治者与农民的階級关系在道德范畴中的反映。但是刘节先生却从这里引出結論：凡人皆有善性，“人类的感情，在一轉念之間便可以为善的，只要自己有誠意”。因此，对階級敌人也可以行仁政，即所謂真正体现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精神，“可能在无形中会减少了許多敌人也不一定。”唯仁論是“一种如何培养对人类伟大感情的教育哲学……切实近情，易于为有知識的人所接受”，在“礼乐到了沒有人情味”的“礼坏乐崩的时代，其作用尤为重大，因此，应该积极发扬儒家的正統思想，以便“通过共产主义时代”来实现“人文主义的极盛时代”。

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馬克思主义的結論。第一，在这里，人的階級性被輕輕地抹掉了；第二，用階級調和論来代替階級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第三，企图在我們的时

① 刘少奇：《論共产党员的修养》，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附录。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71—872页。

代，恢复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使儒家思想和学说千秋万世。

据我们看来，这就是刘节先生的人性论的实质。

二

刘节先生口口声声要把历史事实的总和，要写对历史的真相，这就有必要考察一下他的历史观点，看看他要写对的是什么历史真相。

大概读过刘节先生解放前的旧著如《历史论》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从他以前的著作中领会他的历史观点，比较容易，而从他近年来的著作中领会他目前的观点，则比较困难。原因是他的近著中有不少地方自相矛盾，或者含糊。有时他好象正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来谈问题，细读下去又全然不是那么回事；有时他似乎也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一类的历史现象，但进入具体论述的时候，就又一推一翻；有时他甚至作出些诸如“人类的社会文化是……为某些阶级服务的”、“孔子是反动的，为当时统治阶级服务的”的论断，一会儿又说什么“孔子和墨子都是为人民说话的思想家”、“说他（孔子）是反动的，我不同意。”这种扑朔迷离的情况，在我们所举的刘节先生这四篇文章中，几乎俯拾即是。因此，要看出刘节先生的历史观点的庐山真面目，就变得颇费周折而不得不多花功夫，从他的含糊、矛盾之中揭示出他的本意所在。

我们认为，刘节先生的历史观点还是从人性论出发的。人性的发展是他心目中历史内在联系的中心“线索”。他认为人性原是出于天性而与之协调的，但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出了问题。“制度推进人性，使合乎天性。……但是制度也有阻碍人性，使不能合乎天性的一面。”怎么办呢？“问题在于如何追回这个人性的。要追回人性是不难的，首先要排除一切障碍，使我们有可能追回人性，使合于天性。”追回人性的结果，就出现了真正的“天人合一”，“人能够当得起是宇宙间的中心”，那就是刘节先生认为与共产主义相当的“人文主义的极盛时代”了。这样，刘节先生就把从人类产生时起直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全部人类史，描述为人性发展的历史。

很明显，这个历史观点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没有任何共同之点的。

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中的决定力量，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

“物质生活底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以及一般精神生活的过程。并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恰好相反，正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着人们的意识。”^①根据这个原理，马克思和恩格斯教导我们要“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②。刘节先生的观点与此相反，他把历史看成是自己所喜爱的观念（人性）的实现过程，以臆想出来的观念的联系来代替历史的现实的联系。物质与精神、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被颠倒过来了，他所安排的人性发展的图案不过是一个唯心主义的虚构。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3页。

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之存在，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又一条基本原理。正如馬克思所說：“經濟的社会形态的发展，从我的立场，是被理解为自然史上的一个过程。”^① 列宁指出：“馬克思把社会运动看做服从于一定规律的自然历史过程。这些规律不仅不以人們意志、意識和愿望为轉移，反而决定人們的意志、意識和愿望。”^② 刘节先生在其近著中大談規律，使用了“自然規律”“人为規律”“社会規律”“客观規律”还有“社会发展的規律”等等名詞。但是，他既然把历史的发展理解为人性体现天性的抽象活动，那就使他所談到的“社会規律”等等都不得不随人性的发展为轉移，从而实际上否定了任何客观規律性。

历史唯物主义認為有文字可考的全部人类历史都是階級斗争史，并且認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創造者和历史的主人。刘节先生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天人合一’問題》中似乎曾經承認人类史后一阶段是階級斗争史，但是随即在他的論述中加以否定，并且坚决不同意階級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在同一篇文章的結論里，他說：“早期的思想家都是鼓吹团结人的力量向自然作斗争，这是人类社会文化向前推进的动力。”他又說：“古代許多有志之士为了爭取人的独立自由而付出很大的代价，在旅进旅退的情况下，也不能說毫无进步。”这两段話里，把人民群众階級斗争的作用估計得很低，等于把自己上面所說的人类史后一阶段是階級斗争史的話实际上取消了。

对人民群众的物质生产实践，刘节先生事实上亦是沒有重視的。他在講到先秦哲学中对人和自然关系的認識时，虽然也提到了“对自然采取斗争的态度的优良传统”，但是他更着重闡述“克明厥心，哲厥德”“恕思以明德”的思想，以为这样就可以从主观方面来掌握自然規律，然后再来掌握客观世界的自然規律。这种不經過生产实践而企图走内心修养的途径来控制自然規律，其实只是主观幻想，事实上只能走上至誠通神、尽心知天这一条神秘主义的道路上。把这样的“修养”竟視为人对自然界斗争的胜利，正充分反映了刘节先生抹杀了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的作用。

在刘节先生的历史观点中，相当重視“主观”的作用。他認為要追回人性，实现天人的合理統一，关键在于主观的努力。他再三提到要把主观与客观相統一的重心放在主观一面，認為这是人本主义的特点之一。

但是，他对主观能动性的理解，和历史唯物主义者的理解是根本不同的。尽管十分重視它，刘节先生仍然不可能正确理解主观能动性的作用。第一，人的主观能动性必須以客观規律为基础。刘节先生作为一个历史唯心主义者不承認社会发展的客观規律，而脱离了客观規律的基础，主观能动性就会成为无法实现的幻想。第二，人类是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去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正因为人类有了实践活动，才有主观能动作用。刘节先生不重視人民群众的階級斗争与生产实践，結果所謂主观能动性局限于个人的思辨活动，失去现实性，只存抽象的能动作用了。这也就談不上实现主观和客观的統一。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5頁。

② 《列宁全集》第1卷，第146頁。

从上述簡略的分析，可見刘节先生所持的乃是以人性論为基础的唯心史观，而且其中的主要論点多半是他的一貫主张。他在旧著《历史論》中就認为“理性支配历史”，說历史是人类意識的发展，历史从客体精神的“理”出发，經過人为，最后复归于“理”，所以历史的第一阶段是从自然法則走向人为法則的时代，而其第二阶段，却是从人为法則返回到自然法則的时代。我們試加比較，就可見除几个名詞稍作更換以外，主要内容都是相同的。

刘节先生现在要求“写对”的“历史真相”，就是戴着他这副唯心史观的有色眼鏡来看的。他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就是以“天人合一”說为綫索，冶述学自述于一炉，企图建立以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相对抗的客观唯心主义的中国思想史体系的。

三

当然，刘节先生在《怎样研究历史才能为当前政治服务》一文中，沒有直截了当地說出反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階級分析方法的詞句，而只是說“是不是可以不要这样教条化，机械地利用起来呢？”这似乎只是提出一个如何正确运用的問題。为了弄明白刘节先生到底是反对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階級斗争理論和階級分析方法，还是只提出如何正确运用的問題，我們認为有必要扼要說明刘节先生在哪些方面反对馬克思主义階級分析方法，并且結合他的四篇文章証明正是由于他反对階級分析方法，也就必然要歪曲历史真相。

首先，馬克思主义教导我們，为了解决社会科学上的問題，“最可靠、最必需、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記基本的历史联系”。所謂基本的历史联系，按照列宁的闡述，就是“社会階級划分的事实，階級統治形式改变的事实”^①。这是誰都无法抹煞的历史事实。我們在进行历史研究时，首先就要牢牢把握住社会階級划分和階級統治形式改变这条基本的指导綫索。

恩格斯說过：“……全部以往的历史，（除原始社会之外），都是階級斗争的历史，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階級，常常是一定的生产和交換关系的产物，一句話，就是自己时代的經濟关系的产物……”。^②因此，为着深入揭发階級关系和各階級形成、成长的过程，我們在进行历史研究时又必須通过足够的可靠資料去分析各种經濟形态的形成、发展及其比重变化的过程和相互关系。

刘节先生显然反对階級分析方法的这一要求。作为一个人性論者，刘节先生是根据人們行动的思想动机、根据人們的道德修养水平来将历史上的人区分成不同集团的。他認为历史上有少数是賢人或善人，他們是受到当时社会的“特权人物”的“残暴”“压迫”的，他們怀抱的“道”是极少见用的机会的，唯有“独善其身”，很少“兼善天下”的希望。执掌政权的人物构成另一个集团，这些人多数是一些暴徒、佞者或假政治家，真

^① 《列宁全集》第29卷，第430、434頁。

^② 恩格斯：《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5頁。

正救世之士是不多的。賢人对于执政者，应该效法孔子，即要“直道而行”，而不要“枉道而行”。刘节先生明白告诉我们，在分析賢人与执政者相互关系的时候，“糾纏在階級观点上”是搞不通的。他的文章中有时也談到“階級”，但并不是从人們在社会生产关系中的不同地位来考察的。在他的著作中，这一部分的历史真相被他完全抹杀了。

其次，馬克思主义又教导我們，階級斗争是全部历史发展过程的基础和动力。在充滿着各种矛盾的階級社会中，只有以階級斗争的理論作为綫索，才能够找出规律性来。应当用階級斗争的观点去分析一切社会問題，包括經濟、政治、宗教、哲学等等問題，因为“一切历史上发生的斗争（不論它是在政治的、宗教的、哲学的領域中发生的，或是在任何其他意識形态領域中发生的），实际上只是各个社会階級彼此斗争的多少明显的表现”^①。

刘节先生絕不承認階級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他認為商末和秦末两次大的人民起义之間，中国历史上只有个别階級斗争事件对历史有点促进作用，主要是由上而下的改革。^②这样，整整九百年中階級斗争在历史发展中的动力作用，实际上被一笔勾銷了。春秋战国时代是我国古代史上一个大变动的时代。当时社会上复杂的階級斗争，在意識形态領域内就反映为百家爭鳴。但是刘节先生却認為这里并没有“旗帜鮮明，你一刀，我一枪，陣脚不乱”的階級斗争。这样，他又把階級斗争放逐到意識形态領域之外去了。

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真的沒有“旗帜鮮明，你一刀，我一枪，陣脚不乱”的斗争嗎？事实上，中国思想史中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是非常鮮明的。例如荀子的哲学思想就和孟子針鋒相对。孟子主张先驗的性善論，荀子則从倫理學上的感觉論而提出性惡；孟子講尽心知天，荀子則提出“天人之分”，說“惟聖人為不求知天”（《荀子·天論》）。这还不是“你一刀，我一枪”的斗争嗎？但是刘节先生却說他們的冲突仅仅在于“尽制”与“尽伦”的区别，并勉强說孟、荀都是講天人合一的。又如柳宗元的《天說》和刘禹錫的《天論》，都明明是对韓愈的唯心主义有神論的反駁，这也是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的斗争，但刘节先生却又勉强說刘禹錫的文章是对韓愈說法的推广，把刘、柳也算到天人合一的学派中去。这都可见他抹杀哲学史上的階級斗争，混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界綫，违背了历史真相。

再次，馬克思主义又教导我們，在考察历史运动时，必須注意分析各种社会思想的階級实质。在階級社会里，不采取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为本階級根本利益辯护的思想家和思想体系，是沒有的。哲学是离开物質經濟基础較远的思想体系，“在这里，观念跟自己的物質存在条件的关系，越来越混乱、越来越被一些中間环节弄模糊了。然而这一联系仍然是存在着”。^③因此，我們研究哲学史，就必须坚持階級分析，結合时代背景分析

①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1卷，第222頁。

② 见刘节：《再論西周社会性質》，載《中山大学学报》1961年第三期。

③ 恩格斯：《費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終結》，第44頁。

每一哲学体系，把模糊的中間环节弄清楚，以便判別它反映哪个階級的要求。

刘节先生認為不代表任何階級、只是“为人民說話”的思想家是有的。孔子就是其中的最伟大人物。他的一条理由是当时的統治階級并不重視孔子，而且还压迫他。我們認為，由于統治階級內部的分工，有一部分人成为統治階級的思想家，他們把編造反映本階級共同利益的思想 and 幻想当作謀生的主要源泉。統治階級的另一部分人对于这些思想和幻想一般說来是准备接受的。但是，在一定範圍內，由于統治階級共同利益和个别統治者私人利益的矛盾冲突，統治階級內部的“这种分裂甚至可以发展成为这两部分人之間的某种程度上的对立和敌視”^①。無論如何，这两部分人的階級利益还是一致的，“一旦发生任何实际冲突，当階級本身受到威胁”的时候，这种敌視便会自行消失。所以，不能因为孔子沒有被統治階級重用就說他不是代表統治階級的思想家。而且，既然如此，那末，刘节先生的“孔子是反动的，为当时的統治階級服务的”的論断，又是怎样得出来的呢？

刘节先生还認為超階級的思想体系是有的。儒家正統思想就是一例。“仁”“禮”等等都是抽象的伦理学上的名詞，对任何階級都适用。馬克思曾說过这样一段話：“把統治思想同进行統治的个人分割开来，主要是同生产方式的一定阶段所产生的各种关系分割开来，并由此做出結論說，历史上始終是思想占統治地位，这样一来，就很容易从这些不同的思想中抽象出‘一般思想’、观念等等，而把它們当作历史上占統治地位的东西，从而把所有这些个别的思想和概念說成是历史上发展着的‘概念’的‘自我规定’。”^②刘节先生正是这样把儒家正統哲学和封建地主階級分割开来，把儒家思想独立化，从而得出完全錯誤的結論。

其实孔子和他的思想是否有階級性，本来是可以不煩言而決的問題。孔子自己把君子和小人、人和民都区分得很清楚。他的仁是专对君子讲的，小人和民都不在內。所以他說：“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論語·宪問》）这种观点，正和古代希腊哲学家論証奴隶缺少慷慨好施的道德品質一样，表露了很深的階級成见。孔子提倡仁的目的，正是为了更好地統治被压迫的群众：“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論語·学而》）提倡孝弟就是为了防止犯上作乱，孔子站在統治階級立場說話还不清楚嗎？

把上面講的綜合起来，可见刘节先生处处与階級分析方法背道而馳。其根本原因在于他在世界观上是和馬克思主义根本对立的。他以人性論来反对階級斗争的理論，他認為历史是人性发展的历史，而不是階級斗争的历史。这样，他的所謂“是不是可以不这样教条化，机械地利用起来”的“确实成为問題”的問題，就不是什么要求正确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階級分析方法的問題，而是根本反对运用階級分析方法的問題了。

由于刘节先生反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階級分析方法，而运用了与階級分析方法相反的資产階級唯心历史观的人性論的方法，他对中国思想史的闡述和論断，都是不合乎历

^{①②} 分別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3、55頁。

史真相的，是一幅严重歪曲真相的图画。

但是，应该指出，这却正是刘节先生根据他的“史意”要求写对的“历史真相”。因为他认历史为人性发展的历史，所以孔、孟以下坚持唯心主义人性论的哲学家便成为他理想中善良人性的化身。而人性的发展是受到人为制度的障碍的，这种障碍就表现为历史上各时代“统治阶级”对贤人、善人的压迫。要排除障碍，追回人性，因此，作为人性体现的贤人、善人，就不应该“枉道而行”，应该“疾当时世俗人的愚妄”，“冲破现实世界的包围”，才能实现天人的合理统一。在这一“史意”的指导下，就不能不把孔子说成为人民说话的思想家，不能不把儒家正统思想说成是中国几千年历史的“坚实而伟大的基础”，不能不力谋抹杀在哲学史领域内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尖锐斗争。

由于刘节先生的历史研究，是以人性论的观点要求的“历史真相”来歪曲历史真相，因此他的文章中就不能不到处出现矛盾和混乱。例如，他一方面认为春秋时代是从封建领主制向封建地主制的转变，又肯定“从政治制度方面，孔子确是保守的，所保守的是封建领主制”，但另一方面又歌颂“孔子的最大长处就在于能够憧憬到封建制度的前途，用最概括而有系统的思想把这种社会的基本精神和实践次第开示给后学”，这样，孔子既要维护濒于灭亡的领主制，又能憧憬封建制度的前途，为封建地主制度设计蓝图，岂不是矛盾的么？又如他说“孔子是继承了一部分的优良传统，这种优良传统就是对自然采取斗争的态度，‘利用厚生’，增加人类的物质财富”。但是同时他又写道：“孔子……他们以为在主观方面掌握了忠恕之道以后，便可以万事大吉，……放弃了利用厚生精神。”究竟孔子是继承了还是放弃了利用厚生精神呢？又如他一方面批评孔子“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两句话，指出“社会的问题不能解决，生活的问题也是不能解决，一切所谓个人修养都是不可靠的”，但另一方面他又说：“这段话极言孔子重视德性，而且可以说是孔子有意向子贡提倡德性之重要宣言。到了实际事情上，孔子也不一定这样忽视现实，真的叫人饿肚子去打战。”显然是赞成孔子这两句话的了。如此等等，矛盾不一而足。

对刘节先生的方法及其研究成果的考察，充分证明了列宁的教导：“遵循着马克思的理論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决不会穷尽它）；而遵循着任何其他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①

由此我们就能进一步认识到，阶级分析方法是研究历史的唯一科学方法，而决不是一个科学方法。把阶级分析方法运用得好，确是并不容易，这里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而必须从事艰苦的钻研和专心致志的研究。在研究中会遇到许多困难，有时一些问题表面看来似乎不能解决，但是，无论如何，决不能背离阶级斗争的理論而遵循任何其他道路。因为方法论与世界观是密切联系的，背离了阶级斗争的理論，就会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的泥坑，结果就必然会象刘节先生那样“只能得到混乱与谬误”。

^① 《列宁全集》第14卷，第148页。

論馬克思主义的階級分析方法

张江明

馬克思主义的階級斗争理論和階級分析方法，对无产阶级和人民革命的解放事业是无比重要的。一切馬克思主义者和拥护社会主义革命的人們，必須把階級和階級斗争理論应用到实际工作和实际斗争中去，也就是說，必須把階級分析的方法，作为看待問題的基本方法。

階級分析的方法，是无产阶级認識革命斗争的基本綫索，是使我們从迷离混沌的社会现象中找到階級本質的钥匙。我們知道，階級斗争在階級社会的发展中起着决定的作用，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只要在社会上还有階級和階級斗争存在，一切社会现象，无论是經濟的、政治的、意識形态的各个方面，实际上都是階級斗争的直接的或間接的表现。人們的思想、言論和行动，无不打上階級的烙印。然而社会现象极其紛繁复杂，不可能一眼望去，就能看得清楚；在现象中还有许多是假象，更容易迷惑人。反动階級为了掩飾它的反动本質，常常采用表面一套，里面又一套，明的一套，暗的又一套的反革命两手办法来欺騙人民，如果我們不会从他們的講話、宣言和決議中，看出他們的階級本質，就会在政治上受騙。列宁指出：“当人們还不会从任何一种有关道德、宗教、政治和社会的言論、声明和諾言中揭示出这些或那些階級的利益时，他們无论是过去或将来总是在政治上作受人欺騙和自己欺騙自己的愚蠢的牺牲品的。”^①学会階級分析的方法，便能从人們的言論、思想和行动中揭露他的階級本質，識破他的真面目。例如，一九五七年，資產階級右派向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专政进攻，是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的。当时曾有人被它所迷惑。但是，一用階級分析方法去看一看，原来“帮助共产党整风”，不过是幌子，实际上是搞資產階級复辟。至于說到革命队伍里面，我們要認清各种站在非无产阶级立场上的人，他們提出的政策、路綫是否离开馬克思列宁主义，同样地不能沒有階級分析。一九五五年，在农业合作化問題上，有人主张“坚决收縮”，“赶快下馬”，說什么不这样“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險”。这些人表面上也是为了工农联盟，为了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实际上却是从資產階級、富农或者具有資本主义自发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出发，錯誤地观察了工农联盟，犯了右傾机会主义的錯誤。事实証明，只

^① 《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版（下同），第8頁。

有毛泽东同志经过深刻的阶级分析而提出的农业合作化的路线，才是唯一正确的路线。

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象一根红线一样贯穿始终，无论是政治、经济和思想等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由这根线联系起来。在社会生活中，每天都充满各种各样的事件，活动着各式各样的人物，而所有这些事件和人物经常地发生矛盾。对待同一件事情，有的人赞成，有的人反对，有的认为“好得很”，有的却认为“糟得很”。这便在社会内部的各阶级之间，不断地进行斗争，在斗争中出现了各个不同时期，如革命时期和反动时期，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等等的更替。这种斗争要到彻底消灭了阶级才告结束。从表面看来，社会生活的发展好像是扑朔迷离，难以捉摸，其实在这些现象里面都有一根线索，这根线索，就是阶级斗争。如果我们紧紧地掌握阶级斗争这根线索，运用它去分析一切社会问题，就能对阶级社会的一切现象看得一清二楚，任何妖魔鬼怪都无法隐藏，他们的原形都要毕露。所以，在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时候，“……必须牢牢地把握住社会划分阶级的事实，阶级统治形式改变的事实，把它作为基本的指导线索，并用这个观点去分析一切社会问题，即经济、政治、精神和宗教等等问题”^①。这样，才能深入地了解各种社会问题的阶级本质，掌握阶级斗争的规律。

阶级分析的方法，是无产阶级分清敌友，辨明方向，确定党的路线和政策的锐利武器。大家知道，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分清敌友，指明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这是革命成败的关键。毛泽东同志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②

要想分清敌友，就必须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对一定历史时期各个阶级的政治、经济和思想状况，以及各个阶级之间的关系，进行周密的深入的系统的分析，以确定哪个阶级是革命的对象，哪个阶级则是革命的依靠和团结的力量，从而制定革命和建设的路线和政策。毛泽东同志就是正确运用阶级分析方法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的最杰出的典范。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就是毛泽东同志的阶级分析方法在政治路线上的具体应用。我们都看见，这条总路线早已胜利实现了。

当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阶级分析方法，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又作了深刻的科学的分析，制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并且提出了关于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的学说，严格地规定人民和敌人两个不同的概念，提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

^① 《列宁全集》第29卷，第43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下同），第3页。

矛盾的不同方針。在我国的农村，根据各个时期的形势和阶级关系的变化，明确规定了土地改革的阶级路线，农业合作化的阶级路线和人民公社运动的阶级路线，指出要巩固和办好人民公社，必须在一切工作中，依靠贫农和下中农，巩固地团结其它中农。要加强各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团结。因而对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这一系列根本问题，明确地解决了。这对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阶级分析的方法，对于革命全局问题，制定党的路线政策问题固然十分重要，就是对局部问题和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政策，同样非常重要。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从事任何革命工作，都不能离开阶级分析。在过去，由于忽视或违背了阶级分析而犯错误的教训是不少的。例如在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有些人犯了右的或“左”的错误，同他们脱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是分不开的。在充满着阶级斗争的社会中进行革命工作，如果不学会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就会寸步难行。就拿调查研究这件事来说，在表面上好似和阶级分析没有什么关系，其实不是这样。调查研究是一件阶级性很强的工作。可以说，阶级分析是调查研究的灵魂。要是没有阶级分析，只是搜集了一大堆材料，要了許多统计数目字，却听不到阶级的声音，摸不到阶级的脉搏，看不见不同阶级的不同要求，这些材料是没有生命力的。有的同志在农村工作，甚至长期搞农村工作，做了不少调查研究（这都是好的），但实际上并不真正了解农民，他们提出来的工作计划和方针政策，常常脱离最大多数的贫农和下中农的意见，仅仅是代表了少数富裕中农的利益。根据这样的计划和政策来做工作，当然会行不通，碰钉子。为什么身在农村而不了解农民，做了调查而并不真正了解情况，重要原因之一是没有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调查研究和认识农民，或者作了一些分析，却不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而是站在资产阶级和富裕中农的立场来看事物，也就走到错误的方面去了。毛泽东同志谆谆教导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阶级分析来作典型调查，解剖麻雀，这是了解情况的最可靠的方法。他自己为我们作出了许多光辉的榜样。就拿无数范例中的一件来说：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到湖南作了三十二天的调查，写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农村各阶级，即地主阶级、富农、中农、贫农和雇农作了极其深刻的科学分析，从阶级观点上说明了对农民运动为什么有“糟得很”和“好得很”两种根本不同的看法，回答了当时党内党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热烈的歌颂农民运动，为农民斗争和中国革命指明了正确的方向。这里正是说明，要正确地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必须进行阶级分析。

阶级分析的方法，是研究当前阶级斗争的根本方法，也是研究历史、认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根本方法。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自从原始共产社会解体以后，“至今所有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①。奴隶阶级和奴隶主阶级、农民阶级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版（下同），第465页。

地主階級、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彼此進行各種形式的階級鬥爭，這是每一個階級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內容，也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的基本內容。階級鬥爭是階級社會發展的动力。要從這一個階級社會發展到另一個階級社會，從有階級的社會發展到無階級的無限美好的共產主義社會，是經過階級鬥爭而實現的。沒有階級鬥爭，階級社會就不會發展，人類歷史就不能從低級階段前進到高級階段。

生活在各個歷史時代階級社會里的人，必然屬於一定階級。例如，在奴隸社會里的人，不屬於奴隸主階級，就屬於奴隸階級，或隸農、自由民，等等。在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里的人，也都是屬於一定階級的人。身在階級社會卻沒有階級屬性的人，是根本不存在的。區別的只是有的人自覺地代表某一個階級，有的人不自覺和沒有認識自己屬於哪一個階級，而實際上卻是屬於一定的階級。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

由階級社會里的人所寫成和提出的政治學說、理論觀點、思想體系、學術著作，都是反映一定階級的利益和要求的。例如，孔子的“仁”學，墨子的“兼愛”說，范縝的“神滅論”，程朱的“理學”，康梁的“變法”主張，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等等，都不是超階級的東西，而是代表某一階級的意见，為它而服務的。有的人沒有公開表明甚至還否認他的理論觀點有任何階級性，但并不因此就可以把它的階級性取消。評定歷史人物及其理論觀點的階級性，既不是單純地看他的階級出身（這有很大關係），又不是片面地以他口頭上的標榜為標準，主要是看他的理論觀點代表哪個階級的經濟利益、政治要求和思想傾向。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一書中，在分析法國革命時期山岳黨所代表的階級實質時指出，“無論他們提出什麼辦法來達到這個目標，無論目標本身塗上的革命顏色是淡是濃，其實質始終是一樣的：以民主主義的方法來改造社會，但是這種改造始終不超出小資產階級的范围。……同樣，也不應該認為，所有民主派代表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小店主的崇拜人。按照他們所受的教育和個人的地位來說，他們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壤。使他們成為小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是下面這樣一種情況：他們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資產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們在理論上得出的任務和作出的決定，也就是他們的物質利益和社會地位在實際生活上引導他們得出的任務和作出的決定。一般說來，一個階級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同他們所代表的階級間的關係，都是這樣。”^①

既然在階級社會歷史的各個方面充滿着階級鬥爭，我們要想研究階級社會的歷史發展、歷史人物及其政治學說、理論觀點的本質，就不能不用階級和階級鬥爭觀點，不能拋掉階級分析方法。離開了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就不能正確認識歷史真相，就要在浩如烟海的历史材料中迷失方向，抓不到歷史的基本綫索。

有人認為用階級鬥爭理論和階級分析方法來研究歷史，就會“教條化”和“機械”，不能“把歷史事實的真相寫對”。這種看法是根本錯誤的。應該認識，用不用階級鬥爭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52頁。

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研究历史，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分水岭，是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资产阶级的历史观的根本分歧所在。毛泽东同志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①运用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不仅能认识当前的阶级斗争，而且能极其切实有效地认识古代社会的历史。过去和现在的历史研究都证明了这是任何歪曲都无法改变的客观真理。只有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历史，才能认清历史的本质，一切其他的观点和方法，只能把人们引导到错误的道路上去。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的创立，是科学上的伟大发现。运用它来研究历史，才能找到历史发展的规律，使历史成为科学。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是阶级社会的客观存在的反映，是总结了几千年来阶级斗争的事实和經驗而产生的。这个理论是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真理，它适用于过去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也适用于当前的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在不同的阶级社会里，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形式会有变化，而阶级和阶级斗争总是始终存在。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永远不会过时，它的光辉是不灭的。就是到了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的时候，阶级和阶级斗争在共产主义社会的内部已不存在，不须要用阶级斗争观点来看待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们的相互关系，但是，对于研究从奴隶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以前的整个历史时期，仍然要用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这是研究历史、认识历史发展规律的根本方法，是唯一正确的科学方法。

二

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的内容是什么？换句话说，应该从哪些方面来进行阶级分析呢？从总的方面来说，应该包括以下一些主要方法：

第一、要分析各个阶级的经济地位和经济基础。对社会各阶级进行经济分析，是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的首要内容。因为在社会的发展中，每个阶级的存在都依赖于一定的经济基础。由于在生产关系中对生产资料占有关系的不同而划分为各个不同的阶级。在经济上处于对立地位的阶级，他们彼此之间必然进行着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因此，要分清敌友，首先就要对各个阶级的经济地位进行具体的分析。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②经济地位是决定人的阶级性和对革命态度的物质基础。

在进行经济分析时，必须深入的分析各个阶级所代表的生产关系，和在这种生产关系中的经济状况；分析它是代表反动的落后的生产关系还是先进的同社会发展相一致的生产关系；是阻碍和束缚生产力的发展还是促进和代表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它占有什么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下同），第149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页。

生产资料，占有多少，如何使用，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如何，怎样分配产品，以及由此而决定的经济利益和经济要求等等。这是从经济地位上分清敌友的主要内容。凡是代表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就是革命的对象；相反，凡是代表先进的生产关系和新的生产力，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着促进作用，或者能帮助生产力的发展，为国民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就是革命的领导力量、依靠力量或团结对象。

对于各个阶级的经济地位，除了分析它的当前经济情况之外，还要分析它的经济发展要求和发展方向，以便既认识这个阶级的经济基础，又知道它应该和可能向哪个方向发展，引导它走上正确的道路，阻止它向错误的道路发展。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我国土地改革后的农民个体经济作了全面的深刻的分析，指出工人阶级领导农民推翻地主阶级的封建土地制度之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是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即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这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反映农民本身既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的两重性。从这种两重性和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出发，表现出农民既可以引向社会主义，又存在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根据农民个体经济这样的特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及时地提出正确的政策，把农民的个体经济积极性引导到互助合作的道路上来，从而防止了那种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发展，逐步实现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正确的全面的分析各个阶级的经济地位，对于认清谁是敌人，如何孤立敌人和打击敌人，极为重要。对于认清谁是朋友，如何团结同盟者，正确处理在革命统一战线中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关系问题，同样非常重要。无产阶级要实现对同盟者的领导，除了其他条件之外，对同盟者的经济利益给以照顾，不加损害，或者在这一方面有所失，另一方面却有所得，而总的方面对同盟者是有利的（包括政治方面），这也是一个重要条件。毛泽东同志指出：“领导的阶级和政党，要实现自己对于被领导的阶级、阶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甲）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乙）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没有这两个条件或两个条件缺一，就不能实现领导。”^①经济问题同政治领导是分不开的。

我国自从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取得伟大胜利以后，各个阶级的经济地位起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各个阶级原有的经济地位，对于仍然存在的阶级和由该阶级出身的分子，还有极大的作用和影响。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右派，还念念不忘地留恋过去的经济地位，一有机可乘，便企图进行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复辟。在农村中的富裕中农，也对过去的经济地位有很大的留恋，一有机会，便想走资本主义道路。而由原来的经济地位所决定的人的阶级性，更是远未消灭，在今后的很长时间内，仍然起作用，因此，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各个阶级，还要进行经济分析。在阶级消灭以前，从经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73页。

济上分析阶级，仍然是我們認識旧的剝削阶级成員和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銳利武器，也是認識工农差别的依据。我們要一方面分析它們的历史发展过程，分析它們原有的經濟基础；另一方面又应分析它們的新的变化、特点和发展，以求得全面的認識。

第二、要分析各个阶级的政治思想和对革命的态度。这也是阶级分析的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方面。取得統治地位的阶级，为了保护它的經濟地位和經濟基础，它就需要有上层建筑，建立国家政权，形成代表它的阶级利益的政治思想。而被剝削被統治的阶级，为了謀得解放，也必然产生它的政治思想，而与反动統治阶级的政治思想进行斗争。同时，在同一个思想体系里面，还存在各种不同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态度。因此，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不能只从經濟上着眼，还要重視从政治思想和对革命的态度上进行阶级分析。

一般上，各个阶级的政治思想和对革命的态度是由它的經濟地位、經濟基础决定的，但政治思想对經濟基础也起反作用，在一定条件下，政治思想对它的經濟地位和經濟发展方向可以起决定的作用。例如，在民族资产阶级中属于左派、中間派还是右派，不是由經濟决定，而是由政治思想、政治态度来决定的。所以，同样是民族资产阶级，又有左、中、右之分，而无产阶级对待民族资产阶级中的左派和右派的政策，有根本原則的区别。可见，从政治上思想上进行阶级分析，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和党的政策是十分重要的。

在生产資料所有制方面的誰胜誰負問題基本解决以后，从政治上思想上进行阶级分析的重要性更加突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政治战綫和思想战綫上的阶级斗争，成为主要的斗争（經濟战綫上的斗争仍然是很长期的斗争）。要达到彻底地消灭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影响、资产阶级的意識形态，必須經常地分析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影响在各个时期的表现形式和发展动向，分析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影响如何反映到党内和革命队伍中来，分析资产阶级的左、中、右三个方面的状况和变化，分析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的特点和发展。只有經常地对这些問題进行阶级分析，掌握各个时期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影响的情况，認真地开展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才能取得政治思想战綫上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从政治上思想上进行阶级分析，比在經濟上进行阶级分析要复杂得多。在政治上思想上不能如同在生产資料所有制問題上那样划分阶级。人們的政治思想如何，既不能用尺碼来丈量，又不能用磅来計重量，它是反映在对各种問題的看法、意見和观点之中，只有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阶级分析，才能看清这些看法和观点的阶级实质。列宁提出对政治思想进行阶级分析的一条原則，就是看一看这些观点、提議、措施对哪一个阶级有利，代表哪一个阶级的利益。列宁說：“要是一下子看不出是哪些政治集团或者社会集团、势力和人物在为某种提議、措施等等辯护时，那就应该提出‘对誰有利？’的問題”。又說：“直接为某些观点辯护的人是誰，这在政治上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这些

观点、这些提議、这些措施对誰有利。”^①这就是說，“对誰有利”这是我們从政治上思想上进行阶级分析的一条重要原則。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中，提出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用以判断人們的言論和行动的六条标准，就是在社会主义时期进行政治思想分析的标准。

第三、要分析各个阶级中的阶层和各个阶级、阶层之間的矛盾，以及区别两类性质不同的社会矛盾。从分析各个阶级的經濟地位和政治态度，再深入一步地分析各个阶级中的阶层，以及这些阶层在經濟上的差别和政治思想表现上有何不同，这也是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的一个組成部分。在社会的各个阶级内部，由于占有生产資料的数量不同，在經濟地位上有所差别，因而在同一阶级之内出现了不同的阶层。这些阶层，一般上总的利益是一致的，但因有差别，故又产生矛盾，存在不同的經濟要求和政治态度，在一定条件下，阶层之間不同的經濟要求和政治态度，不但有程度上的区别，甚至可以达到相反的地步。

人們都知道，毛泽东同志是最善于分析社会各个阶级和阶层，以及这些阶级、阶层之間的矛盾的。他把中国资产阶级，划分为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并对各个阶层之間的矛盾作了深刻的分析。对农民，除了一般的划分为中农和貧农之外，就中农來說，还进一步分为老上中农和新上中农、老下中农和新下中农。在这些阶层之間的經濟地位和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态度是有所不同的。毛泽东同志指出，“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如果要用社会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制度去彻底地改造整个农村的小农私有生产資料的制度，便只有依靠过去是半无产阶级的广大的貧农群众，才能比較順利地办到，否則将是很困难的。因为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是比較地不固执小农私有生产資料的制度，比較容易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人們。他們中間的大部分現在已經变为新中农，但是他們和老中农比較起来，除了一部分富裕中农以外，大多数在政治上有較高的觉悟，他們过去的困苦生活还是容易回忆起来。还有，老中农之間的下中农，他們的經濟地位和政治态度，和新中农之間的下中农比較接近，而和新老中农之間的上中农，即富裕的和比較富裕的中农不同。”^② 富裕中农具有比較严重的资本主义自发傾向，对社会主义的动摇性較大。所以，在农村的阶级路綫，必須是依靠貧农和下中农，巩固地团結其他中农。

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后，农村中的阶级情况起了根本的变化，中农成了农村人口的大多数。但是，我們不能简单地抽象地看中农的数量，还要看见在中农内部有不同的情况、不同的經濟地位和政治态度，要对中农作阶级分析，才能正确执行农村中的阶级路綫和阶级政策。毛泽东同志对我国的资产阶级和农民的阶级分析，是对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的創造性的发展。

在各个阶级、阶层之間存在的矛盾，是有不同性质的。需要进一步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根据不同性质的矛盾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

① 《列宁全集》第19卷，第38頁。

②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57頁。

第四、要从分析各个时期的革命形势中认清各个阶级、阶层的动向。随着阶级斗争的不断向前发展，革命形势在各个时期有很大不同。各个阶级、阶层在不同的形势下，根据本身的经济地位、经济利益、经济发展要求和政治态度，形成了各个阶级的动向。例如，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4—1927年），曾参加了大革命，这一时期之末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则跟着大资产阶级背叛革命。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又转到走上参加民族民主革命的道路。又如中农（尤其是上中农），他们无论在向地主作斗争、实行土地改革的时期，还是在向富农和其他资本主义因素作斗争、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时期，在开始的阶段都是动摇的，等到看清了大势，革命将要胜利的时候，中农才会坚决地参加到革命方面来。

认清各个阶级、阶层的动向，对于确定对待各个阶级的态度和要求，确定党的阶级政策极为重要。就拿农业合作社来说，贫农对于合作化最积极。新下中农和老下中农也是积极的。这几部分人的经济地位比较接近，他们有一种组织合作化的积极性（积极性的程度则有不同），总是最先参加合作社，而富裕中农对合作社是动摇的，其中许多人对合作社有很大抵触情绪，有的变卖生产资料，抽逃资金，个别最坏的甚至勾结地主富农做坏事。所以在开始建立合作社时，除了个别已经有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觉悟，真正自愿入社的以外，其余暂时都不要吸收。只有等到农村中大多数人都加入合作社了，或者合作社的单位产量提高到和富裕中农相等甚至超过它了，他们感到唯有参加合作社才是较为有利的时候，才会下决心加入合作社。这是为我国的事实所证明了的农民各阶层对农业合作化的动向。

正是由于研究各个阶级、阶层的动向如何，对党的政策和工作有这样重大关系，所以，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希望各地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们都注意观察和分析自己那里的各个阶层的动态以便采取适合情况的政策。”^①

第五、要从分析阶级社会的各种现象中找到阶级的本质。社会上的各个阶级，都是通过一些人物、事件、斗争和意识形态等等现象，以反映这个阶级的利益、要求和发展动向。同社会发展规律相违背的反动阶级，总是不敢把它的阶级利益和要求直接告诉人民，而用各种现象掩蔽它的阶级本质。小资产阶级由于存在动摇性和软弱性的原故，它的阶级本质也不会直接表露出来，常常用各种含糊的模棱两可的现象加以掩盖。因此，对阶级社会的现象，就不能不进行阶级分析。

从各种社会现象中一层一层地分析下去，掌握住隐藏在现象背后的阶级本质，并且由第一层本质进而达到更深的第二层的本质，这是对阶级分析方法的基本要求，也是阶级分析方法发挥无穷威力的表现。

以上就是关于进行阶级分析的几个主要方面。

^①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973页。

关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問題

伍仁思

革命的辯証法是无产階級革命的战略和策略的理論基础。矛盾学說是革命的辯証法的实質和核心。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則是矛盾学說的精髓。

馬克思和恩格斯实现了哲学上的革命，創立了辯証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唯物辯証法是“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列宁在《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一文中指出：“如果我們想用一個詞来表明全部通信集的焦点，即其中所发表所討論的一切思想集結的中心点，那末这个詞就是辯証法。用唯物辯証法从根本上来改造全部政治經济学，把唯物辯証法应用于历史、自然科学、哲学以及工人階級的政策和策略——这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最为注意的事情，这就是他們做了最重要最新穎的貢獻的地方，这就是他們在革命思想史上英明地迈进的一步。”^①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辯証法的矛盾学說，分析了資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运动，闡明了資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規律，以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規律，指出了社会主义代替資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无产階級的历史使命，把社会主义变成为科学。

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階級革命的时代，列宁全面地发展了馬克思主义，发展了唯物辯証法。列宁运用矛盾学說科学地分析了資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即帝国主义的矛盾运动，制訂了帝国主义阶段无产階級革命的理論、战略和策略，领导俄国的无产階級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立了无产階級专政，从而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紀元。列宁深刻地研究了辯証法，对矛盾規律的基本原理作了許多新的概括，提出了辯証法、認識論和邏輯統一、矛盾学說是辯証法的核心和实質等原理，把馬克思主义辯証法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在帝国主义日益腐朽，社会主义日益胜利，民族解放运动日益高涨的时代，毛泽东同志又进一步发展了列宁的辯証法，对矛盾学說作了系統的闡述和發揮。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是帝国主义世界各种矛盾的焦点，是革命风暴的新源泉。毛泽东同志創造性地运用了馬克思列宁主义辯証法，特别是他的矛盾学說，分析了旧中国錯綜复杂的各种社会矛盾，制訂了中国革命的理論、战略和策略，引导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分析

^① 《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版（下同），第558頁。

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各种矛盾，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政策，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胜利前进。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是伟大的中国革命经验的理论总结，闪现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光辉，特别是《矛盾论》、《实践论》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对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矛盾学说，从理论上作了系统的阐明和发挥。

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指出，“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①；“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②。为什么矛盾学说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呢？列宁指出，辩证法发展观是同形而上学的发展观相对立的，它不是“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而是“认为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只有这种观点“才提供理解一切现存事物的‘自己运动’的钥匙，才提供理解‘飞跃’、‘渐进过程的中断’、‘向对立面转化’、旧东西的消灭和新东西的产生的钥匙。”^③所以，列宁又说：“就本来的意义说，辩证法就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④的。

列宁还指出：对立面的同一既然是一切自然界、社会和精神现象所固有的，因而也就是“人类的全部认识所固有的”，因此，对立面的同一就不应当“被当作实例的总和”，而应当“被当作认识的规律”。^⑤“辩证法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⑥，必须“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应用于认识的过程和发展”^⑦。列宁强调指出，这正是“问题的本质”^⑧。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正是根据列宁的指示，抓住矛盾学说这个核心来阐明辩证法发展观，并把辩证法和认识论统一起来，把世界观和方法论结合起来；他在总结我国革命丰富经验的基础上，对矛盾学说的一系列最基本的原理和辩证法发展观的各个重要方面，对辩证法的全部实质作了系统的创造性的阐明和发挥。特别重要的是，毛泽东同志第一次提出了关于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联结是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的原理，这就为我们学习、掌握和运用矛盾学说以及全部唯物辩证法提供了一把钥匙。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说：

“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其共性是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并贯穿于一切过程的始终，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否认事物的矛盾就是否认了一切。这是共通的道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以它是共性，是绝对性。然而这种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假如除去一切个性，还有什么共性呢？因为矛盾的各各特殊，所以造成了个性。一切个性都是有条件地暂时地存在的，所以是相对的。”

①② 分别见《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7、240页。

③④ 分别见《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8、278页。

⑤⑥⑦⑧ 分别见《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7、410、411、410页。

“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①

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相联结之所以是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就是因为它在对立统一规律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它对于运用对立统一规律以至于全部辩证法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具有特别重要的关键意义。在理论上，只有深刻掌握这一原理，才能真正理解辩证法世界观的全部精神和实质；而在实践上，也只有彻底运用这一原理，才能把辩证法和认识论统一起来，把世界观和方法论统一起来，彻底坚持革命的辩证法，真正做到“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在革命斗争中，只有深刻掌握这一原理，才能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本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制订和坚持无产阶级的革命战略和策略，而避免犯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

二

毛泽东同志关于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相联结是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的原理，是列宁的辩证法和矛盾学说的发展，也是中国革命经验的理论结晶；是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来指导中国革命的经验科学总结。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研究中国革命以及世界革命的矛盾运动的辩证法，才能够深刻领会这一原理的意义。

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新时代，即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时代。十月革命建立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由于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的作用，中国革命完全有可能继十月革命之后在东方冲破帝国主义战线取得胜利。当时中国无产阶级面临的历史任务，就是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

毛泽东同志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②十月革命的基本经验，具有普遍的国际意义；否定或离开了十月革命的基本道路，就会断送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同时，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又有它自己的特点；忽视这些特点，就不可避免地会在这个问题或那个问题上、在这个时候或那个时候犯这种或那种错误。

1919年11月22日列宁在《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你们面临着一个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的任务，就是必须根据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情况来运用一般的共产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措施，必须看到农民是主要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下同），第30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76页。

群众，要反对的不是資本而是中世紀残余，要根据这种情况来运用一般的共产主义理論和共产主义措施。这是一个困难而特殊的任务，同时它又是特別崇高的任务，……这些任务的解决方法，你們無論在哪一种共产主义书本里都找不到，但是在俄国所开始的共同斗争中能够找到。你們应当提出这个任务，并根据自己的經驗来解决这个任务。”^①列宁这一指示对东方殖民地附属国的共产党人來說，也是适用的。各国共产党人必須把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結合起来；而东方各国的共产党人，在这方面負有更艰巨的任务。

在中国革命的长过程中，毛泽东同志对于每一个革命时期中的每一个理論問題和战略策略問題的解决，都遵循着列宁的这个指示，把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結合起来，在革命实践中具体地运用矛盾普遍性与矛盾特殊性相联結的原理，为解决中国革命的特殊矛盾指明正确的道路。正如陈伯达同志所說：“毛泽东同志不断地在世界革命的总运动中找寻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他在每一个时期內，总是联系着世界普遍性的矛盾，着重地研究与解决中国革命在发展中所遇到的种种特殊性的矛盾的問題。他善于針对着中国的政治的和經濟的具体特点，灵活地运用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所发现的普遍真理以及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問題的学說，从而掌握中国革命的发展在其某一定时期的具体过程的特点，并且在各个时期一步一步深入地暴露中国各个方面的矛盾，使得人們在紛乱的摸索中，得到思想的光輝。”^②

毛泽东同志之所以能够把中国革命引导向伟大胜利，最根本的是由于他总是既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的指导，又能够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把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斗争結合起来；他总是坚持以革命的辯証法，特别是它的核心和实质——矛盾学說为指导，同时又具体地分析中国社会的具体条件和各种具体矛盾的特点，从而揭示这些矛盾的运动规律，据以制定革命的路綫、方針和政策。他联系当代世界普遍存在的矛盾，即帝国主义同各国民族和人民的矛盾来看中国社会的特殊矛盾，同时又从具体分析中国矛盾的特点中看出中国革命的世界意义。

毛泽东同志在制訂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綫的时候，既看到了在十月革命以后，世界普遍的矛盾是帝国主义同各国无产階級和人民大众之間的矛盾，指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伟大的一部分”；同时他又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矛盾学說和階級分析法，具体地分析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各种矛盾的特点，指出了中国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矛盾，是中国近代社会的基本矛盾，这种矛盾，规定了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只能是資产階級性的民主革命。但是由于十月革命后世界上新的历史条件，帝国主义和无产階級革命时代的矛盾的新特点，“这种革命，已經不是旧的、被資产階級领导的、以建立資本主义的社会和資产階級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階

^① 《列宁全集》第30卷，第138—139頁。

^② 陈伯达：《毛泽东同志論革命的辯証法》。載1952年5月13日《人民日报》。

級領導的、以在第一階段上建立新民主主義的社會和建立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國家為目的的革命”^①。因此，這個革命已經“不再是舊的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②。這種革命“雖然在一方面是替資本主義掃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會主義創造前提”^③，“為社會主義的發展掃清更廣大的道路”^④，它必然要同社會主義革命直接聯繫起來，但它本身又不是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毛澤東同志對中國革命中的矛盾的科學分析，為中國革命指出了正確的道路，從而制訂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總路線，指出“所謂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就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⑤。這就既反對了右傾機會主義，又反對了“左”傾冒險主義。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右傾機會主義看不到十月革命以後世界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矛盾的普遍性，把中國革命當成是舊的資產階級革命，放棄無產階級對這個革命的領導權，主張由資產階級領導民主革命，建立資產階級專政，從而完全墮落為投降主義和取消主義。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左”傾冒險主義則對中國社會的錯綜複雜的矛盾的特點不作具體的考察和分析，把中國民主革命看成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混淆了兩個性質不同的革命階段，採取了冒險主義政策，使革命受到了不應有的損失。毛澤東同志堅持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總路線，終於引導中國革命取得了偉大勝利。

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經過二十八年曲折漫長的過程，經過艱難困苦的鬥爭而取得勝利，積累了極為豐富的經驗。其中很重要的一條是毛澤東同志首創的工農武裝割據的經驗。毛澤東同志既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學說，堅持以武裝鬥爭作為中國革命的主要形式，堅持工人階級領導下的工農聯盟，堅持以農民革命作為中國革命的主要內容，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者放棄工人階級領導，限制農民運動和放棄武裝鬥爭的投降主義路線；同時，又具體地分析了中國社會的特殊條件和革命與反革命雙方的特點，為中國工人階級領導農民革命開展武裝鬥爭找到了正確的道路和形式，創造了歷史上未曾有過的工農武裝割據的經驗，反對了“左”傾機會主義者不顧中國革命敵人力量的暫時的強大，不願在农村依靠農民群眾，建立根據地長期積累力量，而企圖在敵我力量懸殊的情況下，在一個早上舉行城市暴動取得革命勝利的冒險主義路線。中國革命就是按照毛澤東同志所揭示的特殊規律，即實行工農武裝割據，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奪取國家政權的道路而發展起來，經過十年內戰、八年抗日戰爭和三年解放戰爭而取得偉大勝利的。

工農武裝割據的經驗，是在中國的特殊條件下產生的，帶有中國革命的民族特點，它體現了中國工人階級領導下的工農聯盟，體現了革命的武裝鬥爭，是這些一般規律的特殊形式，反映了矛盾的特殊性。然而，這些特殊性在另一場合下又可以轉化為普遍性。工農武裝割據經驗的某些重要特點，如建立農村根據地，建立強大的工農武裝，開

①②③④⑤ 分別見《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61、661、642、661、642頁。

展游击战争，长期积蓄力量，由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等，对于某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却又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普遍意义，成为矛盾的普遍性。当然，这些国家革命的武装斗争，仍然会有它自己的民族特点。

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又运用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相联结的原理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进一步发展了唯物辩证法和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他一方面坚持矛盾的普遍性原理，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根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过渡时期，阶级仍然存在，阶级斗争仍然存在；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不但存在人民内部矛盾，而且还存在敌我矛盾；批判了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否认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存在着矛盾，否认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等形而上学观点。另一方面又具体地分析了我国在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建立的条件下各种矛盾的特点，揭示过渡时期矛盾斗争的特殊规律性，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指出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斗争，过渡时期中的阶级斗争将在经济、政治、思想战线上长期地反复进行；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既有性质上的不同，但又会在一定条件之下互相转化等等。因此，就必须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矛盾；注意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调整上层建筑以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不断进行经济上和政治上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断消灭资产阶级的经济势力和政治思想影响，防止和最后消灭资产阶级复辟的一切可能性，并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正是在这个理论基础上，毛泽东同志先后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并举的总路线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引导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取得胜利。

三

事物矛盾的问题，即对立统一学说，包含着一系列的问题，主要的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诸方面的统一性和斗争性，矛盾斗争的对抗性和非对抗性。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弄清了这些问题，我们就在根本上懂得了辩证法。但是，其中最重要的，还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问题，这是因为，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辩证关系，是客观事物矛盾运动的最普遍最根本的规律性。一般和个别、共性和个性的关系是一切事物的矛盾中所固有的，任何事物及其矛盾都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因此，任何事物在其一定的范围内都会有其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问题。

唯物辯証法認為，任何具體的事物都是個別和一般的統一，個性和共性的統一，相對和絕對的統一，它們依一定的條件（在這個具體的事物中）而互相聯結；又依一定條件而互相轉化，即在一定場合下是個別的、相對的東西，在另外的場合下又成為一般的、絕對的東西，相反亦然。這就是說，個性和共性的差別，相對和絕對的差別，也是相對的。所以，我們的認識就不能把它們絕對對立起來。對於一個具體事物，如果只看到它的個性和相對性，看不到個性中必包含着共性，相對中必包含着絕對；或者只看到它的共性和絕對性，看不到這種共性和絕對性只能存在于個性和相對性之中，都將陷入形而上學的片面性和主觀性，都不可能正確認識事物，正確解決矛盾。這個共性個性、絕對相對的原理是客觀事物所固有的辯証法，也是人類認識所固有的辯証法。這個原理，列寧在《談談辯証法問題》一文中作過簡要而深刻的論述，並且特別指出它對認識的意義。列寧認為，是否理解共性和個性之間、絕對和相對之間的辯証關係，是辯証法和主觀主義相對主義的根本區別所在。他說：“主觀主義（懷疑論和詭辯等等）和辯証法的區別在於：在（客觀的）辯証法中，相對和絕對的差別也是相對的。對於客觀的辯証法說來，相對中有絕對。對於主觀主義和詭辯說來，相對只是相對的，是排斥絕對的。”①

不同的事物具有共性，歸根到底是由於事物的矛盾具有普遍性；而這些事物之所以具有千差萬別的個性，歸根到底也是由於這些事物的矛盾是各各特殊的。毛澤東同志運用共性個性、絕對相對的原理來概括事物的矛盾問題，論述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及其互相聯結的規律性，然後就指出：“這一共性個性、絕對相對的道理，是關於事物矛盾的問題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於拋棄了辯証法。”②

因此，我們觀察和分析事物的矛盾運動，首要的是必須懂得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互相聯結，必須把堅持矛盾的普遍性的指導同具體分析矛盾的特殊性結合起來，並遵循從特殊到一般再由一般到特殊的認識規律。這是認識矛盾解決矛盾的一個根本的原則。只有既堅持矛盾的普遍性又具體分析矛盾的特殊性，才能具體認識矛盾的同一性和鬥爭性，才能區別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區別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才能區別不同性質的矛盾和矛盾鬥爭的不同形式。假如根本不承認矛盾的普遍存在，不堅持矛盾的普遍性，不去分析事物發展過程的自始至終的矛盾運動；或者反過來，不承認矛盾的普遍性只能存在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不去深入具體分析矛盾的具体條件和具体特點，那又怎麼能夠認識和堅持對立面鬥爭的普遍性和絕對性，和對立面同一的特殊性和相對性，又怎麼能去區別矛盾和矛盾方面的主次，區別矛盾的不同性質和矛盾鬥爭的不同形式呢？

在如何對待事物的矛盾問題上，一切形而上學的表面性、片面性和主觀性，歸根到底都是由於它們不懂得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相聯結。他們不是由於根本不承認

① 《列寧全集》第38卷，第408頁。

② 《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308頁。

矛盾斗争的普遍性和绝对性，掩盖、抹煞矛盾的客观存在而陷入表面性、片面性和主观性，就是由于不承认矛盾都是各各特殊，普遍性就寓于特殊性之中，因而“否认深入事物里面，精细地研究矛盾特点的的必要”，否认具体分析不同过程不同阶段的矛盾的特点和各个矛盾方面的特点的的必要，而陷入表面性、片面性和主观性。无论是前者或后者，都是由于割裂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而陷入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的泥坑。

例如，在我国的民主革命时期，为什么右倾机会主义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会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错误，而“左”倾机会主义者却又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错误呢？这固然是由于他们对待统一战线中矛盾的同性和斗争性问题上陷于片面性，即只承认同性而否认斗争性，或者反过来，只承认斗争性而否认同性。但是，如果再追问一下，为什么他们对待矛盾会犯这样或那样的片面性，那么就必须说，归根到底，是由于右倾机会主义者是企图否认或抹煞统一战线中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这一矛盾的普遍意义，而“左”倾机会主义者则不去具体分析中国社会历史条件和中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的特殊性，否认有这种矛盾的特殊性的缘故。党和毛泽东同志能够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坚持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一方面当然是由于他能够正确地对待矛盾的同性和斗争性的关系，能够在统一中把握矛盾，在矛盾中把握统一；但是，实际生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统一战线中各阶级的矛盾也是不断变化的，要能够随着时局的发展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在矛盾的运动中来具体地正确地把握每一个时期统一战线中各种矛盾的对立斗争和统一的关系，制定和坚持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反对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就必须正确地掌握运用全部矛盾学说，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必须掌握矛盾的普遍性同矛盾的特殊性的联结。党和毛泽东同志能够在时局变化的每一个关头，都既坚持矛盾的普遍性，分析统一战线内外各种矛盾的自始至终的运动，同时又具体地分析每一个矛盾的各个方面及其联结的特点。既不把矛盾的特殊性当作孤立的东西，否认矛盾的普遍性，导致否认统一战线中的阶级矛盾；同时也不把矛盾的普遍性当作孤立的东西，否认矛盾的特殊性，导致否认在一定条件下的联合。因此，党和毛泽东同志才能够在时局变化、阶级关系变化的关头，随时把握住当前特殊的主要矛盾以及主要的矛盾方面，分清当前各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制订和坚持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采取不同的联合形式和斗争形式，贯彻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解决统一战线内部的各种矛盾，从而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去反对当前的共同敌人，取得革命斗争的胜利。

四

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互相联结是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这一原理，对于我们的认识和实践，具有重大的意义。

矛盾的普遍性对于认识的意义在于，既然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在我们的认识和实践 中，对任何条件下的任何事物的自始至终的过程，都必须承认矛盾的存在，承认矛盾是

事物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必須坚持运用辯証法的矛盾学說，以事物的共同規律、矛盾的普遍性作指导，去分析“事物发展过程的自始至終的矛盾运动”；必須反对任何害怕矛盾、迴避矛盾、掩盖矛盾的思想，反对种种色色的形而上学的“无矛盾論”和“无冲突論”。是否坚持矛盾的普遍性，是革命的辯証法同形形色色的形而上学的根本分歧所在，也是是否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根本标志。否認矛盾的普遍性，又常常是在理論上离开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起点和根源，因为否認矛盾的普遍性，必将导致否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

已經受到批判的德波林学派有这样一种见解，他們认为矛盾不是一开始就在过程中出现，須待过程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他們认为，事物在发展的过程中，由同一进到差别，由差别进到对立，由对立进到矛盾。德波林在他的《哲学与馬克思主义》一书中写道：“当一切必然的发展阶段——从單純的同一，經過差别和对立，到达于极端的矛盾——都經過之后，‘解决矛盾’的时期就到来了。”这就是說，“單純的同一”不是矛盾，差别也不是矛盾，矛盾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这样，事物就不是自身的运动，这就陷入了形而上学的外因論，抛弃了辯証法。按照这种看法，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定阶段并不存在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定阶段，也可以沒有矛盾，只有“單純的同一”、“和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天下一家”，富农和劳动农民也无矛盾。这种见解是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們不知道世界上的每一差异中就已經包含着矛盾，差异就是矛盾。”^①否認差异就是矛盾，就是否認矛盾的普遍性，就是抛弃辯証法。

还有另一种见解，认为在事物发展的某一阶段，矛盾会轉化为差别，差别又融合为統一。这种看法同样是錯誤的。对立面統一是相对的，对立面的斗争是絕对的；不存在死板的、沒有矛盾的統一；离开了斗争性，也就沒有統一性；只有通过矛盾的斗争，矛盾才能得到解决。任何差异都是矛盾；矛盾貫串于一切发展的过程的始終，一切阶段都存在矛盾。到了一定的阶段矛盾就会融合为統一的想法，实际上是否認不断革命，主张“半途而廢”。取消了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斗争，任何事物的“生命”也就停止了。这种矛盾“半路消失”論，实际上是德波林学派的观点在新的条件下的变种，實質上也是否認矛盾、斗争的普遍性和絕对性。

矛盾的普遍性总是同矛盾的特殊性联結在一起，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的。因此，不能把矛盾的普遍性当作离开矛盾的特殊性的孤立的東西。矛盾的特殊性对于認識的意义就在于，既然矛盾是各各特殊的，矛盾的普遍性只能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我們在認識事物研究矛盾的时候，在运用普遍真理、共同規律时，必須对具体的事物的具体条件和具体矛盾作具体的分析，研究事物发展的各个过程、各个阶段的各种矛盾的特点，研究这些矛盾的各个側面及其总体的特点；也就是說，“必須从客观的实际运动所包含的具体的条件，去看出这些现象中的具体的矛盾、矛盾各方面的具体的地位以及矛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5頁。

盾的具体的相互关系”^①，然后才能根据这种分析，找出解决矛盾的办法。对矛盾不进行这种深入的具体的分析研究，就不可能認識任何具体矛盾，也不可能真正的認識矛盾的普遍性。列宁所說的，“一切真理都是具体的，抽象的真理是沒有的”，“馬克思主义最本質的东西，馬克思主义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都是教导我們对具体的矛盾必須作具体的分析和研究，然后才有可能掌握矛盾运动的客观规律，并按照这种规律找出解决矛盾的办法，推动事物前进。这才是馬克思主义对待事物的正确态度，是馬克思主义認識論的一条根本原則，也是辯証地認識事物的根本要求。

但是，矛盾的特殊性也不是孤立的，不能脱离矛盾的普遍性来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否則也会走上否認矛盾的普遍性，否認事物运动的共同规律的道路。矛盾的普遍性同矛盾的特殊性既然总是联結在一起的，矛盾的特殊性，也就是說，具体的事物，無論如何特殊，它只不过是矛盾的普遍性在某些特殊条件下的具体表现，其中一定包含着矛盾的普遍性，它們一定按照一切事物所固有的普遍本質和规律，按照一定范围内的某一类事物所共有的本質和规律而发展，不可能离开这些共同的本質和规律。

所以，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联結，就包含着两个方面的意义和要求。一方面，矛盾是普遍的、絕对的，一切事物都包含着矛盾，矛盾的斗争和同一，推动事物的发展；另一方面，矛盾又是特殊的、相对的，一切事物都受一定的特殊条件所制约，包含着特殊的各不相同的矛盾。一方面，矛盾的特殊性不能离开矛盾的普遍性的制约和支配，在个性中必有共性，在相对中必有絕对；另一方面，矛盾的普遍性也不能离开矛盾的特殊性而孤立存在，共性只能寓于个性之中，只能通过个性而表现，絕对只能寓于相对之中，通过无数相对而形成。因此，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相联結在認識上的意义和要求就在于：“当着我们研究一定事物的时候，就应当去发现这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結，发现一事物内部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結，发现一事物和它以外的許多事物的互相联結”^②。

認識的任务是要从事物的现象深入事物的本質，掌握事物的全部丰富内容和规律性，这样才能有效地指导变革世界的实践。因此，認識事物就必须：一方面要从錯綜复杂的千差万别的具体事物和现象中看出它所包含着的普遍的矛盾，发现其运动发展的普遍原因和普遍根据，揭示它所包含的一般本質，为此就不能离开矛盾的普遍性，必須以矛盾的普遍性、事物的普遍规律作指导，分析事物发展过程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才能掌握事物的全局，抓住事物的本質，認清事物发展的方向，而不为事物的局部的暫时的表面的现象所迷惑。毛泽东同志說，“我們看事情必須要看它的实質，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門的向导，一入門就抓住它的实質，这才是可靠的分析方法。”^③但是，要作到这一点，却又只有先从具体的矛盾出发，只有研究矛盾的具体条件，看出在这种具体条件下矛盾的各种具体特点，即矛盾各个側面及其互相联結的特点，揭示它的特殊本質；并且

①②③ 分別見《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7、306、103頁。

只有在認識了許多特殊事物的特殊本質以后，才能概括出諸種事物的共同本質。然而，掌握了事物的共同本質，認識也不能就此終結，還必須“以這種共同的認識為指導，繼續地向着尚未研究過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過的各種具體的事物進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質，這樣才可以補充、豐富和發展這種共同的本質的認識，而使這種共同的本質的認識不致變成枯槁的和僵死的东西”^①，即不致變成簡單空洞的抽象概念，而是成為豐富的、具體的、生動活潑的辯證認識。事實上，每一個科學的認識也是這樣運動發展着的。

所以，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相互聯結的客觀辯證法，反映到人們的認識中來，就表現為認識運動的主觀辯證法，即毛澤東同志所揭示的，認識從特殊到一般，再由一般到特殊這兩個過程相互聯結的規律。毛澤東同志把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相聯結的辯證法應用於認識的過程和發展，從而闡明了“人類認識運動的秩序”（即規律），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認識論；同時，又把這種認識運動的規律同群眾路線結合起來，創造性地運用於指導群眾的革命鬥爭、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的實踐，制訂了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保證了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正確制訂和貫徹執行。毛澤東同志總結了黨領導群眾革命運動的經驗，在《關於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中提出了兩個基本的領導方法，一個是一般號召和個別指導相結合的方法，一個是領導骨幹和廣大群眾相結合的方法。他指出，“正確的領導意見只能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又到群眾中堅持下去”^②，在領導意見見諸實行時，又必須“從許多個別指導中形成一般意見（一般號召），又拿這一般意見到許多個別單位中去考驗……，然後集中新的經驗（總結經驗），做成新的指示去普遍地指導群眾”^③。這是科學的領導方法的根本原則，它正確地反映了一般和個別統一、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相互聯結的辯證關係，體現了認識運動從特殊到一般又從一般到特殊的規律。“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從個別指導中形成一般意見”，“集中新的經驗，做成新指示”，等等，都是認識從特殊到一般的過程，而“到群眾中堅持下去”，“拿一般意見到許多個別單位去考驗”，用“新的指示去普遍地指導群眾”等等，都是認識從一般到特殊的過程。毛澤東同志指出：“這是兩個認識的過程：一個是由特殊到一般，一個是由一般到特殊。人類的認識總是這樣循環往復地進行的，而每一次循環（只要是嚴格地按照科學的方法）都可能使人類的認識提高一步，使人類的認識不斷深化。”^④把這種認識的辯證法運用到實際工作中，就是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因此，毛澤東同志又指出：“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就是說，將群眾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於行動，並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然後再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再到群眾中堅持下去。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⑤毛澤東同志把辯證法、認識論和群眾路線結合起來，既闡明了

①④ 均見《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98頁。

②③⑤ 分別見《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901、902、901頁。

群众路綫的認識論基础和科学根据，同时，对馬克思主义的認識論也是一个极大的丰富和发展。实践証明，只有遵循着馬克思主义的認識論，在实际工作中坚持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結合，一般号召与广大群众相結合的方法，才能够减少認識的片面性、表面性和主观性，避免犯这样或那样的錯誤。

关于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相互联結是事物矛盾問題的精髓的原理，是毛泽东同志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丰富經驗在哲学上的科学概括，是对列宁的辯証法思想的重大发展，具有非常高度的革命性和科学性。它是我們党制定无产階級革命理論、战略和策略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論基础，同时也是我們反对形而上学和主观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反对各种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的銳利的思想武器。在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同志这一原理的时候，必須从实际出发，紧密結合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历史經驗和毛泽东同志的全部革命学說，結合实际斗争来領会这一原理。也只有深刻領会和掌握运用这一原理，我們才能更好地領会毛泽东同志的辯証法思想和他关于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学說；才能更好地領会和貫徹执行党的路綫、方針、政策；才能在理論斗争和实际斗争中坚持革命的馬克思列宁主义道路。这是我們学习这个原理的一些初步体会，請同志們指正。

关于矛盾問題的精髓初探

齐云 熊茂生 施蔭民

毛泽东同志在研究矛盾問題、对立統一規律时，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他在詳細地分析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后指出：“这一共性个性、絕對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問題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辯証法。”^①这一思想，是研究客观辯証法和主观辯証法的科学的概括，是研究辯証法对立統一規律的深刻的理論总结。深入地、全面地学习这一思想，对于掌握、应用馬克思主义的唯物辯証法，反对形而上学，具有十分深刻的意义。

毛泽东同志关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是事物矛盾問題的精髓的原理，是列宁的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列宁在研究辯証法諸問題时，提出了对立統一規律和学說是辯証法的实质和核心的思想。在这一思想中，列宁极其深刻地揭示了对立統一規律和辯証法的内在联系，揭示了对立統一学說在辯証法中的地位。列宁同时指出，这需要說明和發揮。毛泽东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总结了中國革命的丰富經驗，继承、丰富和发展了列宁的思想。他說：“……辯証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們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②要了解、掌握、应用辯証法，就必须掌握对立面的統一的規律、学說，就必须从研究对立面的統一的規律和学說入手。

对立統一的規律和学說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內容，要研究它，必須涉及很多的方面，毛泽东同志指出：“事物的矛盾法則，即对立統一的法則，是唯物辯証法的最根本的法則。……我們在研究这个法則时，不得不涉及广泛的方面，不得不涉及許多的哲学問題。如果我們將这些問題都弄清楚了，我們就在根本上懂得了唯物辯証法。这些問題是：两种宇宙观；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③这使我們懂得，研究对立統一的規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下同），第308頁。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2頁。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7頁。

律和学說，研究事物的矛盾的問題，就必須对以上問題进行具体研究。这也給我們研究事物的矛盾运动和对立統一的学說指出了一个具体的方向。遵循着这个方向，我們就能够正确地理解、掌握对立統一的规律和学說。

在探討上述問題时，有一个問題，需要我們十分認真地学习、研究，这就是关于矛盾究竟是什么的問題，或者說什么是矛盾內部的共同特征問題。这个問題关系着对整个对立統一的规律和学說的理解，因为不懂得矛盾是什么，就不可能理解对立統一的规律和学說。

矛盾就是对立面的同一和斗争，矛盾的共同特征就在于矛盾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因此，研究事物的矛盾和对立統一学說，必須着重地研究矛盾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問題。

毛泽东同志是在研究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問題之后，进而研究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因为仅仅了解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这是关于矛盾的普遍性的問題）是不够的，要具体地認識事物的矛盾及其运动，必須再研究矛盾是怎样具体組成的，矛盾双方具有什么特殊的关系，和矛盾的运动如何具体推动事物的发展（这是关于矛盾的特殊性的問題）。这些問題也就是矛盾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問題。因此，不能把同一性和斗争性看成是同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无关的問題。我們認為，这个問題就是在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互联結的原則指导下提出的，而且这个問題的解决也必須以这一原則为依据。

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是矛盾諸方面的共同关系，二者相互統一，矛盾的斗争性即存在于同一性之中，沒有斗争性就沒有同一性。矛盾諸方面又同一又斗争，它們的結合組成现实的矛盾，組成事物矛盾的运动，并且推动事物的发展。

矛盾的同一性也就是矛盾的特殊性、个性和相对性，这是同一性的根本特性，使它能和斗争性区别开来。矛盾的同一性和一定的条件紧密相关，矛盾双方的同一总是依赖于一定的条件，沒有一定的条件，矛盾双方就不能互相依存，也不能互相轉化。首先，矛盾双方的互相联結、互相依赖是有条件的，不是任何两个不同的事物都可以互相联結、互相依存組成一对矛盾。书和茶杯不能組成矛盾，因为它們之間沒有具备一定的条件，不能共处于一个統一体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可以組成矛盾，共处于一个統一体中，因为它們之間有了一定的条件。其次，矛盾双方的轉化，更加依赖于一定的条件。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暴力革命粉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夺取政权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镇压剥削阶级的反抗和建设社会主义（这些就是条件），才能使自己从被統治、被剥削的地位轉化到統治的地位。沒有一定的条件，矛盾双方就不可能轉化。同一性既然是有条件的、暫时的、易逝的，因而也就是特殊的、相对的，是个性。

矛盾的斗争性則是矛盾的普遍性、共性和绝对性，这是斗争性的根本特性，使它能和同一性区别开来。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相反，它无所不在，它的存在和作用是无条件的，不管矛盾双方共居时或互相轉化时，斗争都始終存在。并且矛盾双方共居的統一

体的产生、存在和破裂，都是由于不同发展程度的矛盾斗争的作用的结果。矛盾的斗争贯穿于事物运动、发展过程的始终，并且使得事物的运动、发展得以实现。正如运动、发展是无条件的一样，矛盾的斗争性也是无条件的。矛盾的斗争性既然是无条件的、常住的，因而是普遍的、绝对的，是共性。列宁说：“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同等作用）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①

矛盾的同一性是有条件的、特殊的、相对的，是个性。矛盾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普遍的、绝对的，是共性。斗争性存在于同一性之中，它们的结合组成矛盾的运动。

“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② “在同一性中存在着斗争性，在特殊性中存在着普遍性，在个性中存在着共性。拿列宁的话来说，叫做‘在相对的东西里面有着绝对的东西’。”③ 所以研究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就必须了解它们不同的特性，这是了解这个问题的关键。如果不懂得它，就不能正确了解同一性和斗争性。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要了解、掌握、应用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就必须懂得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并且在这个原则的指导下进行研究。了解对立统一规律和学说的其他问题也都是这样。因为，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原则，贯穿于对立统一规律和学说的各个方面的问题中，是所有这些方面都存在着的一种根本的关系。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观思维的过程中，矛盾贯穿于一切过程的始终，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矛盾着的事物及其每一个侧面各有其特点，这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任何矛盾都对事物及其运动发生作用，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矛盾由于地位和作用的不同区分为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这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任何矛盾都由互相对立的双方组成并且共同影响事物的性质，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由于地位和作用的不同，矛盾双方区分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是由占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这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矛盾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不断的，不管在它们共居时或互相转化时，都有斗争的存在，尤其在互相转化时，斗争的表现更为显著，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矛盾着的事物必须依一定的条件才有同一性，才能共居，才能互相转化，这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一切矛盾都必须通过斗争解决，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解决矛盾的方法，即斗争的形式则是多样的，因矛盾的性质不同而不同，这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如果离开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原则，对上述对立统一规律和学说的所有问题都不可能正确理解，也就不能正确理解、应用对立统一规律和学说本身。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原则，象一条红线贯穿于对立统一规律和学说的各个方面，是《矛盾论》的中心的基本的思想。毛泽东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版（下同），第408页。

②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1页。

同志把它作为矛盾問題的精髓，其深刻的意义首先就在这里。

二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原理是关于事物矛盾問題的精髓，即首先是客观辯証法的问题。因此，了解矛盾問題的精髓，必須首先从研究客观辯証法着手，从研究普遍性、特殊性和客观辯証法的关系，以及它們在客观辯証法中的地位、作用着手。

所謂矛盾的普遍性和絕對性，是指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观思維的过程中，并且貫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終。简单地說，矛盾的普遍性首先是承認矛盾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承認“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賴和相互斗爭，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①因此，是否承認矛盾的普遍性，是唯物辯証法和形而上学庸俗进化論的根本分歧之一，是关系着能否坚持辯証法的根本問題。

形而上学的或庸俗进化論的世界观，否認矛盾的普遍存在，因而也就否認事物的发展，它把世界的一切事物和现象都看成是永远彼此孤立和永远不变的。如果說有变化，也只是数量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这种变化的原因不在于事物內部矛盾的作用，而在于外力的推动。形而上学否認了矛盾的普遍性，也就否認了客观辯証法。

与形而上学相反，辯証法承認矛盾的普遍性，并且根据矛盾的运动闡明事物的发展。它認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內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內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引起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事物的外部矛盾則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并且这种外因必須通过內因而起作用。辯証法的世界观由于承認矛盾的普遍性，因此正确地揭示、闡明了事物存在和运动的原則，即客观辯証法。

矛盾的普遍性和絕對性問題，也是事物的共性問題。理解普遍性、一般性、共性，首先必須承認它指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并且貫串于过程的始終，同时还必須承認它是事物的共同本質和一般規律。只有这样才能对普遍性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恩格斯說：“自然界中的一般的形式便是規律”。^②列宁說：“必然性和普遍性是不可分割的”。^③“必然性=‘存在的一般性’（存在中的普遍性）……”。^④因此，否認矛盾的普遍性，也就否認了事物的共同的本質和普遍的規律。

矛盾的普遍性是事物矛盾問題的一个方面，它的另一个方面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所謂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首先是指矛盾着的事物及其每一个側面各有其特点。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并且貫串于过程的始終，但是由于条件的不同，矛盾各有其特点。不同性質的事物，矛盾各有特点。同一事物发展的不同过程或不同阶段，矛盾各有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3頁。

② 恩格斯：<自然辯証法>，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下同），第195頁。

③ <列宁全集>第38卷，第434頁。

④ <列宁全集>第38卷，第291頁。

特点。同一矛盾的不同方面也各有特点。所以，仅仅承认、了解矛盾的普遍性是不够的。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只能找到事物的一般规律和事物发展的普遍原因、普遍根据。研究事物的矛盾，还必须懂得矛盾的特殊性。

矛盾的特殊性同时也指事物的个性、各自的特征和特殊的本质、特殊的规律。任何事物内部都存在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这就是世界上诸种事物所以有千差万别的内在的原因，或者叫做根据”^①。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认识事物与事物间不同特性，无从认识各个事物的特殊本质，就不能找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原因和特殊规律。

是否承认矛盾的特殊性，是否正确地研究矛盾的特殊性，这关系着能否正确应用、贯彻辩证法的问题，关系着能否正确应用、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的问题。列宁说：“马克思辩证法要求对每一个特殊的历史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②又说：“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③列宁之所以特别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只有研究了事物的特殊性，才能把普遍和特殊，一般和个别，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才能具体地把握、应用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才能正确地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

研究事物的矛盾，关键在于理解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相互关系。任何事物、矛盾，既有普遍性的一面，又有特殊性的一面，而且这两个方面是统一的。只了解事物的普遍性，不能够正确认识事物。只了解事物的特殊性，也不能正确认识事物。只有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才是世界、事物、运动的完整图画。只有理解了它们的相互关系，才能正确把握事物及其矛盾。

普遍和特殊、一般和个别是对立的统一的关系。

普遍与特殊是差别的、对立的，普遍不同于特殊，特殊也不同于普遍。普遍指事物的共性，一般性，共同本质和一般规律。特殊指事物的个性，各自的特征，特殊本质和特殊规律。普遍与特殊有其质的规定，彼此间有确定的界限，二者不能完全等同，不容混淆。

普遍与特殊虽然对立，但这种对立只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因为在对立中有着同一，在差别中有着联系。普遍与特殊是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二者相互联结，统一地存在于一个事物之中。任何一个事物、矛盾，都是普遍与特殊相互联结的统一体。以社会生产说来，任何一种生产都具有自己的个性和特征，同时它包含着共同的一般的规定。马克思说：“说到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可是，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④因此，任何一个时代的生产都是该时代的特征和一切时代的共同规定的统一。没有绝对特殊的生产，也没有绝对一般的生产。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7页。

② 《列宁全集》第22卷，第311页。

③ 《列宁全集》第31卷，第144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版（下同），第735页。

普遍与特殊互相联系、互相依存。从普遍性来看，任何普遍都不是和特殊相脱离的。首先，任何普遍都是个别、特殊的一部分、一方面或本质，就是说，普遍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包括着个别和特殊的某些方面、某些部分或本质。因为普遍就是个别和特殊之中的共同的、一般的东西，就是由这些共同的一般的东西构成的。生产一般是各个历史时代的特殊生产的一部分或本质，是由各个特殊生产的共同的一般的东西构成的。在社会生产发展的历史上，存在着的只是和一定历史时代相联系的特定的生产，生产一般就是存在于它们之中，离开了它们，也就无所谓生产一般。因此，普遍和一般绝对不能离开特殊和个别而现实地、独立地存在。客观唯心主义者柏拉图等不了解普遍和特殊，一般和个别的辩证法，不了解普遍的一般的东西只能通过个别的特殊的东西而存在。他们认为一般脱离个别，并且先于个别而独立存在，认为一般创造个别。列宁指出：“原始唯心主义认为：一般（概念、观念）是单个的存在物。这看来是野蛮的、骇人听闻的（确切些说：幼稚的）、荒谬的。”^①可见，夸大普遍和一般，使它成为脱离个别并创造个别的東西，是客观唯心主义的認識論根源。

从特殊性方面来看，个别、特殊也是和一般、普遍相互联系的。任何个别都包含着一般的普遍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个别都是一般。但是，个别并不等于一般，因为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包括在一般之中，因为个别除了包含有一般的东西，还有其特殊性。普遍和特殊，一般和个别相互依存，没有不包含一般的个别，也没有离开个别的一般。但是它们的地位并不是等同的。其中个别、特殊是基础，一般存在于个别之中，普遍存在于特殊之中，没有个别就没有一般，没有特殊就没有普遍。否认这一点，也就是否认了唯物主义。

普遍和特殊既然是对立面的统一，是互相依存，互相联结的，因此，在一定条件下，它们必然互相转化。普遍和特殊的转化，是指在一定条件下，原来是普遍性的东西可以变成特殊性的东西，原来是特殊性的东西可以变成普遍性的东西。这种转化的可能，在于普遍和特殊的联结，二者没有绝对的界限，二者互相渗透。毛泽东同志揭示了普遍和特殊互相转化的条件，他说：二者的互相转化是“由于事物范围的极其广大，发展的无限性”。^②这就是说，由于事物范围的极其广大，在不同的范围、场合下，二者可以互相转化。由于发展的无限性，在不同的发展过程、阶段上，二者可以互相转化。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及其发展规律，对于整个物质世界的运动来说，它是一种特殊性的东西，只是物质运动的一种形式所具有的，但是对于人类社会的各个不同形态来说，它又是普遍性的东西，是各个社会形态的基本矛盾。这是由于范围不同而发生的转化。由于事物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二者也互相转化。商品生产在封建经济条件下已经存在，但只是特殊性的东西。在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它才是普遍性的东西。

普遍和特殊，一般和个别的互相转化，说明客观事物及其矛盾本来不是死的、凝固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第420—42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6页。

的、僵化的，而是活生生的、不断运动、不断变化的。因此，看任何一个事物，矛盾都不能凝固化，必須看到其中的普遍和特殊的相互联结，看到普遍性的一面，又看到特殊性的一面，看到在一定条件下它是特殊的，在另一定条件下又可能是普遍的，反之亦然。

掌握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必須注意它們的絕對性和相对性的問題。矛盾的普遍性是絕對的，矛盾的特殊性是相对的，这里主要在于說明普遍性和特殊性的不同特点。矛盾的普遍性具有这样的特点：在事物的发展中，它的存在和作用是必然的，无条件的，因为它是事物或矛盾中最根本、最一般的东西，只要这一类的事物存在和发展，不管它們各自存在和发展的特殊条件是什么，普遍性总是存在和起作用的。事物的某些条件和各个具体事物虽然經常变动，是易逝的，暫时的，但是普遍性的存在和作用是无条件的，不受条件的限制，所以它是常住的，长久的。普遍性是无条件的、常住的、长久的，这就是它的絕對性。

与普遍性的絕對性相对立，矛盾的特殊性則是相对的。也就是說，矛盾的特殊性总是有条件的，与一定的具体条件相联系。奴隶和奴隶主，农民和地主，无产者和資产者，这些不同的階級以及它們之間不同的对立，都是由不同的社会經濟条件决定的。条件变化，特殊性也变化，条件不同，特殊性也不同。可以說，正是条件及其变化，形成了事物的特殊性。特殊性既然是有条件的，条件是不断变化的，因而特殊性也是經常变化的，是易逝的、暫时的。这就是特殊性的相对性。

普遍性的絕對性和特殊性的相对性不同，二者必須明确地区分。对于一个事物不仅要看到它的普遍性，而且要看这种普遍性是絕對的。如果只承認普遍性，而不承認它的絕對性，把普遍的东西看成是相对的，那就不可能真正把握普遍性，而且必然要犯錯誤。同样，承認事物的特殊性，还要看到这种特殊性是相对的。如果否認特殊性的相对性，把特殊的东西看成是絕對的，那就不能正确把握特殊性，也必然要犯錯誤。詭辯論者口头上也承認普遍和特殊的区分，但是他們不了解或者不承認普遍性是絕對的，特殊性是相对的。相反，他們任意地把絕對的普遍的东西說成是相对的，把相对的特殊的东西說成是絕對的，因而导致到錯誤的結論。

絕對和相对不同，但二者不是截然分开，而是互相联系的。絕對由相对組成，相对之中有絕對。沒有相对的特殊性，就沒有絕對的普遍性。所以要看到二者的区分，又要看到二者的联系。夸大二者的区别，把它們絕對对立起来是不对的。只承認相对否認絕對的相对主义和只承認絕對否認相对的絕對主义都是錯誤的。夸大特殊性的相对性，認為相对只是相对，不包含任何絕對的普遍的东西，并且以此去否定普遍的东西，这是相对主义的一种表现。由此可见，不了解普遍性的絕對性和特殊性的相对性及其关系，就不可能真正了解普遍性和特殊性。

任何事物或矛盾都是絕對的普遍性和相对的特殊性的对立統一，这是事物矛盾問題的本質。因此，要懂得事物的矛盾以至客观辯証法，都必須首先懂得絕對的普遍性和相对的特殊性及其关系。如果不了解矛盾的本質，即絕對的普遍性和相对的特殊性的对立

統一，當然就不能理解事物的矛盾和矛盾法則，不理解作為辯證法的核心的矛盾法則，也就不能正確理解和把握客觀辯證法，而辯證法最終不免要流為空話。由此可見，作為矛盾問題的精髓，首先是關係着客觀事物的矛盾和客觀辯證法的。也就是說，絕對的普遍性和相對的特殊性的對立統一是事物的矛盾和客觀辯證法（事物存在的原則）中的最根本的原則。

三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這一共性個性、絕對相對的原理首先是事物的矛盾問題的精髓，是客觀辯證法的最根本的原則。同時，它又是主觀辯證法的最根本的原則，因為客觀的辯證運動和主觀的辯證運動，只不過是同一物質世界的不同的運動形式，從根本上說，它們具有、遵循同一的規律，主觀辯證法只不過是客觀辯證法在人的頭腦中的反映。因此，研究普遍和特殊為什麼是矛盾問題的精髓，為什麼不懂得它就等於拋棄了辯證法，還必須解決它在人類的認識和辯證思維中的地位 and 作用的問題。列寧在談到對立統一規律是辯證法的實質和核心時指出，辯證法，特別是對立統一規律，不僅是客觀世界的規律，而且是認識的規律，並且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他說：“對於辯證法的這一方面（即對立統一規律是辯證法的實質和核心——引用者），通常（例如普列漢諾夫）沒有予以足夠的注意：對立面的同一被當做實例的總和……而不是被當做認識的規律（以及客觀世界的規律）。”^①

毛澤東同志從列寧的思想出發，豐富和發展了這一思想，指出辯證法這個世界觀，作為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主要地就是教導人們要善於認識矛盾和解決矛盾。如何正確地揭示、認識、解決矛盾乃是辯證法的中心。因此，不能離開矛盾問題來談辯證法，否則就不能真正理解辯證法，就必然會否認、拋棄辯證法。上面說到，毛澤東同志闡明了矛盾的本質，指出一切事物、矛盾都是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個性、絕對和相對的統一。這是一切事物、矛盾的共同特征，也是它們根本的關係。毛澤東同志把這一原理應用到認識論上，闡明了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重要原理。

毛澤東同志指出，就人類認識發展的历史說來，“就人類認識運動的秩序說來，總是由認識個別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擴大到認識一般的事物。人們總是首先認識了許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質，然後才有可能更進一步地進行概括工作，認識諸種事物的共同的本質。當着人們已經認識了這種共同的本質以後，就以這種共同的認識為指導，繼續地向着尚未研究過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過的各種具體的事物進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質，這樣才可以補充、豐富和發展這種共同的本質的認識，而使這種共同的本質的認識不致變成枯槁的和僵死的東西。”^②毛澤東同志這一論述，具體闡明了人類認識史的發展

① <列寧全集>第38卷，第407頁。

② <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98頁。

展规律，指出人类的認識是从个别到特殊再到一般，然后再在一般的指导下去認識个别的、特殊的东西，人类認識就是这样永不穷尽地、循环往复地向前发展。

恩格斯指出，从人类認識史的发展看，对于运动形态的相互轉化的認識，大致經歷了三个阶段，这种在不同的实践中所取得的不同的認識，反映在三个不同的判断中：“摩擦是热的一个源泉。”“一切机械运动都能借摩擦轉化为热。”“在对每一场合的特定的条件下，任何一种运动形态都能够而且不得不直接或間接地轉变成其他任何运动形态。”恩格斯认为，第一个判断是个别性的判断，第二个判断是特殊性的判断，第三个判断是普遍性的判断。^①对运动形态的轉化的这种認識，有力地說明了人类認識的发展是遵循着从个别到特殊再到一般的规律。

按照关于普遍和特殊、一般和个别相互联結相互轉化的观点，在人类認識史上，凡是个别的認識同时也是一般的認識，凡是特殊性的認識同时也是普遍性的認識，因为它们之間不是绝对对立或绝对分离的。摩擦是热的一个源泉，这是个别性的認識，因为它只反映了摩擦这样一种机械运动的个别性的形式和热运动的联系。同时，它还是一般性的認識，因为它概括了无数的特殊的摩擦运动的共同的东西，揭示了摩擦这样一种机械运动的一部分特性和一个方面的本质。人类正是在取得了这个一般性的認識后，以它作为实践的指导，繼續去認識、研究那些尚未研究或尚未深入研究过的有关机械运动的现象，这样才可能进一步取得“一切机械运动都能借摩擦轉化为热”的認識。这一認識比前一認識更为深刻、丰富，是前一認識的进一步发展和提高。这一認識也还是个别性特殊性的認識，因为它还没有反映一切运动形态都可能互相轉化这样最普遍最一般的现象，或者说，它只反映了这种最普遍最一般的现象的一个方面。但是，它同时也是一般性普遍性的認識，因为它揭示了一切机械运动的一个方面的共同本质。正因为它同时是一般性的認識，所以認識才能在其指导下繼續发展，并取得任何运动形态都可以互相轉化的最普遍最一般的認識。当然，人类的認識发展到此并没有完結，还有很多关于运动形态相互轉化的具体现象需要进行研究，只有繼續不断地深入研究各种有关的特殊现象，上述这个最普遍最一般的認識才能越来越丰富，越具体，才能繼續向前发展，关于运动形态的互相轉化的認識永远不会穷尽。

人类認識史和自然科学的发展都表明，从个别、特殊到一般和从一般到个别、特殊，这是两个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的过程，它们的相互联結就是認識运动发展的规律。同时，它们也表明，正确掌握、处理普遍和特殊，一般和个别的关系是認識和科学发展的关键，如果錯誤地解决这一問題，将会严重影响人类認識和科学的发展。

从个别、特殊到一般，又从一般到个别、特殊，这是整个人类認識发展的规律，也是每个个人認識事物的发展规律。因为整个人类和单个人的認識都同样地受着同一规律的支配。

認識规律对于个人認識和認識过程的发展的规定、制約，首先表现在認識的目的和

^① 参看恩格斯：《自然辯証法》，人民出版社版，第186—187頁。

任务的确定上。依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观点，认识的任务不仅是了解事物是什么，更重要的在于，揭示事物的内部矛盾，揭示、把握事物的一般性普遍性，即事物的规律性和本质，或者说取得关于事物的理论的认知。而认识的目的在于运用关于事物的理论的认知去指导实践，改造世界。

明确了认识的目的和任务，必须进一步解决认识的起点和途径。认识的任务在于取得关于事物的一般性的、普遍性的认知。那末，怎样才能取得这种认知，认识应该从何开始？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告诉我们，普遍和特殊，一般和个别，共性和个性是相互联结的，前者存在于后者之中，没有个性，也就无所谓共性。因此，必须通过个别去把握一般，通过特殊去把握普遍。认识必须从个别的特殊的东西开始。对于个别的特殊的东西的认知，是认识运动的起点。列宁在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社会学时，指出他们不懂得认识必须从个别的特殊的东西开始。他们不去具体地研究一种具体的社会形态或社会关系，总是抽象地空洞地谈论什么一般社会、一般进步等。列宁指出，“从什么是社会、什么是进步等问题开始，就等于从尾开始”^①。离开了对于个别的特殊的东西的认知，就不可能科学地揭示一般的、普遍的规律。

对于个别的、特殊的东西的研究，是为了取得一般性、普遍性的认知，因此，在从个别上升到一般，特殊上升到普遍的过程中，也必须以个别和一般，特殊和普遍对立统一的原则作指导。普遍性和特殊性虽然不同，但二者互相联结并且互相转化，因此在对个别性、特殊性的东西进行研究时，关键在于时刻揭示、把握它们之间的普遍性、共同性。只有这样，认识才能够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从特殊上升到普遍，才不会局限、停留在个别的、特殊的东西之上，才不会为其所迷惑。

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从特殊上升到普遍，这只是认识过程的一个阶段，整个认识过程并没有到此结束。从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来说，掌握了事物的一般性、普遍性，并不等于穷尽了对这一事物的认识。任何一个事物的特性、本质都是多方面的，各种各样的，是一次认识所不可能穷尽的。同时，在一定的时间和条件下，人们接触、研究的个别事物是很有限的，还有许多同一范围内的尚未研究或尚未深入研究的具体事物需要进一步研究。因此，在从个别、特殊上升到一般以后，认识还必须从一般再回到个别、特殊去。在这里，同样必须遵循普遍和特殊、一般和个别的对立统一的原则。必须了解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进入到一般之中，必须承认它们的相互转化，并且了解从认识一般转化为认识个别乃是必然的。从个别、特殊到一般，又从一般到个别、特殊，这才是一个完整的认识过程。认识过程的后一阶段的绝对必要，更重要的在于它关系着认识的目的的实现。毛泽东同志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②认识对于世界的这种能动的改造作用是

① 《列宁全集》第1卷，第123—12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0—281页。

通过实践实现的，即通过用一般性的認識指导行动，依据这种認識去解决矛盾，改变事物，推动事物的发展而实现的。如果割裂認識的过程，让認識停留在一般性上，不去进一步研究个别的特殊的东西，那末改造世界的目的就不可能实现，而这种認識本身也就会变成枯槁的僵死的东西。

这样，我們就清楚地看到，不仅整个人类認識的发展遵循着普遍和特殊、一般和个别的辯証法，而且个人对具体事物的認識，一个完整的認識过程的发展也是如此。在这里，关键在于正确地理解、应用、貫徹普遍和特殊的辯証法，这样才能正确地認識和正确地行动。违反或者离开了普遍和特殊对立統一的原則，不可避免地要陷入各种各样的錯誤。

馬克思主义辯証法告訴我們，关于事物的一般的、普遍性的認識，不是通过簡單的抽象就可以取得的，这是一个复杂的辯証思維的过程。因为这里所說的普遍，“不只是抽象的普遍，而且是自身体现着特殊、个体、个别东西的丰富性的这种普遍（特殊的和个别的東西的全部丰富性！）！”^①毛泽东同志进一步具体地說明了这种普遍的理論的認識的特征，他指出，这种認識“到达了事物的全体的、本質的、內部联系的东西，到达了暴露周围世界的內在的矛盾，因而能在周围世界的总体上，在周围世界一切方面的內部联系上去把握周围世界的发展”^②。这样就可以看到，所謂普遍性的認識是关于事物总体的、內在矛盾的和內部联系的認識，它从个别、特殊而来，包含个别、特殊的全部丰富性于其中。因此，它虽然通过对个别、特殊的分析和綜合而来，但却比个别、特殊更为具体。

这种普遍性的認識是經過怎样辯証的思維、理論的思維，在思維行程的結果所获得呢？馬克思指出，这是通过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辯証思維的方法所获得的。所謂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思維从抽象的规定开始，对直观和表象进行加工改造，逐步在思維中具体地再现事物的总体。馬克思說：“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維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具体总体作为思維总体，事实上是思維的理解的产物；但是决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駕于其上而思維着、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实在主体仍然是在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只要这个头脑还仅仅是思辨地、理論地活动着。”^③

这种辯証的理論思維同样地遵循着辯証法的規律，受辯証法和普遍与特殊对立統一的原則所支配。辯証思維，从抽象上升到具体，都是思維認識、再现现实事物，它們的正确是以与客观世界的符合为标志的。

怎样确定思維的起点，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辯証思維需要首先解决的問題。所謂思維的出发点問題，就是选择、确定事物总体的某一个别部分来展开对事物总体的研究，也就是从事物的复杂的矛盾中选择哪一个矛盾展开研究的問題。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第98頁。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5頁。

③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51—752頁。

我們認為，作为辯證思維的出发点的簡單的抽象的规定，必須具有这样的特征：它是从事物总体中抽取出来的一个矛盾或一个部分、一个方面。这是一个特殊的矛盾，具有这一事物的質的特点，不会和其他事物的矛盾混淆起来，同时它又是这一事物的基础或规定这一事物的特殊本質，它还必須是事物发展的胚芽和动力，包含了該事物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因素，它的发展、展开可以显示事物的一般内容和整个的面貌。可以看出，不懂得或不能正确应用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对立統一的原則，就无法正确闡明作为辯證思維的出发点的抽象的一般特征，更无法在辯證思維中找到正确的出发点。辯證思維的出发点問題是和事物矛盾的辯證法紧密相关的。

在解决了思維的出发点以后，辯證思維还必須进一步解决如何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即怎样从出发点开始，逐步在思維中再现现实具体的問題。这个問題的解决，也必須以辯證法和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对立統一的原則为依据。依据这样的原則，所謂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就是在思維中逐步揭示、闡明事物矛盾各个方面的各种各样的特殊性，同时揭示、闡明它們之間的內在联系，共同的和一般的性質。总之，就是揭示、闡明事物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相互联結。

要研究事物、矛盾的特殊性，揭示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联結，在思維中再现现实的具体总体，首先必須研究事物的发展，主要是研究不同过程、不同阶段以及它們的联系。在这里必須坚持矛盾普遍性观点，承認决定这一事物作为这一事物而存在的矛盾貫串于該事物的不同过程和不同阶段的始終。研究发展中的矛盾的特殊性就是要揭示这一矛盾在不同发展过程和不同阶段上的独特变化与表现，揭示这一矛盾变化发展怎样引起其他矛盾的独特变化以及它們独特的相互关系，为此就必须找出、抓住不同过程或不同阶段中根本的主要的矛盾。在揭示不同过程、不同阶段主要矛盾的特殊性时，絲毫不能忘記矛盾的普遍性。因为同一事物不同过程的主要矛盾，是該事物基本矛盾的不同表现，或为該矛盾所规定、影响。同一过程的不同阶段的主要矛盾，是該过程的主要矛盾的表现，或为該矛盾所规定、影响。所以这里必須揭示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相互联結。不仅要揭示任何过程或阶段存在着一定的主要矛盾（这是普遍的、絕对的），而且要揭示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复杂关系及其在一定条件下的轉化（这又是它們的特殊性）。

从抽象上升为具体的辯證思維过程，除了从事物、矛盾的发展去研究之外，还必須从普遍联系去揭示事物、矛盾內部的各个部分和方面的相互关系。毛泽东同志指出：“为要暴露事物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在其总体上、在其相互联結上的特殊性，就是說暴露事物发展过程的本質，就必须暴露过程中矛盾各方面的特殊性，否則暴露过程的本質成为不可能，这也是我們作研究工作时必須十分注意的。”^① “所謂了解矛盾的各个方面，就是了解它們每一方面各占何等特定的地位，各用何种具体形式和对方发生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关系，在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中，以及依存破裂后，又各用何种具体的方法和对方作斗争。”^② 为此，必須研究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矛盾諸方面的同一性与斗争

^{①②} 分別見《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9、300頁。

性，矛盾斗争的形式等。

由上所述，研究了矛盾在其发展中的特性，又研究了它在发展每一步上各个方面的特性及其相互关系，这就能够在其总体上、在其相互联结上、在其本质上把握矛盾，也就是在思维中具体再现现实的矛盾，这就是辩证思维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过程的方法与原则。只有依据毛泽东同志关于矛盾问题、关于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原理，才能正确地、具体地阐明和应用这个原则与方法。

以上的分析，说明在认识的领域中，在有关认识问题的各个方面，都必须正确地理解和应用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原理，因为事物、矛盾本身就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它是事物、矛盾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则，也是认识运动、发展的根本原则。离开了这个根本原则，就不能正确地具体地理解、阐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不能正确地具体地理解、阐明认识的运动和发展，也不能正确地具体地认识客观事物和矛盾。从认识方面看，这一原理是矛盾问题、乃至整个辩证法的精髓。

*

以上论述，说明毛泽东同志关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矛盾问题的精髓的原理，包含着极其丰富而深刻的內容。辩证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主要地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事物的矛盾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要正确地认识矛盾和解决矛盾，就必须正确地了解、应用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统一的原则。因为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是理解和运用对立统一规律的关键，不了解它，就无法了解和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去认识矛盾、解决矛盾。同时，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还是客观事物存在与运动的根本原则，反映到认识中来，又是认识辩证运动的根本内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正是应用这一原则，正确地反映、阐明了认识运动的根本规律，因此，它也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中心内容。由上面的分析可以说，不懂得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及其相互联结的原理，就不懂得对立统一规律，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即抛弃了自然辩证法、历史辩证法和认识辩证法。当我们从事革命斗争的时候，这一原理的理解与运用就关系到革命事业的成败与发展。所以，坚持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相互联结的原理，无论是在理论上，或在实践上都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一九六三年二月

无产階級階級斗争学說的实质

(讀書札記)

云 階

除了原始社会以外，“迄今存在过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階級斗争的历史”①。

社会之分裂为对立着的各个階級，早已成为明显的事实，远在馬克思主义誕生很久以前就已被人发现和承認了的。許多資產階級的思想家，如十八世紀英国的古典經濟学家亚当·斯密、李嘉图，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門、傅立叶等人，都有过关于階級、階級斗争的言論。

恩格斯曾这样写道：“如果說在先前各个时期要考察这些历史动因差不多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这些动因跟它們的后果間的联系是被混淆和掩盖的，那末现今这种联系已經如此簡單化，以致解答迷語已終于成为可能了。自从采用大工业生产时起，即至少是从一八一五年欧洲和約时起，在英国已是誰也知道，这个国家里全部政治斗争都是以两个階級即土地所有者貴族和資產階級夺取統治的意向为重心了。在法国，从波滂王族返国时起，同样的事实也令人意識到了。复辟时期的历史家，从梯也里到基佐，民耶和梯也尔，都經常指出这个事实是理解中世紀以来法国历史的钥匙。而自一八三〇年起，在所有这两个国度里面，工人階級即无产階級都已被認為是爭取統治权的第三个战士。当时关系已經如此簡單化，以致只有故意閉起眼睛的人們才看不见，这三个巨大階級的斗争以及它們利益的冲突，乃是——至少是上述两个最先进国度內——全部近代史的动力所在。”②可见，随着資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社会上的階級和階級斗争存在的事实，越来越被人們看得清楚了。

但是，看到和承認階級和階級斗争的存在是一回事；用什么階級立场、观点、方法来認識和分析它，并且找出它的发展规律，又是一回事。資產階級的思想家站在資產階級立场，認為无产階級以及其他劳动階級的存在，只是为了服从資產階級的統治和剝削；无产階級的階級斗争范围只能被限制在資產階級所允許的領域內，也就是說，无产階級的階級斗争不能触动資產階級的統治基础和他們的根本利益。資產階級根本不想也不敢承認資本主义社会的階級斗争的結果会导致他們自身的灭亡和无产階級取得政权实行专政这一真理。資產階級的思想家，由于受到資產階級私利的蒙蔽，他們根本不可能正确地認識和科学地說明階級和階級斗争的规律，包括資本主义社会的階級和階級斗争

①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1954年莫斯科中文版，第8頁。

②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1954年莫斯科中文版，第391—392頁。

的規律，而几乎毫无例外地加以各种歪曲。正确地認識和科学地說明階級和階級斗争的規律，只有代表无产階級思想的馬克思列宁主义。

在資本主义誕生的同时，也就誕生了資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无产階級。随着資本主义制度的发展，資本主义的矛盾日益加深，推翻資本主义制度的历史任务就提到議事日程上来了。为了实现这一崇高的历史任务，掌握起革命的武器，伟大的无产階級革命导师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了无产階級的階級斗争的理論，就是馬克思主义的階級斗争学說。

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階級斗争学說，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經典著作中有过全面、深刻而又系統的闡述。一八五二年馬克思在致約·魏德迈的信中說：

“至于講到我，無論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階級存在或发现各階級間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資产階級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階級斗争的历史发展，資产階級的經濟学家也已对各个階級作过經濟上的分析。我的新貢獻就是証明了下列几点：1. 階級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 階級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階級专政；3. 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階級和进入无階級社会的过渡。”^①

列宁在分析这一段話时，曾着重地指出了两点。第一，馬克思在这里闡述的階級斗争概念同資产階級学者所說的階級斗争概念有着最根本的区别；第二，馬克思这段話最清楚地闡明了无产階級的国家学說，也是階級斗争学說的实质。列宁批判了那些站在資产階級立场上对馬克思主义所作的机会主义的歪曲。这些人把馬克思主义偷偷改成資产階級可以接受的东西。認為馬克思学說中的主要内容只是承認階級斗争，这是不正确的。列宁說：

“誰要是仅仅承認階級斗争，那他还不是馬克思主义者，他可能还没有走出資产階級思想和資产階級政策的圈子。用階級斗争学說来限制馬克思主义，就是割裂和歪曲馬克思主义，把馬克思主义变为資产階級可以接受的东西。只有承認階級斗争、同时也承認无产階級专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义者。馬克思主义者同庸俗小資产者（以及大資产者）之間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必須用这块試金石来測驗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認馬克思主义。”^②

由此可见，馬克思列宁主义階級斗争学說的实质，就在于“承認階級斗争、同时也承認无产階級专政”、“階級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階級专政”。它的中心思想是：一、按照社会生产发展的規律，資产階級与无产階級的階級斗争，其結局必然是新兴的无产階級专政代替資产階級专政，新兴的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資本主义制度；二、无产階級专政代替資产階級专政必須通过残酷的階級斗争来实现，无产階級在階級斗争中必須推翻資产階級政权，彻底粉碎資产階級的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階級专政；三、階級斗争不仅存在于过去任何一个私有制的社会，也存在于从資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整个历史时

① 《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63頁。

② 《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版（下同），第399頁。

期，即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只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消灭阶级，从而进入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离开了无产阶级专政来侈谈阶级斗争，那至多是自由主义的空谈。

资本主义制度要为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这是一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但是社会主义制度是不会自动诞生的，它必须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才能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任务，在于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消灭一切阶级，而不是其他。从无产阶级形成的那一天开始，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就开始了，并且由不自觉进行斗争转变为自觉地进行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指示说，无产阶级必须在三个领域内进行阶级斗争，经济的、政治的和思想的，但是政治斗争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占居首要的地位，而在政治斗争中，夺取政权是最主要的。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直接目标就是经过无产阶级革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列宁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形式多种多样，内容日益丰富，它必然要成为无产阶级以夺取政权（“无产阶级专政”）为目标的政治斗争。”^①如果不把阶级斗争引导到无产阶级专政，那末，社会主义就是空话。列宁说：“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不弄清这一点，便谈不上自觉地参加革命，更不用说领导革命。”^②又说：“毫无疑问，任何一个革命的最主要的问题都是国家政权问题。政权在哪一个阶级手里，这一点决定一切。”^③这一真理是由无数的历史事实所证明了的。如果说，从奴隶社会进到封建社会、封建社会进到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新的剥削制度代替旧的剥削制度，这样的革命都需要夺取政权，那末，以消灭一切剥削、消灭一切阶级为目的的无产阶级革命，那更需要夺取政权了。无产阶级只有在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关系，组织社会主义大生产，逐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如果不引导到无产阶级专政，即夺取政权的斗争，那末，它就必然局限在资本主义关系的框框内和资产阶级允许的范围內打转，丝毫不能触动资本主义统治的根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末，所进行的阶级斗争不过是无产阶级争取较好的出卖劳动力条件给资本家而已，无产阶级还是注定要做资产阶级的奴隶。问题是非常明了的：要么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引导到无产阶级专政；要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继续做奴隶。因此，不把阶级斗争引导到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使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服从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

无产阶级在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之后，必须把阶级斗争继续进行到底。列宁说：“夺得了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并不因此停止自己的阶级斗争，而是用另外一种形式、另外一种方法把斗争继续进行下去。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权这个工具进行的阶级

① 《列宁全集》第21卷，第51—52页。

② 《列宁全集》第24卷，第18页。

③ 《列宁全集》第25卷，第357页。

斗争。”^① 那种认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革命就告结束或很快就要结束的观点，实质上是一种资产阶级观点。资产阶级在进行反封建革命时总是把取得政权当作革命的结束。按照列宁的说法，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终结而是无产阶级革命在新的条件下的开始。

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之后，就开始了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时期。这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和生长着的共产主义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斗争的时期。也就是说，整个过渡时期从始至终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这样的条件下，无产阶级专政本身就是阶级斗争的继续。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为反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而进行的顽强斗争，即流血的与不流血的，强力的与和平的，军事的与经济的，教育的与行政的斗争。”^② 不把阶级斗争进行到底，不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就有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因此决不能把无产阶级专政看作是转瞬即逝的事情。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离开了无产阶级专政，共产主义就是空话，因为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帮助资本主义进行反革命复辟。而只有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保证共产主义的前途，保证无产阶级革命完成自己的消灭剥削、消灭阶级的任务。列宁指出：“向前发展，即向共产主义发展，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决不能走别的道路，因为再没有其他人也没有其他道路能够粉碎剥削者资本家的反抗。”^③ “一个阶级专政，不仅一般阶级社会需要，不仅推翻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需要，而且，从资本主义过渡到‘无阶级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都需要，只有了解这一点的人，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④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引导到无产阶级专政，那就沒有社会主义的前途；在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离开了无产阶级专政，那就沒有共产主义的前途，只能招致资本主义的复辟。所以，列宁强调指出：“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庸俗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测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⑤

① 《列宁全集》第30卷，第238页。

② 《列宁全集》第31卷，第26页。

③④⑤ 分别见《列宁全集》第25卷，第448、400、399页。

論明代里甲法和均徭法的关系

梁 方 仲

引 言

关于明代徭役的三大类别及編派对象或方法之不同，《明史·食貨志·賦役》曾以几句最簡單的話概括出来，說道：

“役，曰里甲，曰均徭，曰杂泛，凡三等：以戶計曰甲役，以丁計曰徭役，上命非时曰杂役。皆有
力役，有雇役。府、州、县驗丁口多寡，事产厚薄，以均适其力。”

又云：

“迨造黄册成，以一百十戶为一里，里分十甲，曰里甲，以上中下戶为三等，五岁〔一〕均役，十岁
一更造〔黄册〕。一岁中諸色杂目应役者，編第均之，良〔差〕、力〔差〕从所便，曰均徭。他杂役，
曰杂泛。”

作为明代二百七十余年中徭役制度的总括性的引言，这两段話基本是正确的。除了“上命非时”的杂役比較沒有多大系統可談以外，在洪武中年成立的里甲法和正統初年創行的均徭法都是明代徭役制度史中的重大事件。可惜《明史·食貨志》书中並沒有交代得很清楚。讀者如不細讀全書，只以上引两段話为凭，便不免会产生这两种役法是在同时制定的錯觉，从而对明代徭役制度的发展过程难得有正确的理解。这一情况在有些課本和許多論文中都可以察觉出来。几年来，我也曾收到过几封从远道的来信，征求我对于这两种役法的关系一类問題的意见。最近又在《历史教学》第4期上讀到了銜微先生《明代的里甲制度》一文，說到关于这一制度的內容，“至今在有关著作中还没有給以滿意的解释”。文中提出了若干新的解释，又認为“十甲輪役”并不是里甲制所行的办法，而只是均徭制中的办法等等。这些都是值得商榷的。关于明代里甲制的探討，我另有專文，将在《中山大学学报》发表。本文只以里甲法和均徭法的关系为中心，并就此展开几个有关問題的討論。

在写作过程中，我有几点体会：首先是，古書上的記載，备极紛紜矛盾。即如，同一內容的东西，在历史文献上往往有不同的名称；而同一的名称，在不同时期內，又往往具有不同的內容。如何判断其是非，辨別其差异，自不能以校勘文字上的异同为滿足，而必須結合到当时的历史、社会諸条件用辯証唯物的观点来考察，才能得出正确的結論。这一方面的工作，我作得很不够深入。其次，《明史》和明代諸官書所記載的大半是明中央政府的政令法規，不只是官樣文章，不能够說明問題，且与各地方的实施情

况大有出入。本文所已利用的方志和私人記述的資料还很不充分。最后，可是最重要的一点，有关的历史文献，几乎全部出自地主阶级和封建文人之手，所記載的不只是不尽不实，且常有严重歪曲历史事实的情况存在。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來闡明历史的真相及其发展的过程和规律，这一方面的工作，本文更是作得最不成熟的了。希望同志們多加指正。

一、几条基本史料的异同校勘及其詮釋

明代里甲制度是在洪武十四年（1381年）正式在全国范围内建成，此事諸书所載皆同，唯頗有詳略之分，且在个别字句上互有差异。为了澄清認識以便討論起见，今試以成书較早——永乐初年修的《太祖实录》來和成书較晚——正德間初修的《后湖志》和万历刊行的《大明会典》进行互校。下面轉录的是《太祖实录》卷一三五的原文，括弧符号內所記的則为《后湖志》卷四“事例”和《万历会典》卷二十“戶部”七“戶口”二所引的洪武中年《諸司职掌》的条文而与《实录》有显著的歧异者，其无关重要的异文不复注明。《实录》原文云：

“洪武十四年正月。是月，命天下郡县編賦役黃冊。其法：以一百一十戶为里。一里之中，推丁糧（《后湖志》及《会典》皆无“糧”字）多者十人为长；余百戶，为十甲；甲凡十人。岁役：里长一人，甲首十人（上两书无此四字），管摄一里之事。城中曰坊，近城曰廛，乡都曰里。凡十年一周，先后則各以丁糧（“糧”字上两书皆作“数”）多寡为次。每里編为一冊。冊之首，总为一图。其里中鰥寡孤独不任役者，則帶管于百一十戶之外，而列于图后，名曰畸零〔戶〕。冊成，为四本：一以进戶部，其三則布政司、府、县，各留其一焉。”

从上可见，洪武十四年初編賦役黃冊时，关于里长的推定，和里甲应役次序的編排，据《后湖志》和《会典》所記，仅以丁数的多寡为先后；据《实录》，則于丁数外，又兼用稅糧数來作标准。尽管《实录》成书在前，《后湖志》和《会典》修成在后，但后两书引录的是洪武中年頒行的《諸司职掌》的条例原文，故其說較为可信。这因为在第一次編造黃冊时，对于稅糧的額数尚未能很好地进行核实工作，所以在洪武十七年，又“令各处賦役，必驗丁糧多寡、产业厚薄，以均其力”。十八年，复“令有司第民戶上中下三等为賦役冊，貯于厅事。凡遇徭役，取驗以革吏弊”。經過了几次調整以后，至洪武二十三年，戶部奏重造黃冊时，我們才看见了有如下的明文规定：

“其排年里甲，仍依原定次第应役。如有貧乏，則于百戶內选丁糧多者补充；事故絕者，以畸零內选湊。其上中下三等人戶，亦依原定編类，不許更改，因而分丁析戶，以避差徭。”（《太祖实录》卷二〇三。《明会典·戶口·黃冊》系此事于洪武二十四年，文詞大致相同。）

可见里甲輪役的先后以丁、糧多寡为次序这一編排原則，直至洪武二十四年造成的第二次黃冊中才真正明确下來的。《实录》所記洪武十四年丁、糧并用之說，似乎是貫通是年以后的历次规定言之，并非原来如此。

复按《明史》所記，与《实录》亦頗有歧异之处。《明史·食貨志·戶口》云：

“洪武十四年，詔天下編賦役黃冊。以一百十戶為一里，推丁糧多者十戶（按《實錄》作“人”）為長；余百戶，為十甲。甲凡十人。歲役：里長一人，甲首一（《實錄》作“十”）人，董一里一甲（《實錄》無“一甲”二字）之事。先後，以丁糧多寡為序。凡十年一周，日排年。……”

这里显而易见的分歧点之一，是对于里长額数的計算：《明史》是用“戶”，《實錄》則用“人”。指明这一区别是有必要的，因为明代初年，里甲的供应方式是以力役為主，——即每戶各出一人，故举戶数或人数來說，均无不可。迨及明中叶，各地废除了里甲輪年的办法，改征了銀兩以后，里長一役，遂由許多戶合起来充当（当时名曰“朋充”），既有所謂“正戶”和“貼戶”之分，也有出力或出資的区别，于是便不用“戶”或“人”來計算里長的数目，而但作若干“名”了。

其次，对于《明史》和《實錄》“甲凡十人”一語，我們也只能理解为每甲的应役人数，因为每甲决不止十人；然紧接于这一句之下的，又来了“岁役甲首”若干人的句子，未免重复。故“甲凡十人”实应改作“甲凡十戶”，关于这点，明朱健《古今治平略》卷三“国朝戶役”的书法是切当的：

“十四年，詔……以一百一十戶為里，推丁糧多者十戶為長。余百戶，為十甲，甲十戶，名全圖；其不能十戶，或四、五戶，若六、七戶，名半圖。”

二、甲首的人数問題

諸書中分歧較大而又难于解決的問題，是关于甲首人数的記載：据《明史》，是“岁役甲首一人”，据《實錄》，是“十人”，而《后湖志》及《會典》就根本沒有“甲首几人”諸字樣。

究竟誰是誰非呢？要解決這一問題，就不能不先对明代里甲制度略作一番介紹。本来，明代里甲制是具有两个方面作用的：其一是戶籍的編制，另一是賦役的編排，后者是根据前者來決定的。里甲在戶籍上的編制，是以其居处相邻近这个“地区”因素作原則，从现存嘉靖四十五年福建泉州府德化县里甲清冊原件来看，^①知道一甲就是一条村。戶籍的划分，則以其职业和身分为根据，主要分为民、軍、匠戶三大类，其中民戶占絕大多數，他們是国家賦役的最主要的負擔者，故亦名“民糧戶”。在划分了里甲戶籍以后，又按各戶的丁糧多寡这个“財產”因素分为上、中、下三等戶，以为編排徭役的根据。所有这些方面，都是在每十年一大造的黃冊中安排好的了。十年之中，非有重大的变动，是不許更改的。

明代中年以前，里甲制在徭役方面的編排，是十甲輪年的办法——即十年內，每年各由里長一戶率領一甲十戶去应里甲正役，这点在下节中将有詳細說明。現在要問的，只是这十戶是否全部皆名为甲首，抑或十戶中只有一戶是甲首？《實錄》和一般的記載，都主張前說，《明史》和弘治十年（1497年）謝鐸纂《赤城新志》則主張后說。

^① 原件的照片已在拙作《明代黃冊考》文中影印出來，載《嶺南學報》第10卷第2期。又，明章潢《圖書編》卷九十載有“本朝坊廂里甲”圖解一幅，亦收入拙文中。

把甲首和一般人戶（亦称“甲戶”）分开，是有相当理由的。这点从《大明会典》卷二十“戶部”七“戶口”二“黃册”所載洪武二十四年奏准关于“攢造黃册格式”的规定中便可以看得出来：

“有司先将一戶定式，騰刻印板，給与坊长、廂长、里长，并各甲首。令人戶自将本戶人丁事产，依式开写，付該管甲首。其甲首，将本戶并十戶造到文册，送各該坊、廂、里长。坊、廂、里长，各将甲首所造文册，攢造一处，送赴本县。……”

又，《全典》卷二九“戶部”十六“征收”所記洪武二十六年“征收稅粮”的规定中，也說明甲首和一般甲戶（又称“花戶”或“納戶”）是不同的：

“該办稅粮，粮长督并里长，里长督并甲首，甲首催督人戶……”

又如万历三十三年唐鶴征纂《武进县志》卷四“征輸”篇引万历二十一年知县桑学夔“議征收法”一文中有云：

“本县催科之法：自来，区皂催总催，总催催里长，里长催田甲，田甲催花戶，相沿日久。”^①

所謂“田甲”，就是正德以后武进县“甲长”的別名，他是催征花戶的角色，而且是以一甲中丁田較多的人戶来充当的。本来依照一般通常的慣例，甲长就是甲首；然該县其他花戶，又名曰“甲首”，这不能不說是一种非通常的用法。《武进县志》卷三“里徭”篇二有如下的記載：

“国朝役法，以編民一十一戶为一甲。每甲推择丁田多者一人為长，是为‘田甲’。甲領中产十戶，为‘甲首’；其丁产不任役者，帶管甲后，是为‘畸零’。十甲为一里，每年輸一田甲应役，謂之‘里长’，管摄十甲，催办錢粮，勾摄公务。以里而派者，謂之里甲，以田而派者謂之均徭。其初，差有銀、力，轻重煩簡不等，民甚苦之。弘〔治〕、正〔德〕以前，不可考。……”

清末薛允升撰《唐明律合編》卷十二“戶婚”上引嘉靖二十九年重修《明律》卷四“戶律”一“禁革主保里长”条云：

“凡各处人民，每一百戶内，議設里长一名，甲首一十名，輪年应役，催办錢粮，勾摄公事。若有妄称主保、小里长、保长、主首等項名色，生事扰民者，杖一百，迁徙。”

此条之后，又引万历王肯堂著《律例箋释》（按此书亦名《律例箋解》）說云：

“里长、甲首，本为办一里、一甲公事而設。妄称主保等名色，則又多增一里长、甲首矣。故拟罪与濫設官吏同。”

按《武进县志》以“一十一戶为一甲”，是其中包括了里长一戶来說的；而《唐明律合編》則說每一百戶内，輪年役里长一名，甲首一十名，便是把里长一戶除开在外了。历史文献上記載的紛紜情况，往往类此。后一书引《箋释》之說，認為增設里长、甲首，与濫設官吏同罪，这点亦可作为甲首的身分究竟与一般人戶不同之証。

但絕大多数的記載都說是每年輪役甲首十人，这也就等于說在十年内十甲百戶人家

① 万历四十六年唐鶴徵纂《常州府志》卷五“里徭”篇云：“里甲、均徭，皆以丁田派。但里甲概不优免，而均徭有优免，以里甲只据甲长，不論人戶耳。”它把政府规定里甲无优免的理由指出来：这因为里甲一役的催征，政府把全权交給甲首了，政府并不直接和花戶打交道，如果真的要优免，便非全甲优免不可，这未免損失太大，关系非同小可的。但由此可见，在政府的心目中，甲首也就不过是与花戶相同，把两者混称起来是不无道理存在的。

各当甲首一次。嘉靖三十六年董谷纂《海宁县志》卷二“徭役”更是这样直接了当地说：

“一百一十户定为一里，内十名为里长，一百名为甲首。”

如果确是这样，便要问甲首和一般甲户的区别在哪里呢？我认为甲首这一称谓，本来起源于户籍的编制，即里有长，甲有首。在明初“事简里均”的情况下，值年应役那一甲的甲首，便协助里长率领该甲其他九户来完成整个里的支应。在这一阶段，甲首和里长一样，同为封建政治的地方基层组织的最底级的半公职人员，是与一般人户区别开来的。后来，赋役繁重，里甲户籍制中的甲首便转移到以赋役的编排方面为重点，于是值年应役的一甲十户，都通称为甲首了；又因每甲十户都有值年的机会，于是虽非值年的九十户亦渐得泛称为甲首了。还有一点，每年应值的十户所征收的并不只是本甲的钱粮，其他九甲的钱粮也由他们来征收。从他甲的眼光看来，这十个值年的甲户自亦可以认作是甲首。

所以《明史·食货志》所说每年只役甲首一名，当就明初户籍编制中的里甲体系而言。随着时间的推移，多数的地方都把值年的十户唤作甲首，《明实录》说的“岁役甲首十人”也就是从俗的称谓。

三、所谓“十年轮役”，是怎样轮的？

上节诸书所记，一致证明了明代里甲徭役之制，是于一里一百一十户之中，推丁粮多者十户为里长；其余百户，分为十甲。十年内，每年各有里长一户率领一甲十户轮流应役。这正如嘉靖十年蒋孔燭纂《德化县志》卷四“役法”所述里甲正役云：

“国朝役制：一里十甲，挨次轮差。……”

又，崇祯初年何乔远纂《閩书》卷三九“版籍志”记明初里甲役法云：

“里甲之役：图（按即一里）为十甲，以一户丁力相应者为〔里〕长，统甲首十户，……岁轮一甲见（同“现”）役，此正役也。……”

十甲轮役的次序，是以各甲来配合于支年份，即所谓“十甲排年”的办法：如河南归德府宁陵县人吕坤这户名下系三甲见年，规定了每逢庚年应役。吕坤万历三十七年《答通学诸友论优免》一书云：

“优免差役之法，免杂泛，不免正办。十排轮转，空年谓之催科里甲，见年谓之正办里甲。养十年之财，供一岁之用。……曾见累朝有优免正办里甲之旨乎？坤三甲见年也，逢庚应役：嘉靖庚戌（二十九年），坤尚庶民，每地一顷，贴戴帽人（按即代应役人）三十两；又十年，庚申（嘉靖三十九年），坤已在学，可优免矣，每顷犹贴三十两，每亩每年合银三分；至隆庆庚午（四年），坤为举人，可优免矣，经熊公十段锦后，每顷止贴应役人十两，每亩每年只合银一分。……”

函中又云：

“迨十甲将尽之年，正一甲复始之际”（吕坤《去伪斋集》卷五“书启”）

这又可作为《德化县志》关于里甲正役挨次轮差：“一里之地，为十甲者，共一百一十家，循环应役”一说的具体说明。十甲各按照于支年份来应役，在《天下郡国利病书》

原編第六册“苏松”所記万历年間松江府的里甲排年情况亦可参考，此不具引。

或者有人会说，上面所举吕坤一函諸例，皆为嘉靖、万历年間的办法，未必明代初年就是如此，这一疑問也有道理。因此，我們不能不探求十甲排年的方式問題。

如前所說，在黄册上所登記的里甲編排本为戶籍方面的事，当然各戶的丁粮等項在州县的黄册上也是有登記的；关于十甲輪役的规定，乃属于賦役范围，它可以依照黄册上的排定次序，也可以自己另訂一套次序。实际上，問題的中心在于这每年应役的十甲首是怎样組合起来的？

这里不妨先把銜微《明代的里甲制度》一文的論点介紹一下，它說：

“所謂的‘十年輪役’，絕不是每里十甲依次輪流应役。它的内容止是全里百十戶人家在十年内不論丁粮多的民戶（即充里長戶），还是一般民戶（畸零除外），不是当一次里長，就是当一次甲首。”

文中並沒有把排甲和排年的关系交代得清楚，但如果推敲下去，不过只能有两种方式：

其一，仍依黄册戶籍上的十甲編制，每年于十甲中各取一戶为甲首。但应指出，由于每年进行編审里甲一次的情况在明史上是根本不存在的，所以每年一編的方式并不須考虑。此外，另一种方式就是于大造黄册之年便将这一工作搞好了。这就等于說，在黄册里甲的編制上，再来一套十甲的編排，可是这一方式在文献上也是毫无根据的，所以也不可能。从十甲中各选取一戶为甲首，或集中在几个甲内共取十戶甲首，这一工作看来似易，实则并不简单，因为必須經過一番适当的配搭，然后十戶甲首不至于全属同一等则的戶，比方說，今年所取的尽属上等富戶，明年却尽为貧难下戶，这就不只会引起各甲間不公平的反感，而且也会造成对政府供应方面的困难。而在明代初年的社会經濟条件下，并結合到当时里甲职务的性質和范围来看，都是沒有設立两套不同里甲制度的必要，这点在下节中馬上就要談到。

最后剩下来唯一可能的方式，就是里和甲各按不同的原則来划分：里的划分系根据一百一十戶聚居的地区，十甲的划分則純粹依据各甲十戶的丁粮多寡，因此，在一里范围之内，每甲的戶并不一定是由居处相邻近的十戶来构成的，这里的十戶可以分隶于不同的几甲。这种編排显然和史料上的記載不合，例如据前引現存的嘉靖德化县的里甲清册原件，每甲十戶就是一条村。

所以我认为甲这个組織只是一个地区上最小的单位，每年里甲一役就是指定甲这个单位来提供的；而各甲十戶人家又各分为上中下三等，乃是为了支应里甲正役以外的杂役而設立的賦役上的編制。

更具体地說来，所謂“一里十甲，挨次輪差，循环应役”，就是于大造黄册之年，在划分了十戶里長和十甲百戶以后，便将各甲的应役次序編排下来。每年由里長一戶率領一甲十戶来支应本里本年的“催征錢粮”和“勾摄公事”两大类的任务。这样，在每十年内，从第一甲以至第十甲皆須依照排定的次序輪流应役一年。换言之，每甲在十年以内只須服役一年，其余九年分別由其他九甲各輪流充当一年。本甲除了应役这一年

外，九年內都可以得到休息。应役之年，名曰现年（亦称“见役”）里甲；不应役之年，名曰排年里甲。每届十年期滿，便重造黄册，根据这十年来各甲人戶丁粮增减的实际情况，进行調整，重新排定下一届十年中各甲的輪役次序。一般的情况总是重編后的各甲应役次序仍与上届次序相同；但如各甲的戶口丁粮，或各戶的人丁财产发生了巨大变化时，則亦得加以相应的更动——例如将原属于某甲的某几戶改隶于他甲，又如第一甲在上届时原排定在第一年应役，本届則改排在第六年应役等等。終明之世，戶口的逃亡是严重的，尤其是自成化（1465—1487年）、弘治（1488—1505年）以后，各地往往有全里全甲逃得干干净净的情况发生，所以裁并里甲的事件，是常见于史乘記載的。明代列朝里甲編役方法的种种改变，只不过是当时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

为什么上述十甲輪役的办法在明代初年行得通？为什么后来又有所改变？这些就是下一节所要解答的問題。

（下期續完）

广东教育界座談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問題

为了加强对学生德育問題的研究，广东教育学会在前些时候邀請了高等院校、中学以及教育行政部門的一些有关的同志，举行“青少年儿童思想政治教育問題”的座談会，就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一些問題进行了初步的漫談、議論。会上，同志們一致感到，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十分重要，它是关系到党的教育方針能否正确貫徹和能否培养出我們国家所需要的坚强的革命后代的重大問題。在这方面，过去虽然积累了不少宝贵經驗，但却还未有很好地进行研究和总结；教育学上对德育問題的研究还是十分薄弱，迫切需要加强这方面的总结研究工作。

会上，对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問題，提出了一系列值得研究的問題，如阶级教育包括些什么内容？它在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地位作用如何？与其他方面教育内容的关系怎样？各科教学、政治課等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各有什么作用？实际锻炼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又如何？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否要以实际锻炼为主？怎样才能根据学生年龄特点，使思想政治教育做得更有效果？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如何做好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的配合？德育过程与教学过程的关系、区别怎样？德育过程中的理論与实践的关系怎样？

广东教育学会將繼續組織教育学界就有关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問題作进一步的探討。 （广教）

氏族的起源及其早期发展

梁 劍 韜

氏族起源問題現在還沒有圓滿的解釋，①本文的論述亦只能是一種嘗試，拋磚引玉，希望得到讀者們、專家們的批評和指教。

本文分三部分論述：一、恩格斯對於這個問題早有精確的論述，迄今仍為探討這個問題的指南，故將其重要論點略予介紹；二、作者認為與舊石器時代狩獵經濟相適應的按年齡差別的勞動分工是血緣家族和氏族相繼產生的原因。本文以此為中心論點，故先就考古學和民族學材料予以論述，對於各家的不同意見則略予評論；三、氏族的起源及其早期發展諸問題，學者間曾提出一些問題進行討論，惟迄今未見有系統的解釋，本文以此為主要內容，將各階段的轉化過程加以論述，對各家的不同意見亦略予評論。

恩格斯關於早期氏族制度的學說

氏族是原始社會勞動生產的基本細胞，家族是兩性共同生活的組織形式；兩者不同，但同是由物質生活條件的變化和發展所決定的。在原始社會的發展過程中，兩者之間存在着辯證發展的關係；因此，在論述原始氏族的历史時，必然牽涉到家族的历史。

恩格斯說：“一切兄弟與姊妹間，甚至母方最遠的旁系親族間的性交關係底禁止一經確定，上述集團便轉化為氏族了。”②這就是說，氏族與族外群婚家族是同時產生的。

在近代民族志中，“普那路亞”群婚家族是相當發達的群婚制度，所以恩格斯說：“氏族制度，在絕大多數場合之下，似乎是从‘普那路亞’家庭中直接發生的。”但是，它不是最原始的群婚家族形式，所以恩格斯接着指出：“是的，澳大利亞人的等級制度（Class system）也可以成為氏族底出發點：澳大利亞人有氏族，但他們還沒有‘普那路亞’家庭，而是更粗野的群婚形式。”③又說：“整個等級底通婚，如在澳大利亞所盛行的，不論如何，乃是群婚底極低下極原始的形式；而‘普那路亞’家庭，就我們所知道的，則是群婚底最高發展階段。”④

恩格斯進一步指出，群婚之前為血緣家族，“這是家庭底第一個階段。在這里，婚姻集團是按輩數而區分的”。⑤這就是說，與氏族一起產生的族外群婚制的前一階段，是在原始群內劃分“年齡等級”，男女在同一“年齡等級”內互為夫妻。

原始氏族公社的產生及其發展各階段，相當於考古學什麼階段呢？恩格斯說：“氏

① A. H. 格拉德舍夫斯若：《原始社會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下同），第57頁。

②③④⑤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下同），第41、40、44、36頁。

族在蒙昧中級阶段发生后，在其高級阶段繼續发展起来，就我們的資料所許可的範圍內去判断，到了野蛮低級阶段，它便达到了全盛时代。”^①按照恩格斯的原始社会分期标志的内容，和现代考古学分期内容对比，那就是：氏族在旧石器时代发生，^②在中石器时代发展起来，在新石器时代的早、中期达到了全盛时代。

但是，血緣家族出现在什么时候呢？按照原始社会史学者的普遍說法，氏族出现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因此，比氏族早一阶段的血緣家族，必然出现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以前。但在近代社会中已經沒有这样古老的现成社会形态存在了，凭什么論据来探討血緣家族制度呢？无疑，應該从考古学的遺存和民族志的历史文化残余来探討它。在恩格斯时代，由于考古学还是幼年时代，为科学材料所限制，所以恩格斯只能从夏威夷人的亲族制度中来确定它的存在，^③以及从澳大利亚人等級群婚制来論述它的形态。但正如恩格斯說：“……只是一个刚刚开辟而尙未着手的研究領域”^④。关于血緣家族的起源及原始群如何过渡到氏族的一系列問題，还需日后的科学发现才能进一步解决；但是，恩格斯已經指出了解决这些問題的鎖钥，那就是：“婚姻集团是按輩数而区分的”这一重要論点。因为这个論点，启发了现代考古学家們特別注意到有关这个問題的証迹。

苏联一些考古学和原始社会史家提出旧石器时代在以猎取巨大群居动物为主要食物来源的經濟基础之上，已开始出现了按年龄差别的劳动分工；无疑，这是苏联学者的貢獻。但是，近年来苏联学者之間，对于原始劳动分工的問題，出现了各种不同的解释。

原始年龄分工及其历史残余

西方资产阶级考古学者，对旧石器时代人类的社会經濟发展并不予以重視，而大多偏重于从石器形态来論述工具的进步；二十世紀初期以后，尤其着重于各地区石器形态的异同（当然也是重要的），論述其所謂“文化特質”、“文化丛”、“文化区域”和“文化圈”等問題，因而把作为历史科学的考古学的中心問題——社会經濟形态輕輕抹过。直至晚近出版的著作中，仍认为：工具形态的进步，充分証明人类理知的进步，物质文化由理知而产生。^⑤所以，西方资产阶级的旧石器时代考古材料，在說明人类早期社会經濟发展这一問題上是极其貧乏的；只能在他們的著作中偶然得到一些可資参考的材料，例如：在阿修尔期遺址普遍发现的、人类居住面积的扩大和制作工具的场地（“Floors and Workshop”）的大面积散布，^⑥原已客观上反映了旧石器时代初期的

①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152頁。

② 蒙昧中級阶段相当于整个旧石器时代，其中又可分为两期：前一个时期以“使用火”为标志；后一个时期以“钻木取火”为标志；前者包括旧石器时代初期和中期，后者为旧石器时代晚期。詳見拙作：《关于原始社会史的几个問題》，載《中山大学学报》，1962年第3期，第49頁。

③④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37、44頁。

⑤ Frank C. Hibben: *Prehistoric Man in Europe*, 1959, London, PP. 40—41.

⑥ George Grant MacCurdy: *Human Origin*, 1933, London, Vol. I, PP. 118—122.

后一阶段，人类社会經濟有过很大的变化。十月革命后的苏联考古学家，在考古发掘工作中，积极注意文化遗址所反映人类社会經濟的一切现象，无疑是比西方资产阶级考古学的方法进步；他们根据旧石器时代遗址所呈现的：人类使用火的进步、不同程度的固定居址、文化层的增厚、与石器共出的巨大群居动物的增加等等现象，综合地说明阿修尔期、莫斯特期和奥里纳、苏鲁特期文化是以猎取巨大群居动物为其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① 这些发现，为探讨氏族起源问题提供了极其重要的论据；考古学和原始社会史学家认为：“氏族制度的萌芽”在于莫斯特期，^② “只有在狩猎成为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的时候，才逐渐形成进行有组织的生产的巩固团结的集体”，^③ 这个时候，人类社会出现了“根据年龄的差异，劳动分工的萌芽”^④ 和“自然劳动分工的发展”^⑤，“实行乱婚的猿人群，转变为血缘家族的尼安得特人了”^⑥。

按年龄差别的劳动分工，还在近代民族志中得到说明。澳大利亚人部落，按年龄差异把成员分为三种集团，即：儿童、成年人和老人集团。成年人集团担任打猎的重要社会职能，儿童集团进入成年人集团要经过折磨身体的“入社仪式”，从成年人集团进入老人集团还要受到更大的折磨。澳大利亚人部落还同时存在最原始的氏族组织残余，那就是恩格斯所论述过的两等级群婚制和四等级群婚制的残余。^⑦ 由此看来，年龄分工的残余与最原始的氏族组织残余同时存在，这是值得注意的。

澳大利亚人部落是近代民族志上最古老的社会形态；至于与考古学时期对比，它属于哪一个阶段，则有各种不同看法：有些人认为某些文化特征可与阿修尔期或莫斯特期相比，有些人认为与马革特期或马革特期稍后的新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相当。^⑧ 这些不同看法，是由于澳大利亚人社会包含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残余而产生；因为近代调查者，在不同的时间，先后到澳洲调查，而又各自根据不同发展程度的历史文化残余现象来观察，所以得出不同的结论。

根据早期调查者的报道：十八世纪末，澳大利亚人还使用与阿修尔期和莫斯特期相类似的工具，并无永久住所，不穿衣服，不知贮藏食物，不能计算三个以上的数目，没有农业和家畜饲养，还是打猎和采集的游群。^⑨ 从这样的文化水平看来，澳大利亚人的早期社会还是属于旧石器时代阶段；因而，在澳大利亚人社会中所保留的年龄分工以及1880年英人罗里麦·费逊（Lorimer Fison）在南澳大利亚甘比亚山区所发现的二等群婚制，^⑩ 应该都是旧石器时代遗留下来的社会制度。

①② 苏联科学院：《世界通史》第1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下同），第42页。

③ A.H. 格拉德舍夫斯基：《原始社会史》，第40页。

④⑥ B.K. 尼科尔斯基：《原始社会史》，作家书屋1952年中译本（下同），第37页。

⑤ И.И. 叶菲明科：《“原始社会”绪言》，载《民族问题译丛》，1955年第1期，第81页。

⑦⑩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43、42页。

⑧ A.L. Kroeber: *Anthropology*, 1948, New York, §310, pp. 761—764.

⑨ B. Spencer and F.J. Gillen: *Native Tribes of Central Australia, Northern Tribes of Central Australia*, 1904, London and New York.

根据澳洲沒有一般的高等哺乳动物，它不可能是人类发生的地方，可能在第四紀冰期結束之前，亚洲和澳洲之間的“陆桥”还未被海水淹沒的时候，澳大利亚人的祖先从印度尼西亚迁移到澳洲。^①照此看来，澳大利亚人带着旧石器时代晚期以前的文化进到澳洲是可能的。此后，在适应新的自然条件之下，使他們的社会經濟有所改变，例如：澳洲沒有巨大群居的动物，只有小的动物，尤其以有袋动物为多，他們便以猎取这些有袋动物为主，并采集野生植物为食料；在这种經濟条件下，按年龄的劳动分工已經沒有多大意义。由于新的經濟条件出现，开始出现了性别分工，而过去的年龄分工則成为一种不起积极作用的旧制度而存在。澳大利亚人的物质文化虽然出现了中石器时代的特征，但未发明弓箭，更沒有陶器；他們虽然有部落組織，但沒有部落領袖和部落會議，还是极为原始的部落組織。在我看来，这應該是澳大利亚人进入澳洲以后、殖民主义者入侵以前的社会发展阶段。

从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后，欧洲殖民迅速增加起来，破坏澳大利亚人的社会經濟和传统制度，澳大利亚人为着保卫自己的生存，在与殖民主义者进行斗争中，使男子的作用跃居首要地位；^②因而出现了发展极不平衡的父权社会和与母权氏族制相矛盾的社会制度。

澳大利亚民族志材料是极为重要的，但由于早期調查者纪录残缺，而且材料本身又具有各个不同时期的历史因素，需作具体的历史分析。现从历史文化残余的順序来观察：年龄分工和等級群婚制是属于最古老的制度，是澳大利亚人过去在亚洲所經歷的、以猎取巨大群居动物为主的狩猎經濟时代的制度。

原始年龄分工，是探討婚姻集团按輩数而区分的血緣家族所由发生的出发点，也就是氏族起源的出发点。根据上述考古学和民族学的論据，无疑，人类最早的劳动分工是按年龄差异而划分的；由于它的出现，使人类社会从原始群发展为氏族社会。

近代西方資產階級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者，关于原始分工起源問題，几乎都強調“劳动的性别分工在社会生活中是普遍的事实”；^③但是，他們所举出的“大量事实”之中，例如：东非阿卡姆巴（Akamba）部落和北罗德西亚的拉姆巴（Lamba）部落所流行的性别劳动分工，都是与发达的农业經濟相适应的制度，实不足以作为最早起源的証据。材料所反映的事实，恰与性别分工起源說相反，即与年龄分工有直接历史联系的“年龄級”或“年龄組”（Age classes or age sets）和“入社式”（Initiation）却普遍留存于非洲、美洲和大洋洲。^④美国鮑亚士（F. Boas）学派文化人类学者，曾对“年龄級”或“年龄組”制度作唯心的解释，进行过綜合性的研究，^⑤但是，他們客观上的效

①② 参考C.A.托卡列夫：《澳大利亚和大洋洲民族志》，见C.И.托尔斯托夫等主編：《普通民族学概論》第1册，科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49、57頁。

③ Melville J. Herskovits: *The Economic Life of Primitive People*, 1940, New York, PP. 111—112.

④ E. Adamson Hoebel: *Man in the Primitive World*, 1958, New York, London and Toronto, PP. 410—413.

⑤ R. H. Lowie: *Plains Indian Age Societies*, 1916,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Anthropology Paper, Vol. II, PP. 877—984.

果，不在于那些唯心論的說明，而在于說明了这种与年龄分工有历史联系的制度的重要性和普遍性。

某些苏联考古学者在氏族起源問題上提供了寶貴的論据，但对于性别分工起源說的实际意义，認識上还有分歧，例如：1955年出版的《世界通史》第一、二章的作者A. H. 奥克拉德尼科夫，既綜合敘述了阿修尔期和莫斯特期猎取巨大群居动物的証迹，并認為这是氏族制度的萌芽因素，但認為莫斯特期“洞里有从事家务的妇女”，^① 那就是說，性别分工在氏族萌芽时期已經存在，把大量考古証迹作了性别分工的解释。但1953年苏联出版的M. O. 柯斯文：《原始文化史綱》，对于这一問題的看法并不完全相同，柯斯文說：“与狩猎发展相关的男女間的分工，是一个值得特別注意的問題。毫無疑义，两性間的分工，决不是自始发生的，也决不象有些資產階級学者所企图描繪的那樣为生物的本性所决定的”，“在很早的时候，男女間任何分工，尤其是生产活动部門中的分工，是不存在的。”他还列举近代民族志的許多实例，指出：“在若干发展較高的部落中間，妇女繼續和男子同样积极地参加狩猎”，“兄弟和姊妹共同行猎，并且有时出发去作長時間的游猎。”^② 又在1952年发表的一篇論文里說：“在一切历史时代都存在过的按年龄分工，乃是純然体質上的根据，無論如何这在游群时代是沒有社会意义的。因此，把流行的‘性别、年龄分工’的說法列入这一时代是完全沒有根据的”。^③ 柯斯文駁斥資產階級两性分工起源說，無疑是对的；但他同样反对年龄分工存在于血緣家族时期，理由很簡單，因为他根本怀疑原始群和反对血緣家族的存在。他在同一篇文章中又說：“民族学现在和过去都未認識游群的人們。因此，有关这一时代社会情况的推測，只能当作是假設”。“血緣家族的假設已为苏联科学界所駁斥。”但是，他又認為：“婚姻的最早限制是排除上輩和晚輩間的婚姻关系”的“假設”是合理的。^④ 由此看来，柯斯文的理論也不无矛盾。所謂“血緣家族的假設已为苏联科学界所駁斥”也非完全事实，如：H. H. 叶菲明科^⑤ 和奥克拉德尼科夫^⑥ 都認為莫斯特期是从原始群轉入母系原始公社的合乎规律的过渡时期；A. H. 格拉德舍夫斯基^⑦ 和B. K. 尼科尔斯基^⑧ 都指出莫斯特期存在着血緣家族。1951年苏联出版的尼科尔斯基所著《原始社会史》，原来便与柯斯文的說法不相同，他指出：年龄差异的劳动分工，出现于旧石器时代中期，^⑨ 性别分工出现于旧石器时代末期漁猎經濟出现的时代，^⑩ 到了新石器时代才以性别分工为主，但年龄分工还作为“不甚显著”而存在。^⑪

① 苏联科学院：《世界通史》第1卷，第42頁。

② M. O. 柯斯文：《原始文化史綱》，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中譯本，第72—73頁。

③④ M. O. 柯斯文：《关于原始历史的分期問題》，載《民族問題譯丛》，1955年第1期，第88、87頁。

⑤ H. H. 叶菲明科：《“原始社会”緒言》，載《民族問題譯丛》，1955年第1期，第81頁。

⑥ 苏联科学院：《世界通史》第1卷，第47頁。

⑦ A. H. 格拉德舍夫斯基：《原始社会史》，第40頁。

⑧⑨⑩⑪ B. K. 尼科尔斯基：《原始社会史》，第73、73、69、70—71頁。

从上述可知，关于原始劳动分工问题，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需要从氏族的起源和发展的历史中进一步去探讨它。

原始群怎样转化为氏族及早期氏族的发展

(一) 血缘家族的产生：在阿修尔期，由于以猎取巨大群居动物为主要生活资料来源，因而引起了原始群按年龄差异的劳动分工，这是我的看法。现就这一论点，进一步探讨原始群怎样转化为血缘家族；同时，借以后各阶段的论述，以检验这一论点是否可以成立。

根据澳大利亚人年龄分工的残余制度，原始群曾分为：成年人、老人和儿童三个集团；成年人集团在原始群所在的“营地”附近进行打猎，共同过着短期的游猎生活；因而，他们既是劳动生产的集体，又是性生活的群体。由于年龄差异的自然分工和共同生活，使不同辈数间的性生活发生距离，由不自觉而逐渐形成生活上的习惯，因而人类社会从原始乱婚开始进入同辈通婚的血缘家族。在这一阶段里，老人和小孩必然经常在一起，老年人带养小孩，采集可食的野生植物、昆虫和水栖的小动物作为补充性的食物；他们留守在较为固定的“营地”里保持那不能让它熄灭的火种；儿童也跟着老人从事采集工作，他们长大了则加入成年人集团；成年人老了则担任老人的工作。成人集团供给整个群的肉食。病人和产妇可能短期内与老人和儿童在一起，但基本的劳动分工和性生活是按辈数而区分的。在同辈通婚的情况下，倘若是一个中年的父母，仍有可能与刚进入成年人集团的儿女通婚，因而，亲与子之间的性交关系，在这阶段里仍未完全被排除，但祖孙之间的性交关系则已受到限制了；当然，兄弟与姊妹间是经常通婚的。

为了帮助说明问题，附图于后以供参考。附图第Ⅰ阶段为原始群，以纵横相交的线代表群内乱婚。第Ⅱ阶段即为这里所论述的血缘家族阶段（仍属原始群）；以C代表成年人集团，以L代表老人集团，以E代表孩童集团；以→表示从一个年龄等级进入另一个年龄等级的关系；C和L内的纵横相交的线代表它们内部的性交关系。

(二) 原始群的解体：到了莫斯特期，猎取巨大群居动物为主的经济生活有了显著的发展，生产力提高，原始群进一步变化：由于原始群人口增殖，成年人的打猎集团的人数也增加起来，但由于当时的生产发展水平仍然很低，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经济集体，作为一个生产细胞的成年人集团，不可能人数过多；因此，成年人集团开始分裂为两个（附图第Ⅱ阶段）；由此而引起了原始群内部产生复杂变化，如附图所示：新分裂出去的成年人集团所生的孩子依旧由老人集团带养，长大后依旧补充到成年人集团去；但这时和前一阶段不同，因为，成年人集团已经有两个，孩子们长大后必然补充到自己母亲所在的成年人集团去，因而人类按自己母亲所在的集团而认识自己的社会地位的“母系因素”便开始萌芽。在老人集团方面，也因来自不同的成年人集团而分裂为二，各自承担自己所由出的成年人集团所生的小孩的带养责任。于是，整个原始群内部，无

論成年人、老人、兒童集團，都已分裂為二，即附圖的 C 1、C 2，L 1、L 2，E 1、E 2。

在這一階段里，性關係也產生複雜的變化：按照必須同輩集團內部通婚的慣例，如附圖所示：C 1 或 C 2 仍然是各自內部通婚；但是，C 1 和 C 2 之間，過去原是同一集團，現在仍然是同一年齡等級，可以通婚；因而出現了同年齡級而不同生產集團之間，即 C 1 和 C 2 之間通婚的可能。附圖以 \longleftrightarrow 表示兩個通婚集團的關係。從成年人集團退出來的老人集團，即 L 1 和 L 2 也產生同樣道理的婚姻關係。這種集團以外通婚的可能性，為以後族外婚的產生創立了社會條件。

這時，在同一生產集團內通婚的情況下，年青的父母仍有和自己的子女通婚的可能，因而親子間的婚姻關係仍未被排除；但在生產集團外通婚的情況下，由於對方沒有自己的子女，親子間的婚姻關係已開始有可能被排除。

在前一階段（Ⅱ）出現的血緣家族，是一種剛剛興起的制度，可能仍未被鞏固下來，可是到了這一階段（Ⅲ），即莫斯特期時代，考古學上已出現了若干意識形態的証迹（如有意識的埋葬死人），說明當時人類已可能意識到排除亂婚對加強原始群的團結，鞏固勞動組織是有利的，也可能認識到對“種的蕃衍”是有利的；這就是恩格斯指出的：“自然選擇的原則”已開始發生作用。^①

由於這時存在着同輩集團內，或同輩而不同生產集團通婚的可能，必然導致婚姻關係上的混亂，生產集團以外通婚的新因素與生產集團內婚的舊傳統發生矛盾；結果，生產集團內婚的舊傳統必然逐漸被淘汰，而方興的生產集團以外通婚的新因素必然得到進一步發展。

在這一階段里，經濟、社會和意識形態上，都已具備了進一步排除內婚的條件。這一階段的變化過程，就是原始群的解体過程。

（三）氏族的產生——兩等級群婚制的形成：舊石器時代晚期奧里納、蘇魯特期文化，標志着這一時期生產力發展的巨大飛躍：這期遺址大多發現在靠近高山懸崖和山谷峽口、便于將野獸驅逐進行圍獵的地方；遺址的分布範圍往往達三萬以至五十萬平方米之廣，在遺址內往往發現大量巨大的哺乳動物骸骨，如猛犸、野牛和鹿等等；這些証迹，充分說明當時人類的狩獵經濟已達到高峰。在這樣的經濟基礎之上，按年齡差別的勞動分工，以及由此而產生的血緣家族也得以進一步鞏固。正如上述，在經濟的、社會的和意識形態的成熟條件下，要求生產集團進一步鞏固，把各年齡級內已經成熟了的復數組織分裂為兩個“半邊”，那就是最原始的兩分族外群婚制的确立。到了這一步，便與原始群有了本質的不同，即前者仍存在着內婚制，后者則完全實行外婚制。

從此，一個“半邊”所生下來的小孩，屬於他們母親所在的一個“半邊”；另一個“半邊”所生的小孩則屬於他們母親所在的一個“半邊”；因而，在前一階段（Ⅲ）業

^①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第31頁。

已萌芽的“母系因素”，得到进一步发展，那就是原始母系制的确立。

在族外群婚制和母系制的前提下，必然兄弟与姊妹間不能通婚，因此，原始群便轉化为氏族。兄弟与姊妹間的婚姻关系被限制，标志着族外婚制完成和氏族制度确立。

这种两分氏族組織，是最原始的氏族組織形态，就是恩格斯所論述过的澳大利亚人所保留的两等級群婚制的原来制度。

在这一阶段里（Ⅳ），以一个中年男人來說，他的妻和儿女，都在对方氏族，因而，这位还年青的父亲仍有和自己的女儿通婚的可能；父女間的婚姻关系的可能性还是存在，但母子間的婚姻关系則已被淘汰了。

关于从原始群发展为氏族的过程，苏联学者間有不同意见，例如：叶菲明科認為血緣家族是个过渡时期，是原始群終結时期；柯斯文認為血緣家族是个假設，紧接着原始群之后就是氏族制度。^①又关于最早出现的两个氏族（“半边”）的产生的形式問題，苏联学者間亦有不同意见：一說認為是由原始群分裂出来的；另一說認為，由两个原始群联合而成的。^②不过，無論哪一种說法都沒有說出：怎样“过渡”或怎样“直接”产生着氏族的理由；也沒有說出原始群怎样“分裂”或怎样“联合”的过程。

（四）早期氏族的发展——四等級群婚制的形成：两等級群婚制从开始就在每一等級內（“半边”或氏族）产生复杂的变化，并迅速发展为四个氏族（亦即四个等級）。

由于以猎取巨大群居动物为主的經濟繼續发展，按年龄差别的劳动分工还是必要地存在；又由于人口增殖和受生产力水平所限制，两等級群婚制氏族組織必然要分裂出新的成年人打猎集团，如附图所示：Ⅴ丙从Ⅳ甲分出来，Ⅴ丁从Ⅳ乙分出来。这一次成年人集团的分裂，和以前在原始群內的分裂不同，因为这时族外婚制已經确立了，它們已不能与母体集团（甲或乙）通婚（因为它們原属于一个氏族），也不能与对方的母体氏族（在丙來說是乙，在丁來說是甲）通婚（因为它們不同年龄等級），因此，只能由两方新分出来的成年人集团之間互相通婚。簡言之，这时的婚姻关系是：甲和乙通婚，丙和丁通婚。这两个新分裂出来的成年人集团，并非立即可以成为一个完整的氏族組織，大約还須要經過三代的变化才能完成。当中的变化过程是相当复杂的：

丙、丁两个成年人集团，从甲、乙分出的时候便开始按照传统的“祖孙同居”慣例，把所生的儿女（附图丙C→㉔和丁C→㉔）分別送到甲或乙氏族（孩子的祖輩）去，这些孩子长大了，仍分別补充甲或乙氏族的成年人集团（因为这时丙或丁尚未有他們的祖輩），到了她們（长大了的女孩子）所生的孩子，即第三代的孩子（甲C→㉔和乙C→㉔），才送到丙或丁去（因为这时丙或丁已有了他們的祖輩），这样，一个新氏族便完成了。

① 参考II. II. 叶菲明科：《“原始社会”緒言》；M. O. 柯斯文：《关于原始历史的分期問題》和《論氏族和部落历史上的关系》。分別見《民族問題譯丛》1955年第1期，第81、88、96頁。

② M. O. 柯斯文：《論氏族和部落在历史上的关系》，載《民族問題譯丛》1955年第1期，第96頁。

照此看来，甲与丙，乙与丁之間都互相交换儿女，四个氏族都不与自己的儿女同居；按照外婚关系，对方氏族也都沒有自己的儿女。因此，在四等級群婚制度下，亲与子之間的婚姻关系才彻底被制度所排除。在“祖孙同居”制度下，联系着原属同一氏族的两个氏族（甲、丙或乙、丁），这就是胞族的原始形式。胞族的联系和族外婚的联系，将这四个氏族联结起来，这就是部落的原始形式。

这种人数众多，由四个固定氏族結合起来的部落組織，是与旧石器时代晚期生产力高涨和大规模的狩猎經濟相适应的。这就是恩格斯所論述过的澳大利亚人四等級群婚制^①的由来和本来的組織形态。

关于部落形成于什么时候的問題，苏联学者亦有不同意见：有人認为部落是和氏族同时产生的，^②有人認为部落形成于中石器时代。^③照我看来，作为联系氏族的組織形式，部落可能在两等級群婚制时萌芽，但部落的形成必然与四等級群婚制的形成同时。

（五）氏族的繼續发展——“普那路亚”群婚制的形成：到了馬革特期晚期，很少发现巨大群居动物的骸骨，表明大规模狩猎經濟已經衰落；但是，人类在另一方面不断提高生产力的水平，例如大量骨角制的漁猎工具的发现，表明以漁猎生产为主的經濟，代替了以猎取巨大群居动物为主的經濟。到了中石器时代，漁猎經濟更进一步发展起来；人們沿着湖边、河流和海岸漁猎，生活比前一阶段流动。

在馬革特晚期和中石器时代，人类社会也跟着經濟生活的改变而产生变化：在这一阶段，由于漁猎生产劳动比之猎取巨大群居动物的生产劳动較为輕微，而所需的人数也較少，因而成年人的劳动集团已經不是那么重要了；由于生产力进一步提高，生产部門增多了，氏族的全体成員都可能在同一氏族內共同做着各种劳动生产，因而取消了年龄差别的劳动分工，“祖孙同居”的慣例也随着废弛了，于是四等級制解体，氏族所生的孩子都留在自己的氏族內；各氏族也因生产活动的地区范围縮小，因而两个胞族分裂开来（附图第Ⅵ阶段）。所以，在考古学上这一时期的遺址面积，通常都比前一时期小，且呈现分散状态。

四等級制解体后，再向前发展就是“普那路亚”家族，它的轉化过程也是相当复杂的：取消了“祖孙同居”之后，氏族內的亲族关系复杂起来；同时，由于經濟生活变化，氏族中的成員分化为各个生产小集体，代替过去由全部成年男女所組成的經濟集团，因而在婚姻集团方面也分化为各个“伙伴”，这就是“普那路亚”家族的原始形式。在前一阶段里，两个氏族間的通婚，是整个年龄等級之間的群婚，双方的男女都互为夫妻；现在，年龄等級取消了，成年人生产集团不存在了，于是氏族中出现了由若干数目的姊妹結成“伙伴”——“普那路亚”（附图Ⅵ^④）与对方同类組織的兄弟“伙伴”群婚；

①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43頁。

② M.O. 柯斯文：《論氏族和部落在历史上的关系》；又И.И. 叶菲明科：《許福尔摩佐夫《論部落組織形成的時間和历史条件》一文》，載《民族問題譯丛》1957年第8期，第9頁。

③ A.A. 福尔摩佐夫：《論部落組織形成的時間和历史条件》，載《民族問題譯丛》1957年第8期，第7頁。

因而把等級群婚制轉化为局部組合的群婚制，這就是“普那路亞”家族的由來。“普那路亞”家族已開始把群婚範圍縮小，這一傾向，在下一階段的經濟基礎之上，進一步發展為對偶婚家族。

(六) 氏族發展的全盛時期——對偶家族的形成：新石器時代的早期和中期，漁獵經濟進一步發展，農業和飼養家畜也都出現和繼續發展；人類相對地定居下來，氏族散處在適合於打獵、捕魚、飼養家畜和農業的地方從事多種多樣的生產活動。勞動分工亦有所變化，男子打獵、捕魚、農業開荒和製造石器工具等；女子是農業生產、製造陶器、紡織、採集經常性食物的主要生產者，有時甚而與男子一起從事漁獵工作。兩性分工可能在中石器時代開始，到現在進一步明顯。

氏族組織亦起了很大變化：“普那路亞”在它原來氏族中“是從二個或二個以上的兄弟”，“以及二個或二個以上的姊妹”^①組成的“小集體”；當然，在同一氏族內還有其他相同的“小集體”。在新石器時代由於生產力進一步提高，氏族人口增殖，這些以女人為中心的“一群人”也增殖起來（包括她們的子孫），於是從原來的氏族分裂出來，成立新的氏族；這個新的氏族開始時仍然是“普那路亞”的組織形式。這就是恩格斯所說“我們便看到恰好是這麼一群人，他們後來以一個氏族的若干成員的資格出現，這個氏族的組織形式是原有（Original）的形式”^②這一段話所指的轉化過程。但是，格拉德舍夫斯基認為：“普那路亞”時期的氏族不能算作是氏族，“氏族的出現是和對偶婚的出現相適應的。”^③這可能是格拉德舍夫斯基把“原有的形式”誤解為“原始的形式”（Primitive form），把恩格斯引用“普那路亞”的例子來論述“普那路亞”群婚出現之後，如何轉化為與對偶婚相適應的全盛時期的氏族制度，誤解為“原始的氏族制度。”

這些新分出來的氏族，雖然起初仍是“普那路亞”的形式，可是，已經和從前有所不同了：由於這些從原來氏族分出來的氏族不只一個，而是幾個，並且每個新氏族也都包含了若干個“普那路亞”，因而親族關係比從前複雜得多了。為了嚴格遵守族外婚制、鞏固氏族組織，於是每個氏族有明確母系的必要，這是“必然占統治地位的观念”^④；因而出現了氏族女祖先。那位首先率領“普那路亞”這一群人從原來氏族分出來的女人，便成為這個新氏族的創立者——氏族的始祖；此後，從她開始計算世系。過去，因氏族分化而使族外婚一度混亂，產生了旁系親族通婚，現在被嚴格禁止了。這一階段的氏族組織，大概相當於易洛魁·辛尼加部落的氏族組織（附圖第Ⅳ階段）。

① 1960年Lorin Andrews的通訊，見摩爾根：《古代社會》，1957年中譯本，第487頁。

② F. Engels: *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1948, Moscow, P. 61. 英文為：“……we obtain exactly that circle of persons who later appear as members of a gens, in the original form of this institution.”

③ A. H. 格拉德舍夫斯基：《原始社會史》，第62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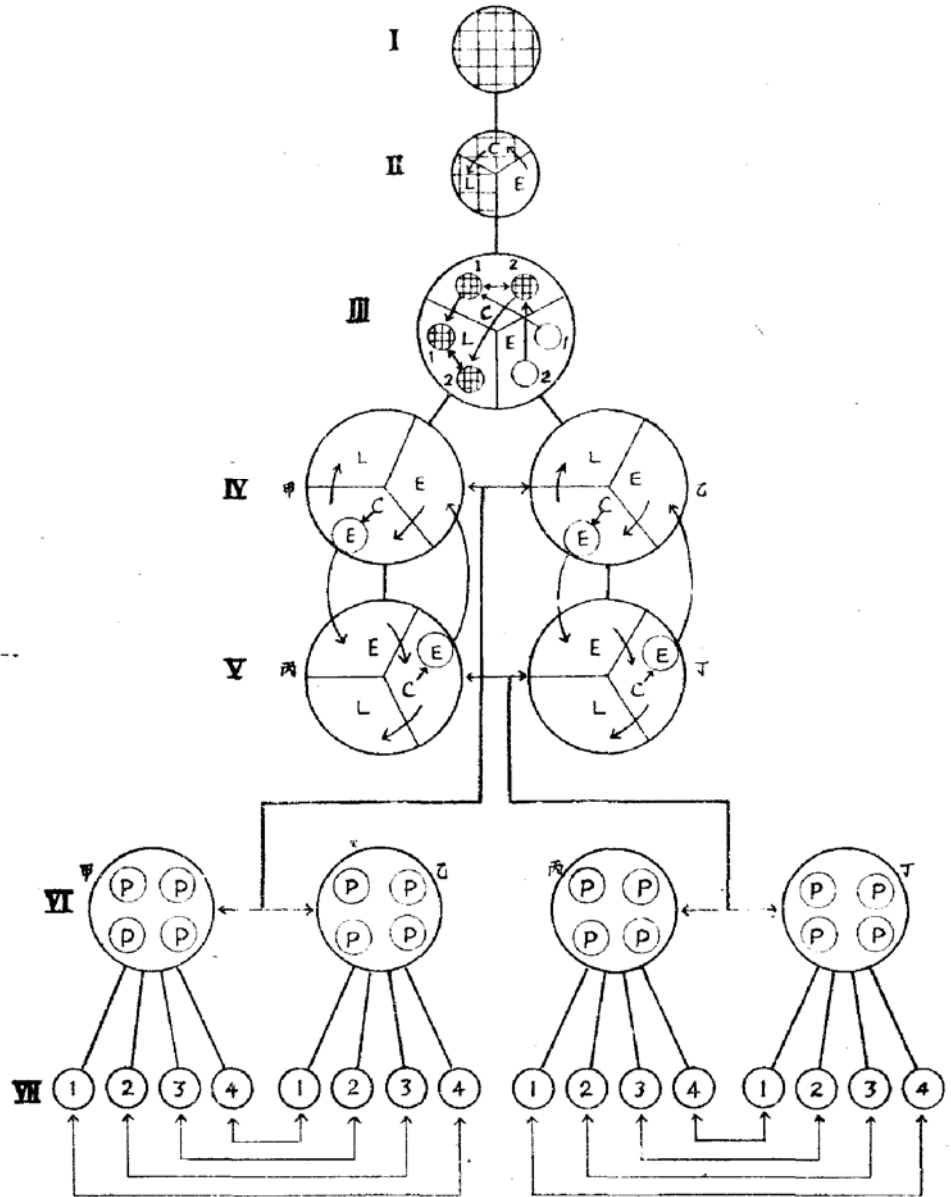
④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第81頁。

在发达的农业、畜牧业和渔业以及制陶等手工业的经济基础上，氏族开始出现的个体生产的萌芽，以及族外婚愈来愈要求严格的倾向，以至婚姻范围缩小到群婚制不能存在，因而出现了对偶婚家族。

恩格斯关于兄弟姐妹间和旁系亲族间的婚姻关系底禁止一經确定，便轉化为氏族这一段話，本来是針對这一阶段而言的；所謂“轉化为氏族”的“氏族”，就是与对偶

家族相适应的氏族。但是，就族外婚制的确立这一点而言，則为各期氏族形成的共通原理。有些人把恩格斯这句话誤解，^①作为否定氏族起源于旧石器时代的根据，显然是不对的。

恩格斯对于氏族的起源及其发展阶段是极其明确的，他指出：氏族在蒙昧中級阶段发生，在高级阶段发展起来，到了野蛮低级阶段便达到了全盛时代。^②無論如何，恩格斯不会自相矛盾地把氏族的发生阶段放在新石器时代，也不会把氏族的全盛时代放在旧石器时代，这是可以肯定的。



說明：圓圖大小係因制圖之便，無比例意義。

① A. H. 格拉德舍夫斯基：《原始社会史》，第62頁。

②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152頁。

略論中日甲午戰爭中的美帝國主義

谷 南

当代最凶惡的侵略者、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敵人美帝國主義，几乎是當它一跨進國際政治舞台那一天開始，就是靠侵略和戰爭餵養起來的。中國人民同這個最凶惡的敵人打交道的歷史——一部美國侵華史，最充分地暴露這條變色蛇的最凶狠貪婪的帝國主義本性和它的偽善欺騙的侵略手法。因此，研究美國在1894年的中日戰爭中所扮演的最可恥的角色，可以歷史地揭露美帝國主義的本性和丑惡嘴臉，使人們不致忘記歷史的教訓。

中日甲午戰爭是日本蓄謀侵略中國的一次戰爭，也是美國壟斷資產階級需要假日本之手，重新發動分割世界市場的一次戰爭。

十九世紀末，美國完成了資本主義向帝國主義的過渡。美國的工業比其它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以更快的速度發展起來是從美國南北戰爭以後開始的。南北戰爭，使北美的資本主義戰勝了南方的奴隸主莊園經濟。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里指出：“南北戰爭的結果，大的國債產生了，稅的壓迫加甚了，最平凡的金融貴族被造出了；極大部分的公共土地，被濫送給建築鐵道開採礦山等等投機家公司了——簡單說，有了最迅速的資本集中。”^①

從工業生產幾項主要產品產量來說，美國在1870年時煤的開採量為3,600萬噸，1890年便達到了14,300萬噸，而1900年時更達到了24,400萬噸，幾乎增加了7倍。1870年時，生鐵產量只有169萬噸，1890年達到935萬噸，1900年更達到了1,400萬噸。而鋼的生產則從1870年的7萬噸，迅速地增加到1890年的434萬噸，而1900年更高達1,035萬噸。^②

隨着工業生產的迅速發展和資本主義的劇烈競爭，於是出現了巨大的壟斷組織。到二十世紀初，洛克菲勒集團和摩根集團均已居于支配地位。“這兩個巨大集團聯合起來……組成全國工商界生命的心臟，其他一切都僅作為動脈”，^③由銀行資本和工業資本融合為一所形成起來的財政資本的壟斷組織，成了美國資本主義國家的真正主人，它們擁有的無限權能和專橫勢力，使美國資產階級國家成為執行對內加強剝削、對外急求擴張的反動政策、以保證壟斷組織獲得最大限度利潤的工具。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977—978頁。

② 這裡所列數字見《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統計集》，世界知識出版社1962年版，第64—65頁。

③ 穆蒂：《托拉斯的真相》，紐約，1904年，第493頁。轉引自龐森科：《瓜分中國的鬥爭和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三聯書店1953年版，第20頁。

必須着重指出的是，美国資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是以对本国劳动人民采取最野蛮最残酷的掠夺和剥削为前提的，这就不能不造成广大人民生活的极端贫困化。这正如列宁在《給美国工人的信》里所說的：“美国在发展人类联合劳动的生产力方面，在应用机器和一切最新技术奇迹方面，都在自由和文明的国家中間占第一位。同时美国也成了貧富間鴻沟最深的国家之一，在那里一方面是一小撮卑鄙齷齪的沉溺于奢侈生活的亿万富翁，另一方面是千百万永远在飢餓綫上掙扎的劳苦大众。”^①这种现状，使得美国垄断集团深感国内市场的局限，于是那些力图取得最大限度利潤的垄断资产阶级，便日益坚决地把目标轉移到国外市场去。但是，这个新兴的急于向外扩张的美帝国主义，毕竟由于立国太晚，在它还来不及大规模地参加瓜分世界市场的时候，世界便已被瓜分完毕，

“自由”領土几乎不再存在，这在美帝国主义看来，要滿足它的經濟扩张和殖民地扩张的貪欲，最好的对象莫过于中国了。因为这个国家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有着巨大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有着大量的廉价的劳动力，还可以給資本輸出以极大的方便。同时这个国家的大門虽然早已被列强（包括美帝国主义）打开了，但它在名义上毕竟还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并没有完全沦为某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而是列强正在宰割爭夺的目标。因此，如何在中国获得比其他列强更多的特权，进一步确立美国在中国的經濟势力和政治势力，便成为这个时期美国反动的对外政策的基点。早在1881年，美国海軍司令薛斐尔在給加利福尼亚参議員撒坚特的一封信里，就作了这样赤裸裸的暴露，这封信写道：“美国在中国的利益注定将来要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大得多……所以我們的政策应该是积极的，应该在道德规律（？）的范围内，专以美国利益为准繩，并且以他們所懂得的說服办法——以武力、压力，而不是劝解說服的办法，来予以推行。”^②

但是，美国积极要求向外扩张的野心和它当时自身的軍事力量还相当薄弱这一状况之間存在着矛盾，使它还不可能单独发动侵略中国的大规模战争来“推行”它的奴役和掠夺的扩张政策。尽管从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美国开始大力发展海軍，制造新式的巨型的战舰，然而美国这个时期的海軍力量还是处于世界資本主义国家的第五位。直到美西战争后，美国垄断集团内部还有一部分人对这一軍备状况表示不滿：“我們的海軍和陆軍只适宜于……沾小便宜”^③。特别是美国还没有取得太平洋通向中国的海軍基地，这更成为它在軍事力量的調配和物资供应方面无法克服的困难。在美帝国主义看来，英、俄、法、德等列强是它单独侵略中国的障碍，而日本这个資本主义还不很发达并且还遭受到美国奴役性条約控制的国家，既“持有开启东方的鎖钥”的作用，又不足以成为美国的竞争者。这样，它通过日本侵略中国的胜利，就可以在“最惠国待遇”的基础上获得它以前在中国所不能获得的利益，并由此逐步实现它对中国的独占。根据这一原则，美国在帮助日本进行了一系列的侵略中国的領土台湾和侵略中国的藩属琉球与朝鮮的活

① 《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版（下同），第13—14頁

② 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下同），第394頁。

③ 卡内其：《美国精神与帝国主义》。轉引自福森科：《瓜分中国的斗争和美国的門戶开放政策》，第122頁。

动并且在朝鮮初步站稳了脚跟之后，便又帮助日本发动了1894—1895年侵略中国的战争。

尽管日本有着它自己侵略中国的目的，尽管美国实际上低估了日本与美国竞争的力量，以致这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尔后争夺中国的东北的垄断权方面展开了尖锐的斗争，但这种同床异梦、各怀鬼胎的打算，并不排斥他们为了各自的侵略目的而互相勾结和互相利用。因为在当时的中国成为列强主要的争夺目标的国际形势面前，日本侵略中国，特别需要借重美国的政治势力，同样，如前所述，美国迫切需要倚重日本的军事力量来开辟其进一步侵略中国的道路。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美帝国主义在中日战争期间扮演了最可耻的角色。它挂着虚伪的“中立”招牌，一方面以“友谊中立”、“不偏不倚的中立”和“关怀”中国的字眼来愚弄清朝政府，骗取了清朝政府对它的信任，另一方面又大力宣传日本侵略中国是“文明”和“正义”的行动，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特别是英俄之间的矛盾来阻止列强对日本的联合干涉，并且还暗地里在军事上支持日本，最后则一手操纵了“马关条约”，从而在外交上、舆论上乃至军事上给日本最大的支持和帮助，并且成为这场战争发展与结局的精心策划者，干尽了它力所能及的一切罪恶勾当。

为了使日本在这次战争中进一步确立在朝鮮的殖民统治和利用朝鮮问题为进一步侵略中国找到借口，美国在朝鮮的使馆人员和美国的报纸故意把日本的侵略说成是“使朝鮮永久摆脱中国宗主权的支配”而战，是“把和平繁荣及开明带给它的人民，就这样地帮助这个日本的弱邻，巩固它的独立地位”而战。^①美国这种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做法其目的是十分明显的，因为美国对朝鮮的侵略，曾多次激起了朝鮮人民的反对，而1894年爆发的东学党的农民战争，一开始就揭起了“逐灭夷倭”的鲜明旗帜，形成了又一次更大规模的反对美日帝国主义侵略的革命运动。因此，美国把日本侵略朝鮮的行动，虚伪地宣传是为了朝鮮的“解放”，是为了帮助朝鮮成为文明的民族，就是企图麻痹朝鮮人民，使朝鮮人民把日本侵略者当作自己的“朋友”，有利于进一步确立、巩固日本在朝鮮的殖民统治，和在中日战争中使日本在道义上、政治上取得优势。同时使其他列强无法插手，从而使美国支持下的日本军国主义能放手发动和扩大侵略中国的战争。所以直到1894年10月，清朝政府一而再、再而三地吁请美国出面调处的时候，以及英国政府多次敦请美国出面联合其他列强共同负责中日和议的时候，根据《中东战纪本末》卷四所载美国官方“舆论”，还“皆赞扬日本，谓为义战”，认为“欧洲各国欲合力阻日，不任分外摧华”的行动是不对的。

美国在舆论上支持日本，还表现在日本军队大规模地屠杀旅順的中国人民这一事件方面。日本军队在旅順进行四天大屠杀，使全市只剩下为了掩埋死尸的三十六个人。根据英国人阿伦的《旅順落难记》的记载，日军在屠杀旅順的中国人民的时候，有的是“腰斩的”，有的是“穿胸的”，有的是“破腹的”，有的是“捉了许多逃难人，把那

^① 《美国外交文件》。载《中日战争》第7册，上海人民出版社版（下同），第433页。

辮子打了一个总结，他便慢慢的把做枪靶子打。有时斩下一只手，有时割下一只耳，有时剥下一只脚，有时砍下一个头，好象惨杀一个，他便快活一分。我所见的无论男女老少，竟没有饶放过一个。”日本侵略者这种惨绝人寰的血腥罪行，不仅是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的血海深仇，就是只要稍有点正义感的人也不能不为之发指！所以当时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强烈谴责，而日本也生怕由此引起一场巨大的风波，造成日本继续进攻中国的困难。就在这个时候，美国驻东京大使譚恩致国务卿格萊錫的报告却极力为日本辩护说：“我以为屠杀旅顺的中国兵这件事是违反近代文明战争习惯法规的（假若‘文明’这个名词可以适当地应用于战争的话）；但是克里曼先生送给‘世界’的报告，是极端地骇人听闻的，并且把发生的事情过分夸张。”^①譚恩之所以要对日本军国主义作这样恬不知耻的辩护，这并不是他自己对日本有什么特别的好感，而是忠实地服务于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即企图为日本开脱罪责，把日、美帝国主义这场侵略中国的战争进行到底。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美国官方舆论虽然不得不在公开的场合稍微压低一下自己高喊日本“文明”的腔调，然而却力图为本国减轻这次暴行的严重性，强调这是“日本审慎、人道并尊重现代战争惯例的总原则中唯一悲痛的例外”^②。真的是“唯一悲痛的例外”吗？不是的。日军在侵略中国的每一次战役中都毫无例外地进行了惨无人道的烧杀劫掠。关于这一点，就连外国人记载中也认为日军“得旅顺，攻登州，据荣城，俱向田舍村庄乱放炸弹，且焚烧民房，枪毙妇孥不计其数，此岂遵公法奉教化之国所忍出哉。”^③

在中日战争期间，美国在军事方面也给了日本很大的帮助。因为象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当时的某些外国人看来，似乎还不是那样可以轻视的。例如，英国人琅威理就曾说日本的军事力量“大非中国之敌；而况中国生齿之众，物产之丰，皆十倍于日本乎！”^④驻北京美国公使田貝在给国务卿格萊錫的报告里也很担心日本没有胜利的把握，^⑤为了促使日本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和在军事上战胜中国，首先是美国的军事专家参加制订日军侵略中国的军事作战计划，指出日军渡过鸭绿江的必要性，^⑥同时还派遣军事人员作为日本的军事顾问，供应日本作战的军舰，以及给予日本舰队悬挂美国旗以偷袭中国海军舰队的方便之外，美国驻华领事馆还挂着所谓“中立”的招牌，以居间保护日本在中国的档案及侨民为名，包庇日本侨民和间谍执行日本军事司令部关于在中国进行间谍活动的命令，美国领事馆把“改装蓬发，潜往各处窥探军情”的日本间谍称之为“日本安分之人”，加以庇护，使日本间谍在东北、上海、天津、汉口等地大量搜集中国的军

① 《美国外交文件》。载《中日战争》第7册，第460页。

② 美国《评论之评论》月刊，1895年2月。转引自福森科：《瓜分中国的斗争和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第25页。

③ 《中东战纪本末》。载《中日战争》第1册，第185页。

④ 《中东战纪本末》。载《中日战争》第7册，第517页。

⑤ 《美国外交文件》。载《中日战争》第7册，第432页。

⑥ 参看福森科：《瓜分中国的斗争和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第15页。

事情報，破壞軍事工業生產和軍事布防。例如，上海吳淞口五萬斤巨炮之被毀，湖北製造局機器及槍炮彈藥之被焚，^①甚至被中國地方官吏“搜有作奸實據”的日本間諜，亦“托名保護”，拒絕予以“按律懲辦”，或者是“復求保送回國”^②。這樣，當時的美國駐華領事館實際上成了日本間諜活動的大本營。

為了幫助日本順利地實現侵略中國的預定計劃，美帝國主義堅決拒絕了英國一再邀請美國會同其他列強調停中日軍事衝突的建議，並且背信棄義地一再拒絕朝中兩國請求美國仲裁的呼喚。本來，1858年的中美天津條約和1882年的朝美條約，都規定了當某一國家對中國、朝鮮採取敵對行動時，美國負有從中調解、相助的義務。中美天津條約第一款規定：“若他國有何不公輕藐之事，一經照知，必須相助，從中善為調處，以示友誼關切。”對於美帝國主義來說，所謂“從中善為調處，以示友誼關切”，就是借“調處”之名，以行侵略之實。所以即使象英國提出的朝鮮“獨立”和中國賠償戰費這樣的條件作為議和的基礎，美國也表示不能參加各國共同的調停。這種極力阻止列強對日本的干涉行動，連美國資產階級歷史家丹涅特也不得不承認：“當中日戰爭的時候，在衝突結束以前，阻礙歐洲列強對日本進行干涉的，只是美國一國。”^③然而在外表上不裝出一點“友誼關切”的樣子，又畢竟不利於愚弄欺騙腐朽無能的清朝統治者，於是，美帝國主義抓住清朝政府在戰爭中消極抵抗，積極要求調處的致命弱點，一方面極力阻止列強對日本的干涉，方便了日本把戰火一步步地擴大，另一方面則又以“極關懷”中國的口吻表示：“中國此時言和，恐為人藐視。歐洲各國伺隙者多，均有利中韓土地之心，後患可慮。”^④美帝國主義不願在此時应邀出面“調處”的真正原因，卻是因為這時還不是“借戰禍而得實益”的最好時機，特別是這樣就不能達到其一手包辦“調處”的罪惡企圖。對於這種企圖要使中國在戰爭中遭到更大的失敗的卑鄙陰謀，清朝統治者不僅沒有一點認識，相反的卻是感激涕零，在戰爭後期把議和的希望完全寄托在美國身上。

當日本的戰火已經燃燒到了中國境內，並且遼沈震動，遼西告警的時候，美帝國主義意識到再不結束戰爭就會引起列強的干涉，同時“借戰禍而得實益”的時機也已經成熟了，於是美帝國主義便實行“從中善為調處，以示友誼關切”的“諾言”了。它一方面提醒日本應該馬上結束這場戰爭，否則，“與東方局面有利害關係之歐洲強國，難免對日本將來之安固幸福為不利之要求，以促戰爭之終局”^⑤。另一方面，美國國務卿格萊錫又向中國駐美國公使楊仔表示願意出面調停。格萊錫說，“總統已允調處，即日電駐日本使，備陳利害，勸其息兵；但不同各國”。^⑥至此，美帝國主義的“司馬昭之心”，就自我暴露了。早在和議之前，田貝致國務卿的報告說，中國為了賠償戰費，必

① 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載《中日戰爭》第3冊，第76頁。

② 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載《中日戰爭》第3冊，第44頁、第80頁。

③ 丹涅特：《美國人在東亞》，第2頁。

④ 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載《中日戰爭》第3冊，第183頁。

⑤ 陸奧宗光：《蹇蹇錄》。載《中日戰爭》第7冊，第167頁。

⑥ 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載《中日戰爭》第3冊，第190頁。

須出讓“從未讓與之各項特殊權利”，“它可以把鐵路企業權賣給一家辛迪加，把采礦權賣給另一家，把開設銀行的權利賣給第三家，造成一系列特殊權利的關係”。^①而田貝在同李鴻章的極端秘密談話里，就認為“鐵路的建築，銀行和礦業的權利”，“都應該放置在英語民族手里”。^②許多美國公司的代表在中日戰爭尚未結束之前就來到了中國，企圖作輸出資本的最初嘗試。為了達到上述目的，美國人端迪臣充任了日本的和談顧問，站在日美帝國主義一邊，“已為倭起約定稿，索款索地”，^③專門等待中國和談代表前去辦理簽字手續，而在中國這一方面，田貝又極力認為“美國應該監督中日和談，為着條約國家的利益，提供意見”^④。這也就是說，在中國方面同樣需要一個美國人監督、幫助李鴻章更好地迅速地完成由美國人端迪臣草擬的和約的簽字手續。因此，田貝千方百計要清朝政府聘請美國前國務卿科士達作為和談的顧問。

這個作為中國議和代表的法律顧問兼外交顧問的科士達，究竟給中國幫了些什么忙呢？除了科士達和端迪臣這兩個美國人在表面上做了些互相辯論，扮演了一出滑稽的雙簧戲之外，他們暗地里串通一氣，建議伊藤博文向李鴻章施加壓力，如果李鴻章不按照端迪臣草擬的條約簽字，就要“更圖大舉”，用十萬兵力“直犯京畿”，而科士達又以中國和談顧問的身分向李鴻章進行“深慮決裂，恐難力爭”^⑤的恫吓。當李鴻章鑒於台灣人民的反對，不敢親自到台灣去辦理割讓台灣的手續而感到進退為難的時候，科士達又馬上向李鴻章解釋：只要按照“西方國家的普通辦法”，把割讓台灣的書面文件交給日本就算完成了這一樁骯髒的交易。可見科士達在為美日帝國主義的利益效勞，的確是不遺余力的。這就無怪陸奧宗光說，科士達“作了顧問後，那末我們的行動，就受不到象我們單獨同中國會談，在方法上是不正常及遲延的那種限制……他的出席，將加速會議的進行”^⑥。這不僅因為科士達本人是親日派，而更主要的是科士達的行動是直接受美國政府指示的。

在“馬關條約”簽字後六日，即1895年4月23日，俄、德、法三國正式通知日本必須放棄在“馬關條約”中規定的占領遼東半島。這時候，清朝政府還沒有批准條約，幻想從三國干涉還遼事件中迫使日本放棄更多的權利，美帝國主義在這種局面下，便又訓令駐北京美國公使田貝向清朝政府施加外交壓力，力促迅速批准“馬關條約”。^⑦同時更通過科士達在軍機大臣會議上大肆恫吓，強調“條約已不是李鴻章的條約，而是皇帝的條約了，因為在簽字前每一個字都電達北京，皇帝根據軍機處的意見，才授權簽字的。

① 《美國歷任國務卿及其外交政策》。轉引自福森科：《瓜分中國的鬥爭和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第23頁。

② 魁特：《美國外交關係史》。轉引自啣汝楫：《美國侵華史》第2卷，第212頁。

③ 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載《中日戰爭》第3冊，第433頁。

④ 魁特：《美國外交關係史》。轉引自啣汝楫：《美國侵華史》第214頁。

⑤ 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載《中日戰爭》第3冊，第609頁。

⑥ 科士達：《外交回憶錄》。載《中日戰爭》第7冊，第465—466頁。

⑦ 參看《蹇蹇錄》。載《中日戰爭》第7冊，第181頁。

假若他拒絕批准的話，他將失掉了體面，對於皇帝的不體面，軍機大臣是應負責的”^①。這樣，一群昏聩無知的軍機大臣們，終於被科士達的怪論所吓倒，第二天，光緒便在御前會議上批准了“馬關條約”。

這就是美帝國主義這位“調停者”的本色！這就是美帝國主義所給予中國的“關懷”和“友誼”！

但是，在中日戰爭期間，清朝統治者的的確確被這位“調停者”欺騙了，被這種“關懷”和“友誼”蒙蔽了。從清朝政府《擬致美國國書稿》就足夠說明這一點，《國書》說：“我兩國久敦和好，最為關切。自上年日本與中國失和以來，經大伯爵璽天德特飭駐劄中華便宜行事大臣田貝，按照昔年成約所載，他國有不公輕蔑之事，必須相助，從中善為調處之意，竭力籌畫。田貝辦事精詳，向為朕所嘉許；此次奉命為中日兩國極意調停，深資贊助。茲特各國書，寄交出使貴國大臣通政使司副使楊仔，親為齎遞，用達感謝之忱。并望……仍飭田貝隨時從公助理，并飭貴國駐扎日本大臣一體襄助，以期于事有益，朕實有厚望焉。”^②

這種“認賊做父”，把侵略中國的敵人，看作為自己“最親密的朋友”的與虎謀皮的做法，使中國在中日戰爭中吃了大虧，而美國“朋友”却假日本之手撈到了它過去在中國所不能夠獲得的更大的好處。

由美國一手操縱的“馬關條約”，增添了沙市、重慶、蘇州、杭州四個通商口岸；日本輪船可以駛到重慶、蘇州和杭州；日本可以在中國設廠自由製造各種商品。這些商埠的增設和內河航行權的擴大，以及取得了過去從未有過的外國人可以在中國設廠的“合法”權利，這不僅是進一步有利於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商品輸出，而更重要的是第一次在條約上確定了外國向中國進行資本輸出的法律根據。從此，美國利用“最惠國待遇”所享受的“馬關條約”各款作為依據，使美國對華的商品輸出和資本輸出活動空前地發展起來。資本輸出是與商品輸出密切聯系的，在商品輸出方面，美國向中國本土銷出的商品從1895年的3,604,000美元，驟增至1900年的15,259,000美元，在甲午戰後的五年間幾乎增加五倍。在資本輸出方面，於“馬關條約”之後，美國就在上海設立了兩個紗廠、一個紙煙廠、一個造紙廠、一個碾米廠（其中包括一些中國買辦資本）。同時又積極籌劃銀行的投資事業，並於1902年在上海設立了花旗銀行分行，至1907年又在香港、廣州、北京、漢口設立了四個分行。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壟斷資本家在“馬關條約”之後更策劃了一個企圖掠奪中國全部鐵路的所有權、經營權、管理權、修築權和借款權的龐大的侵略計劃，由此而進一步控制整個中國的政治與經濟命脈。為了實現這一狂妄的侵略野心，美帝國主義積極在清朝統治者內部培植親美派，培植洋奴買辦勢力，同時又時而與這個帝國主義勾結起來，時而又與那個帝國主義勾結起來，在中國展開了縱橫捭闔的爭奪控制權的鬥爭，給中國人民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極其深重的災難。

① 科士達：《外交回憶錄》。載《中日戰爭》第7冊，第480—481頁。

② 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載《中日戰爭》第3冊，第404頁。

资产阶级的对内对外的反动政策，总是施展反革命两手的，即实行暴力与“非暴力”相结合。在这方面，美帝国主义表现得尤为突出。美国一手拿着箭，一手拿着橄榄枝的侵略政策，就是近百年来美国所奉行的对外掠夺和奴役的传统政策。而1894年中日战争中所玩弄的欺骗手法，只不过是它一手拿着箭，一手拿着橄榄枝的对外侵略政策的翻型。在美国对外侵略的历史上，究竟什么时候穷凶极恶地挥舞刀枪，什么时候煞费心机地玩弄阴谋，或者是两者错综复杂地结合起来，这取决于具体的历史条件。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不管它变出什么颜色，本质上都是一条帝国主义的毒蛇。列宁在谈到1918年，英、日等帝国主义国家联合进攻苏维埃俄国，企图把这个刚出生的婴儿扼杀在摇篮里的毒计时所指出的美帝国主义的罪恶，就是对帝国主义者采取不同的侵略方式达到同一侵略目的的最深刻、最有力的说明。列宁说：“正是目前，美国的亿万富翁们，这些现代的奴隶主，揭开了血腥的帝国主义的血腥史上特别悲惨的一页，同意了英日野兽们为扼死第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而举行的武装进攻，不管这种同意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是公开的还是巧妙地掩盖起来的，都是一样。”^①毛泽东同志在1949年所写的《“友谊”，还是侵略？》一文，对于艾奇逊为了寻找侵略中国的根据而胡诌的一大堆“友谊”、“原则”所作的最深刻、最有力的驳斥也指出：“艾奇逊当面撒谎，将侵略写成了‘友谊’。”^②

毛泽东同志说，在和帝国主义作斗争中，必须“……不相信帝国主义的‘好话’和不害怕帝国主义的恫吓”^③，而是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历史证明，是相信帝国主义的“好话”自我陶醉于所谓“友谊”之中，还是对帝国主义不抱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坚决分清敌友，明辨是非，这是革命成败攸关的问题。

① 《列宁全集》第28卷，第4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下同），第1509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32页。

重工业以农业为重要市场的意义

王安民

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这是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工业和农业发展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论点，是他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上一个创造性的贡献。对于这个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问题，我们可以从多方面进行学习研究，本文仅就社会主义条件下重工业市场的三个方面的相互关系，和重工业以农业为重要市场的特别重要意义这两点，作初步的探讨。

再生产过程是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流通是再生产过程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它决定于生产，又能反作用于生产。要使再生产不断进行，不仅要完成生产过程，还要完成流通过程。因此，在社会分工条件下，一切产品都要实现，这是再生产得以继续进行的必要条件。重工业生产基本上是生产资料生产，它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现代化的物质技术装备，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技术改造都离不开重工业，整个国民经济各部门都是重工业产品的市场。但是，如果仅从物质生产领域来看，可以说重工业的市场主要有三个方面，即重工业本身、农业和轻工业；重工业以它的自身为市场，这是它的内部市场，重工业以农业和轻工业为市场，那是它的外部市场。重工业产品有一部分用来装备它本身，即用来补偿本部门已消耗的生产资料和追加本部门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资料。这部分产品在重工业内部各部门、各企业之间进行交换，并不进入农业和轻工业等部门，形成了重工业的内部市场。重工业在它内部流通，以它本身为市场，这是必要的。因为重工业是社会性的大生产，重工业本身是一个有着严密社会分工的体系，重工业各行业、各企业之间存在着互相依存、互相制约的关系，如果重工业产品不在它内部流通，不满足它内部各个行业各个企业对生产资料的需要，它就不能顺利地实现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也就不能生产出为农业和轻工业所需要的各种机器设备和其他生产资料，不能使农业和轻工业的再生产得以顺利进行。

重工业以它的产品的一部分来装备农业，即向农业提供现代生产工具和其他生产资料，为农业技术改革和农业生产服务。这一部分重工业产品在重工业与农业部门之间流通，以农业为市场。重工业还为轻工业提供技术装备和其他生产资料，满足轻工业生产对于重工业产品的需要，这一部分重工业产品在重工业与轻工业部门之间流通，以轻工业为市场。重工业产品在农业部门和轻工业部门流通，以它们为市场，这是重工业的外部市场。重工业以农业和轻工业为外部市场，不仅是农业和轻工业进行再生产和技术改造的不可缺少的条件，也是重工业再生产本身的要求。

重工业的发展，重工业的扩大再生产，在一定的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它的

内部市场来实现其产品。一方面通过内部市场的交换，各企业补偿所消耗的生产资料 and 追加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另一方面，通过内部市场的交换，各企业的产品也可以推销出去，使重工业的再生产得以进行。例如在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期，为了打下重工业的基础，在一定时期内，重工业产品较多地用来装备它本身，较多地在它内部进行交换，较少或很少用来装备农业和轻工业。这是必要的，可以的。但是，重工业的发展不能离开农业和轻工业，重工业产品的实现不能不依赖于它的外部市场。因为从物质再生产总过程的生产 and 消费的关系来看，生产是再生产总过程的起点，消费是它的终点和目的，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又反作用于生产。任何物质资料生产归根到底总是为了个人消费，重工业所生产的生产资料，虽然不是直接用于个人消费，而是直接用于生产消费，但是，生产消费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生产消费品，它归根到底要同个人消费相联系，要依赖于个人消费。列宁在谈到扩大再生产条件下，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品生产的相互关系时说：“社会产品的第一部类（生产资料的制造）能够而且应当比第二部类（消费品的制造）发展得快。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生产资料的生产可以完全不依赖于消费品的生产而发展，也不能说二者毫无关系。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写道：‘我们看到（第2卷第3篇），在不变资本和不变资本之间，产生了一种不断的流通，这种流通从来 not 进入个人消费的领域，就这个意义而言，它是不以个人消费为转移的，但归根到底它还是受个人消费的限制，因为不变资本的生产并不是为了本身的需要而进行的，这仅仅是由于生产个人消费品部门需要更多的不变资本。’由此可见，生产消费（生产资料的消费）归根到底总是同个人消费联系着，总是以个人消费为转移的。”^①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重工业的目的，决不是只是为了重工业本身的需要，而是为了向其他国民经济部门，首先是农业和轻工业提供技术装备和其它生产资料，使它们能日益增多地生产大量消费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消费品需要，这是发展重工业的最终目的。因此，即使是在重工业内部市场流通的重工业品，虽然直接为了重工业生产的需要，但是归根到底也是为了向农业、轻工业等生产消费品部门提供生产资料而来装备重工业自己；这些直接供给重工业本身生产需要的重工业品，它们通过一系列的环节，经过复杂的经济运动，最终地要与重工业的外部市场发生联系，要与农业和轻工业生产发生联系。可见，重工业必须以农业和轻工业为市场，并且必然要依赖于这个外部市场。

重工业的内部市场和外部市场之间，有着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就我个人的体会，主要表现于下列几方面：

第一，资本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历史都表明，重工业就是直接间接适应于农业和轻工业的技术改革和生产发展的迫切需要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并且，重工业的生产资料生产，归根到底要依赖于个人消费，依赖于生产消费品的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所以，重工业的内部市场和它的外部市场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这样说，重工业内部市

^① 《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4页。

场的存在和发展，直接地或者最终地取决于农业和轻工业对于重工业品的需要，取决于农业和轻工业这个外部市场对重工业产品的容纳量。农业和轻工业发展，这个重工业的外部市场的容量扩大了，就必然直接推动那些直接为农业和轻工业服务的重工业行业和企业的发展，间接促进重工业内部市场的扩大；而重工业发展了，它为农业和轻工业服务的能力提高了，它就能够生产更多的产品来满足农业和轻工业的需要，推动农业和轻工业生产的发展，促进农业和轻工业这个重工业的外部市场扩大。如果重工业不以农业和轻工业为市场，不面向这个外部市场，而是为重工业而发展重工业，只是为它的内部市场服务，它虽然也可能在短期内得到发展，但是由于重工业的内部市场容量有限，并且这个容量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外部市场的制约，这样，重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它就会由于得不到外部市场的直接推动和间接影响，而使它的内部市场愈来愈狭窄，以致于产品销售不出去，再生产不能顺利进行，甚至陷于没有出路的境地。

第二，重工业的发展，重工业的扩大再生产，不仅要追加生产资料，而且要追加劳动力和生活资料；不仅要增加直接从事物质生产的人员，而且要增加为生产服务的各种非生产性的服务人员以及他们所需要的消费品。建设一个大型的石油企业，实际上就是要建设一个包括各种服务行业在内的石油城。尤其是象我国这样经济技术比较落后、原来重工业基础较薄弱的国家，重工业的扩大再生产主要通过基本建设，即扩大旧企业和增加新企业来实现，它需要增加更多的劳动力。而要增加劳动力，增加粮食、衣物等消费品的供应，就要有农业、轻工业的发展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马克思说：“能够投于工商业上面而无须从事农业的劳动者人数……是取决于农业者在他们自身的消费额以上，能够生产多少的农产物。”^①因此重工业必须要以农业、轻工业为市场，为农业和轻工业提供日益增多的技术装备，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并使农业和轻工业得到较快的发展，重工业才能够从农业和轻工业部门取得它本身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和生活资料。重工业以农业和轻工业为市场，实际上就是为它本身的发展创造条件。如果为重工业而重工业，重工业不以农业和轻工业为市场，不为它们服务，长此下去，农业和轻工业就会落后于重工业的发展，这就会使农业抽不出劳动力来支援工业，而且势必要发生消费品供应紧张的现象，并使农业和轻工业这个重工业的外部市场的容量，愈来愈小。这样，重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就必将受到严重的障碍。

第三，要发展重工业就要有资金，要有大量的基本建设投资。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不仅有可能而且有必要动员和集中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相当一部分积累来建设重工业。重工业的内部积累是有限的，只依靠重工业的内部积累来发展重工业是不够的。特别在我国，目前重工业比重较小，农业和轻工业的比重较大，建设重工业的资金大部分直接间接是依靠农业和轻工业方面积累起来的。因此，要使重工业得到更快的发展，就要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这又需要重工业以农业和轻工业为市场，积极支援农业和轻工业，使农

^①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1卷，三联书店1949年版，第41页。

业和輕工业得到較快的发展，才能动员和集中更多的資金来发展重工业。正如毛泽东同志說：“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資金，其中有一个相当大的部分是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这除了直接的农业稅以外，就是发展为农民所需要的大量的生活資料的輕工业的生产，拿这些东西去同农民的商品粮食和輕工业原料相交换，既滿足了农民和国家两方面的物资需要，又为国家积累了資金。”^① 如果为重工业而重工业，重工业不以农业和輕工业为市场，农业和輕工业就会发展得很慢，国家财政收入就不可能有很快的增长，重工业的投資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重工业的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很高的速度。

整个国民經济的各个部門都是重工业的市场，其中重工业以农业为市场，意义特別重要。

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是我国发展国民經济的总方針。重工业以农业为重要市场，对于充分發揮农业的基础作用和充分發揮工业的主导作用，并把两者很好地結合起来，具有重大意义。农业是基本的生活資料生产部門，是国民經济发展的基础，农业的发展是工业和整个国民經济得以发展的先决条件。重工业以农业为重要市场，积极地为农业生产和农业技术改革服务，及时地更好地滿足农业对于重工业产品的需要，必然使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农业生产不断地发展，使农业日益增多地向工业和其它国民經济部門提供商品粮食、副食品、原料、劳动力、資金和市场，从而使农业更充分地發揮它的基础作用。农业发展了，輕工业所需要的劳动力，农产品原料和市场就有了保証，它就必然迅速发展；而“农业和輕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資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② 显然，重工业以农业为重要市场，从为农业生产和农业技术改革服务来发展重工业，重工业发展速度会更快，它在国民經济中的主导作用就能更充分地發揮。通过重工业以农业为重要市场，使重工业和农业更好地互相支援，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就必然使农业生产更好发展，国民經济的基础更为加强，就更有利于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工业的主导作用更能充分發揮；反过来，工业愈是順利地发展，它的生产水平愈高，它内部的结构愈是同农业发展要求相适应，它的主导作用就更大，就更能促进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使农业在国民經济中的基础作用更充分地發揮。因此，重工业应该主要以农业为市场。只有重工业以农业为重要市场，才能充分發揮农业的基础作用，有利于工业和整个国民經济的发展；才能充分發揮重工业的主导作用，以尽它改造国民經济的职責。不然，重工业生产就要迷失方向，而所謂重工业的主导作用，就要大半成为空話。

农业现代化和工业现代化是辯証統一的关系。沒有工业现代化就不可能实现农业现代化；不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也不能順利实现工业现代化。重工业以农业为重要市场，重工业生产面的农业，是使农业现代化和工业现代化密切联系，互相促进的关键所在。我国农业原来是个体經營的技术落后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产量不高。这是我国发展

^①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問題》，人民出版社版，第24頁。

^②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人民出版社版（下同），第37頁。

重工业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个很大障碍。如果不解决发展农业生产的问题，我国重工业的发展便要遇到极大的困难，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便不可能顺利实现。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主要是通过加快合作化步骤来促进农业生产发展，为发展重工业创造条件。但是，合作化的实现，并没有根本改变我国农业技术落后的面貌，直到现在我国农业仍然处于使用手工工具、畜力和自然肥料为主的阶段。只要这样的农业技术落后的面貌得不到根本改变，农业的发展，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极其有限。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决定于许多因素，有生产关系方面的因素，有生产技术方面的因素。在一定的生产关系条件下，主要的决定因素是农业技术装备的程度、农业用的生产资料的改善，也就是说主要决定于农业技术改革和农业现代化的实现。进行农业技术改革，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离不开工业现代化。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有十六亿亩耕地，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基本内容是：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和水利化，这是一个非常艰巨和复杂的任务，仅从物质技术方面来说，它就需要巨量的各种农业机械、化肥、农药、燃料、动力、运输工具和建筑材料等现代技术装备和物资。据统计，我国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按我国目前耕地十六亿亩计算，全国就需要农业机械动力将近一亿三千万马力，拖拉机八十万台（按可耕地十二亿亩计算），载重汽车四十万辆，排灌机械二千万马力（按需机灌面积八亿亩计算），化肥二千四百万吨，农业用电近八十亿度。”^① 这么巨大的数量，只能靠自己的重工业来解决，不可能依靠进口来解决。显然，离开工业现代化，离开强大的重工业是不可设想的。重工业以农业为重要市场，面向农业，积极地以现代技术装备和其它生产资料支援农业，是农业技术改革得以顺利地进行，农业现代化得以逐步实现的基本前提。同时，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农业生产不断发展，农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基础作用日益加强，又必将进一步推动工业现代化的发展。毛泽东同志在我国基本实现农业集体化后指出：“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这一点，目前还没有使人们看得很清楚。但是随着农业技术改革逐步发展，农业日益现代化，为农业服务的机械、肥料、水利建设、电力建设、运输建设、民用燃料、民用建筑材料等等将日益增多，重工业以农业为重要市场的情况，将会易于为人们所理解。”^②

重工业以农业为重要市场，推进农业技术改革，不仅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而且也是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我们党在农业问题上的根本路线是：第一步实现农业集体化；第二步，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现代化。现在我国农业集体化已经推进到了人民公社这样的新阶段，在这个基础上开展农业技术改革，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不仅是进一步巩固集体经济的迫切需要，也是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的迫切需要。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我国人民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

① 《人民日报》1963年6月20日，第5版。

②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37页。

設最終勝利的根本保證。現在我國工农聯盟已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在進一步鞏固農村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的同時，把工农聯盟建立在逐步實現農業現代化的基礎上。重工業以農業為重要市場，促進農業技術改革順利開展，逐步地使我國農業生產在現代化的物質技術基礎上不斷發展，有利於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堅定他們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心和決心，有利於鞏固和發展人民公社集體經濟，有利於改造農民由於長期個體經營和使用手工工具而產生的小生產者的思想習慣，有利於增強工人階級對農民的領導權，這一切必然進一步鞏固工农聯盟。

廣東經濟學會討論農業技術經濟效果的實質等問題

今年四、五月間，廣東經濟學會農業經濟學組就農業技術經濟效果問題進行了初步的討論。參加討論的除了研究農業經濟的社會科學工作者以外，還有部分從事農業技術研究工作的自然科學家。與會者一致認為，農業技術經濟這門科學是介於技術研究和經濟研究之間的邊緣科學，農業經濟學界與農業科學技術界要互助協作，才能有效地解決在理論研究和生產實踐中所提出的各種問題。會上主要討論下列問題：

一、關於農業技術經濟效果的實質問題。

一種意見認為，農業技術經濟效果的實質就是研究農業生產在一定生產技術條件下對勞動（包括活勞動和物化勞動）的消耗與勞動成果的評價。凡是勞動消耗少而獲得的勞動成果大，其經濟效果就高，反之則低。另一種意見認為，農業技術經濟效果，指的是在農業生產活動中，採用某種農業設計或方案以後，對勞動消耗量的增減程度與生產成果的比較。並強調說技術措施的經濟效果不經過比較，就難以進行評價。

也有人認為上述兩種意見作為農業技術經濟效果一般的表述是可以的，但作為社會主義農業技術經濟效果的實質應該是：對存在一定條件下的農業生產活動中，所採用各種旨在增加生產，滿足社會需要的農業技術措施，進行勞動耗費與有用效果的評價。

討論中，有的同志提出：農業技術經濟這門科學主要是研究以農業生產八字憲法為中心的農業技術改革的經濟效果。在現實中，生產效果與經濟效果並不完全一致，農業技術經濟這門科學必須把生產效果與經濟效果結合起來，全面考察，才能找到切合實際的最好的技術改革措施或方案。

二、關於評價農業技術經濟效果的指標體系問題。

會上基本一致的看法是：考察社會主義農業技術經濟效果的指標體系，必須以遵循下述原則為前提：

1. 企業的生產項目必須服從國家的生產任務；2. 個別的眼前的經濟效果必須服從社會的長遠的經濟效果。並且認為，任何一個指標都不能全面地比較農業技術經濟效果，即勞動耗費與有用效果的關係，而必須根據不同對象，不同目的要求，分別採取各種不同的指標。但對指標體系的具體內容則有不盡相同的看法：

有人認為，評價農業技術經濟效果可採取如下幾個指標：1. 單位面積產量（產值）指標；2. 農業勞動生產率指標；3. 單位產品成本指標；4. 每畝盈利率指標；5. 流動資金利用率指標；6. 農產品商品率指標。其中第1、2、4是主要指標。有人不同意這種看法，他們認為上述指標作為評價農業技術經濟效果雖是重要的，但不够全面。由於農業的複雜性、多樣性以及農業生產是經濟再生產過程與自然再生產過程相互交錯等特點，因此在評價農業技術經濟效果時，還必須結合農業生產本身的特点，根據不同情況進行具體分析。例如一般來說，水稻的直播比插秧的單位面積產量較低，但在某些地多人少的沙田地區，在插秧進度趕不上季節的要求時，從不違農時，保證有較高的總產量方面來考察，直播比插秧甚至有較大的經濟效果。此外，評價農業技術經濟效果，不但要注意其直接的經濟效果，而且還要注意間接的經濟效果。因為任何農業技術的使用，不是孤立地進行的，因此不能忽視其間接經濟效果的考察。還有人認為，第一種意見所說的指標體系基本上是屬於經濟核算範疇的指標體系，評價農業技術經濟效果，除經濟核算的指標以外，還必須運用統計學上的指標和技術指標。

此外會上也有少數同志認為經濟效果也應該象技術效果一樣，需要有一個綜合性指標，才能在同一基礎上對各種技術措施進行比較和評價。持這種意見的同志認為這個綜合性指標就是單位產品的成本指標。因為只有這個指標才能多方面反映其他指標的要求。

（鳴）

对“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 的一点理解

田 璜 一

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这一問題，是一九五七年二月間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的著名講演中，当作我国工业化道路的一个关键性問題提出来的。当时，我們国家的經濟状况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主要的是：第一，在农业方面，基本上完成了“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即基本上实现了农业的社会主义合作化；第二，在工业方面，經過第一个五年計划的建設，社会主义工业化有了一个初步的基础。这样的情况說明了什么？一方面，它說明了我国的社会主义經濟制度經過对农业、手工业和資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后，已基本上建立起来了；另一方面也說明了我国的工业建設正朝着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目标前进。但是，这种新的形势，又向我們提出了新的任务：在农业方面，怎样在基本完成“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的基础上，在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集体經濟的基础上，实现“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在工业方面，怎样在已經取得初步的成就的基础上，沿着正确的道路加速工业的现代化？这就是历史所赋予我国人民的一项严重的光荣的社会主义經濟建設任务。要正确地解决这一任务，就必须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找到一条正确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毛泽东同志在上述著名的講演中說：“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的問題，主要是指重工业、輕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問題。我国的經濟建設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須肯定。但是同时必須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輕工业。”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当作我国工业化道路的一个带关键性的問題提出来的。“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必須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較多的資金。大家知道，輕工业和农业有极密切的关系。沒有农业，就沒有輕工业。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这一点，目前还没有使人們看得很清楚。但是随着农业的技术改革逐步发展，农业的日益现代化，为农业服务的机械、肥料、水利建設、电力建設、运输建設、民用燃料、民用建筑材料等等将日益增多，重工业以农业为重要市场的情况，将会易于为人們所理解。”（《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第37頁）

大家知道，在实现农业合作化以前，农业不可能成为重工业的主要市场。这是因为当时小农經濟还是一片汪洋大海。小农經濟力量薄弱，生产规模狭小，它不能使用、或

者不能大量使用重工业所提供的现代化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因而当时的农村市场对重工业产品容纳量极其有限；另一方面，当时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还刚刚开始，重工业本身力量还很薄弱，它生产出来的产品主要是用来装备工业部门本身。因而，当时工农业之间的经济结合，主要是通过工业日用品和农产品的交换来实现。在这期间，国民经济发展中的矛盾，主要不在于农业市场能够容纳多少重工业产品，也不在于重工业能够为农业提供多少生产资料，而是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农业生产水平低，远远不能满足社会主义工业化对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一年比一年增大的需求。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这个矛盾如果不解决，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事业，就会遇到极大的困难。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抓住了这个矛盾，提出了我国农业合作化的步骤应当和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相适应的方针，着重解决了农业合作化问题，从而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并促进了国家的工业化事业。

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问题，是毛泽东同志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末期提出来的。经过执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伟大实践，经过党的反复教导，我们对这一方针的极端重要性及其伟大意义，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我们认为：重工业以农业为重要市场，而向农业、为农业的技术改革和农业生产服务，既可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又可以加速我国工业现代化的进程；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既为重工业本身找到了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又为在我国建立一个完整的、独立的、现代化的工业体系找到了一个关键性的环节。

农业和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两个最基本的物质生产部门，它们之间有着相互依存的关系。农业是发展国民经济的基础，“超越于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资本论》第3卷，第1025页）也是工业能够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国民经济中一个独立的部门的基础；可以说没有农业的发展，就没有工业的发展。而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则是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物质技术基础，没有工业为农业提供的生产工具和其他生产资料，农业也不能进行再生产。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农业和工业之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农业落后于工业，城市和乡村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对立，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固有现象。因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农业和工业之间的相互联系是建立在对抗性矛盾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消除了资本主义所固有的不可克服的对抗性矛盾，完全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社会那种农业落后于工业的现象，完全可能有计划地“使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发生密切的内部联系”，（《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第603页）使两者互相推动，互相促进。

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实现工业现代化，是一个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统一的不可分割的过程。工业现代化发展进程，必然要求不断地改造农业，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大大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为工业的迅速发展开辟广阔的天地。反过来，农业集体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又离不开工业的支援。只有在工业有能力日益增多地为农业提供各种现代生产资料和农村市场需要的其它工业产品的情况下，农业现代化才能逐步实现。毛泽东同志早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

中，就揭示了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造之间的密切的不可分割的关系。他说：“我们对于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造这两件事，决不可以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去看，决不可以只强调一方面，减弱另一方面。”（《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第23—24页）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面向农业，为农业的技术改革和发展农业生产服务，正是实现“使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发生密切的内部联系”这一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要求的关键所在，正是使农业现代化和工业现代化连结起来的纽带、桥梁。

为了说明问题的方便，我们打算分别就农业的现代化和工业的现代化这两个方面，来看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与它们之间的关系。

先说农业现代化。目前，我国农村已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为发展农业生产和进一步开展农业的技术改革、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提供了优越的社会条件。但是当前我国农业生产还是处在以手工操作为主、以畜力耕作为主、以使用自然肥料为主的落后的生产技术的状况之下。这种状况同我国已经建立起来的相当大的工业基础是不相适应的；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的要求是不相适应的。这就是矛盾。如果让这种矛盾长期存在下去，当然极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此其一。其二，农业合作化的实现，在我国农村建立了新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这是我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一大胜利。但是，这种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如果缺乏强大的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那就难以获得巩固和发展；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建立的工农联盟，如果缺乏强大的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也就难以获得巩固和发展。这是因为，如果不在加强对农民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同时，从根本上去改变农民使用落后的生产工具进行生产劳动的物质条件，就难以进一步地、彻底地改造农民在小农经济时代带来的旧思想旧习惯，难以牢固地树立起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从而坚定不移地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党在完成了反封建的土地制度的改革以后，为我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所制定的第一步实现农业的集体化、第二步实现农业的现代化的这一根本路线，正是从根本上改造我国农业，并使工农联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巩固和发展的唯一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这就是说，积极地实行农业的技术改革、逐步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既是促进人民公社集体经济进一步巩固、农业生产进一步发展的物质基础，又是进一步加强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的物质基础，显而易见，加速农业的技术改革、逐步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是当前发展国民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如何使农业部门获得新的、大量的现代化的技术装备，把农业部门转到现代化大生产的物质技术基础上来？这就是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所指出的，必须把工业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重工业以农业为重要市场，面向农业、为农业的技术改革服务，为巩固农业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为发展农业生产服务。

由于能够为农业提供各种农业机械、化肥、农药、燃料、电力、运输工具和建筑材

料等现代技术装备和物资的主要是重工业。因此，作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个最重要的部门的重工业，要以拥有五亿多人口的我国农村为重要市场，要积极地为农业生产和农业技术改革服务，不断地为农业提供日益增多的现代技术装备和其它生产资料，使农业逐步实现现代化，使农业和工业在先进的物质技术基础上密切地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使农业生产不断发展，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从而才可能愈来愈多地为工业提供商品粮食、工业原料和劳动力等等，从而反过来促进工业在现代物质技术基础上迅速发展。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通通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改观。”（《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第33页）

其次，再从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面来看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问题的重大意义。大家知道，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以国内市场不断扩大为前提。物质资料再生产过程，是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流通过程是再生产过程的一个阶段，是生产过程的延长，流通过程虽决定于生产过程，但它又反过来制约生产过程，只有依次完成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再生产才能继续进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果工业产品得不到广阔的市场，它就不能顺利地进行扩大再生产，社会主义工业化就会难于实现。这一原理无论对于轻工业或者对于重工业都是适用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办法：一种是脱离农业这一基础，孤立地为重工业而发展重工业，其产品主要是用以装备重工业本身；另一种则是遵循着“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一规律的要求，重工业面向农业，为农业的技术改革、为农业的现代化服务，其产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究竟哪种办法最有利于重工业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呢？最有利于重工业产品的实现呢？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经验来看，不是前者，而是后者。从短期的表面现象看，似乎采用第一种办法，也可以使重工业本身的发展赢得较快的速度，因为重工业越是发展，它本身所需要补偿和追加的技术装备就越大，也就越能依靠重工业内部的产品相互交换来解决产品的实现问题。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为了奠定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的物质基础，重工业产品主要是用以装备它自身，这是必要的，因为要以现代的技术装备来改造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就必须有一定的物质技术基础，但是决不能由此引申下去，得出结论说：重工业可以不依靠农业，可以脱离农业这一基础而单独发展。重工业脱离农业这一基础而单独发展，从长期看、从社会再生产的整体来看是不可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产品实现论，揭示了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之间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内在联系，揭示了生产的消费归根到底要依赖于生活的消费。马克思说：“在不变资本与不变资本之间产生了一种不断的流通，这种流通从来不进入个人消费的领域，就这个意义而言，它是不以个人消费为转移的，但是归根到底它还是受个人消费的限制，因为不变资本的生产并不是为了本身的需要而进行的，这仅仅是由于生产个人消费品的部门需要更多的不变资本”。列宁把这个思想概括为“生产消费（生产资料的消费）归根到底是同个人消费相联系着，总是以个人消费为转移的。”（《列宁全集》第4卷，第44

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也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原理。这就是说,重工业离开农业而孤立地获得发展,这是不可能的。

在我国这样一个大国里,农业生产所需要的拖拉机不是几万台、几十万台,而是上百万台以至几百万台;农业生产所需要的汽车,不是几万辆、几十万辆,而是上百万辆以至几百万辆;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化学肥料,每年也不是几十万吨、几百万吨,而是上千万吨以至几千万吨;农业生产所需要的石油,每年也不是几十万吨,几百万吨,而是上千万吨。数量如此巨大的生产资料,显然无法依靠进口的办法来解决的。这就是必须依靠自力更生,依靠发展本国的重工业加以解决。重工业面向农业,以农业为重要市场,通过支援农业技术改革,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来发展重工业,逐步实现工业现代化,就会使自己得到了一个极其广阔的国内市场。这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建立一个完整的、独立的、现代化的工业体系的康庄大道。毛泽东同志指出:“如果我们的农业能够有更大的发展,使轻工业相应地有更多的发展,这对于整个国民经济会有好处。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37页)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前三年,由于工业建设大跃进,我国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工业基础,特别是近两年,由于贯彻执行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以加强农业为主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以后,工业同农业之间和工业内部的比例关系更加协调了,工业为农业服务的能力进一步加强了。现在,我国已经建立了一批直接为农业服务的现代化大工业,包括拖拉机工业、汽车工业、化学工业、农药工业、建筑材料工业、电力和燃料工业等等,为实现农业现代化奠定了初步基础;并且,我们还建立了一批直接为当前农业生产和农业技术改革服务的小型工业;整个工业部门提供给农业和农村市场的产品有很大增加。尽管如此,我们国家的重工业,现在能够为农业提供的现代化的生产工具和其它的生产资料,还远远不能满足农业技术改革和农业现代化的要求。因而,进一步贯彻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的方针,面向农业,为农业的技术改革服务,仍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迫切的任务。

我们强调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强调不能“为重工业而重工业”,当然不是说重工业就不须要为轻工业和其它物质生产部门服务了;当然,也不是说重工业可以不必注意本身的建设,不必注意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了。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是一个统一整体。农业生产部门要力求发展,轻工业和其它物质生产部门也要力求发展;只有这样,才有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的按比例而又是高速度的发展。在遵循着“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这一前提下,强调重工业本身的建设,同片面性地强调“为重工业而重工业”,是有区别的:前者,强调重工业本身的建设,是为了更好地为农业的技术改革、为农业的现代化服务,因为要为农业提供大量的新的现代化的技术装备,必须以重工业本身的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为前提,这样一来,就必须加强重工业本身的建

設，这是理所当然的；后者的片面性，在于它脱离农业这一基础而孤立地強調“为重工业而重工业”，其后果必然不利于重工业产品的实现，不利于社会主义再生产的持續发展，从而不利于整个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的发展。

我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設的經驗是丰富的。这些經驗已經說明和將繼續說明：重工业以农业为重要市场，不仅可以更好地發揮农业的基础作用，而且可以更好地發揮工业的主导作用。所以，我們說，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是党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經济的总方針的一个重要方面。坚决地、認真地貫徹“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这一方針，必将大大促进农业现代化和工业现代化的进程，大大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經济建設的发展，大大促进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方孝岳作关于中国古代語言学研究方法的学术报告

最近，中山大学方孝岳教授应广东語言文学学会筹委会的邀請，作了题为《关于中国古代語言学研究方法》的学术报告。

方孝岳教授以丰富的材料，詳細論述了中国古代語言学性质和古代語言学家的研究方法問題，并闡述了今天語言学的研究方法問題。他說，我国古代有关語言方面的学术和欧洲早期所謂“語文学”，情形并不是一样的。西欧早期“語文学”服从于某种原始經典的語言定型而认为永远不能超过。在我国，“小学”很早就是独立的一門學問。小学家搞語言文字是为着語言文字在当时的使用需要，而不是什么“为着解释古书”，而且向来能注意历史的流变。所以，中国語言学在发展过程中往往能表现出某些时代性的特点。

在談到古代語言学家方法論时，他列举了汉代許慎、隋朝陆法言、清代戴震三大語言学家的研究方法，說明有些卓越的古代語言学家的方法能够反映出一定的客观需要，和当时某些反历史的潮流是不調和的，都有重要的方法論的意义。他說，汉代許慎發揮文字产生的条例，反对当时“讖諱家”許多荒謬的說法，隋朝陆法言等人为着消除南北朝以来南北方音成见而从事于全面审音的工作；清朝戴震提出通語和方言的綜合研究方法以考察一些語音演变軌道，反对当时某些古音学家的“崇古”观点，这些方法都值得重視，都促进了中国語言学不断前进。但是，他們都有自己的局限性，例如許慎拘守六书的旧說，而不能在他自己所已經吐露的資料中，明白提出六书以外的文字簡化条例；陆法言仍不免迁就一般人好簡惡繁的習慣，不能严格做到一个韵母一个韵部，使描写更加清楚；戴震讲古今流变只讲到隋唐，而忽略近代，好象认为隋唐的音就可以包罗上下古今的音，这和历史现实都不相符合。而有些近人在語言学的研究上，由于看不清楚，就重犯了类似的缺点。所以，我們对待以往語言学家的研究方法，要做具体的科学分析，取其长弃其短，不能籠統地加以全部接受，否則就会走錯方向。

方孝岳說，我們批判地运用上述这些方法，对今天語言学的研究可以起应有的作用。但是整个說来，从今天語言学的要求来看，联系人民的历史来研究語言，是我們應該努力的方向，过去这方面是做得不够的。他強調說，我們今天除正确接受前人成績之外，應該重視研究方言，各地方的方言是和各地方人民的历史关系最为密切的东西，只有深入了解方言才能更好地理解整个汉語发展规律，促进民族共同語的形成。整个汉語史要建立在全面的方言史的基础上。这是我們在語言的研究方法上的一个重要发展。（振）

論农业生产合理布局問題

吳文輝

农业生产布局就是农业生产的地区分布，包括农业生产在地区上的分工和地区内部农业各部門的綜合发展。

农业生产在地区上的明确分工，是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的結果。在前资本主义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低，社会分工不发达，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因此，只是出现了农业生产地区分工的一些雛型。到了资本主义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加深了，商品經濟有了很大发展，因此国民經济各部門的生产专门化相继出现，正如列宁所說：“这种专业化过程也出现在农业中，建立了农业的日益专业化的区域（和农业經济体系），不仅引起农业品和工业品之間的交換，而且也引起各种农产品之間的交換。这种商品性的（和資本主义的）农业的专业化，出现在所有的資本主义国家中”。^①在資本主义条件下，各个地区逐步形成了不同的农业专门化生产区，出现了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地区分工。但是，由于資本家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追求最高利潤，資本主义的生产是竞争和无政府状态的，所以資本主义农业生产布局是自发的、盲目的。当某种产品在市场上特别有利可图时，农业資本家就大量地甚至专门地生产这种产品，实行狭窄的、片面的专门化生产。資本主义生产的自发性、盲目性和片面性，决定了包括农业布局在内的社会生产分布的不平衡性，表现在农业与工业地区分布的脱节，生产区与消費区的脱节，各个地区内部农业的发展也很不平衡，农业各部門之間缺乏有机的結合和恰当的比例关系。資本主义农业布局的不合理，就带来了大量农产品的不合理运输，土地资源的被掠夺和破坏，社会劳动的极大浪费。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資料是公有的，社会主义基本經濟規律和国民經济有計劃按比例发展規律发生着作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滿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为了貫徹执行党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經济总方針，和貫徹执行以粮为綱，全面发展多种經營的方針，以便有計劃按比例地发展农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經济，就必须在全国各地区有計劃地、均衡地布局农业，使全国农业生产既有地区上的分工，而每个地区内部又是实行农业的全面的綜合发展。所以，农业生产的合理布局是社会主义經濟发展的客观要求。社会主义农业布局的基本特点，是有計劃的，平衡

^① 《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下同），第18頁。

的，专门化与综合发展相结合的。

社会主义农业生产的合理布局，具有重大的国民经济意义：第一、合理的农业布局可以保证因地制宜地开发、利用全国各地的自然条件和经济资源，使这些条件和资源利用得更加充分和更加有效，从而有利于迅速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总产量和农业劳动生产率，以尽可能少的劳动（活劳动和物化劳动）消耗，取得尽可能多的农产品，这正是多快好省地发展农业生产的要求。第二、合理的农业布局，有利于贯彻执行商品性生产与自给性生产同时并举的方针，可以提高农产品的商品率，以满足国民经济各部门的需要，更好地发挥农业在发展国民经济中的基础作用。第三、合理的农业布局，可以使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在地区上得到正确配合，使生产区与消费区得到密切配合，避免农产品不必要的过远的运输，节约社会劳动。第四、合理的农业布局，有利于更快地提高落后地区的农业生产水平，使其逐步赶上先进地区的水平，并使先进地区更加先进，从而使全国各地农业经济得到普遍的高涨。第五、在全国范围内合理地布局农业，有利于各地区确定农业长远发展的方向和规模，主导部门与辅助部门的合理比例等等，从而有利于党和政府因地制宜地组织和领导农业生产和建设，以及农业发展计划（特别是长期计划）的制订和贯彻执行，这对于农、林、牧、副、渔的全面发展和整个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都具有积极的意义。第六、合理的农业布局，对于巩固国防，促进国内各民族经济的发展，加强各民族的团结，也具有重要意义。

由此可见，合理地进行农业生产布局，是社会主义农业建设和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二

农业布局是整个社会生产力布局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社会主义农业布局应该遵守社会主义生产力布局的一般原则。列宁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就确定了生产力布局的一般原则，归纳起来就是：（一）工业要接近原料产地，使工农业生产接近消费区；（二）在各个经济区之间实行合理的地区分工，同时在每个经济区内部实行经济的综合发展；（三）在全国各地，有计划地均衡地布局工业，在以前经济落后的农业地区建立起新的工业中心，在新的工业基地重新布局农业，使工业和农业互相接近，协调地发展；（四）发展落后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五）增强国防力量，巩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独立性。

由于农业生产有其自身的特点，生产力布局规律在农业部门中有其特殊表现形式。因此，在进行农业布局时，应当以社会主义生产力布局的一般原则为依据，并结合农业部门的特点。我以为，农业合理布局包括下述的几项基本原则：

一、农业生产布局应以保证农业生产最大限度地满足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为根本出发点。这是社会主义农业生产布局的首要原则。

国民经济对农产品的需要是多方面的，有工业、城市人口、出口和储备等需要，还

有农业生产本身和农村人口对农产品的需要。国民经济对各种农产品的需要量是不同的，而且是不断变化的。合理的农业布局，不仅要使各地区的农业生产能够满足各方面的需要，保证生产量和需要量相适应，而且要尽可能使生产区与需要区相接近，以避免不合理的运输。

对农产品的需要，有全国性的需要和地方性的需要。在进行农业生产布局时，对全国性需要的农产品，必须在全国范围内作合理的安排，而各地区应该有全局观念，首先承担满足全国性需要的任务。同时，又要看到农产品中有相当大的部分是要满足本地区的需要的。因此，必须统筹兼顾全国性需要和地方性需要，实行商品性生产与自给性生产同时并举。

二、农业生产布局要保证工农业生产在地区上的密切结合。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辩证统一关系，因此，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在地区分布上必须密切结合，农业生产布局和工业生产布局都应该有利于这种结合，而不应该孤立地进行本部门的布局。

在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过程中，新的工业基地不断形成，这就要求农业生产与之相适应。对农业进行合理布局，以便供应工业基地以所需要的粮食、蔬菜、畜产品等等。但是，也不能由此认为：农业生产布局只能被动地适应于工业布局，而不能主动地影响工业布局。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和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重工业，就应该根据农业生产布局来进行合理布局。

三、农业生产布局应实行专门化与综合发展相结合。

农业生产具有明显的地区性。在农业的布局上，应该在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指导下，充分考虑各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最适宜于发展哪些农业部门和作物。实行地区专门化生产，尽可能把这些农业部门或作物配置在最适宜的地区，以使用最少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收到最大的经济效果。同时，为了迅速地扩大农产品的商品生产，也有必要建立专门化生产基地，如商品粮食生产基地、商品棉花生产基地等等，以保证国家对这些农产品的需要。此外，实行地区专门化生产，也有利于农民群众充分掌握本地区农作物的生长发育规律，更有效地利用当地农业生产资源，更快地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但是，农业生产专门化和工业生产专门化是不相同的。列宁指出：

“由于农业本身的性质，农业向商品生产的转变是以特殊方式进行的，……。加工工业分为各个完全独立的部门，每一部门专门生产一种产品或一种产品的一部分。而农业性工业则不分为各个完全独立的部门，它只是在一种场合下专门生产一种市场产品，而在另一种场合下又专门生产另一种市场产品；而且农业的其他方面都要适应于这种主要的（即市场的）产品。”^①因此，农业生产的专门化，不能是片面的专门化，而必须是把专门化与综合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社会主义农业布局的一个重要原则。

^① 《列宁全集》第3卷，第275页。

每个地区内部之所以必须实行农业的综合发展，首先是因为各个地区除了发展具有地区分工意义的商品性生产部门以满足全国性的需要之外，还要尽可能搞自给性生产以满足本地区的各种需要（如粮食、副食品、种子、饲料等等），以消灭不合理的农产品运输。其次，因为综合经营可以充分地合理地利用各种土地资源，根据土地的不同情况，因地制宜地栽培作物，采用合理的作物轮作制，从而保证不断地恢复和提高土壤肥力。再次，马克思把劳动时间与生产时间的不一致，看成是农业与农村副业相结合的自然基础。他写道：“生产时间与劳动时间的差别，在农业上面，是最为一目了然。”“我们在这里看见了，生产时间与劳动时间的差别（后者仅仅是前者的一部分），怎样成为农业与农村副业相结合的自然基础”^①。由于农业劳动时间不如生产时间长，所以农业有很大的季节性。如果实行单一经营（比如只种粮食），就会使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使用忙闲不均，造成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把专门化生产与综合经营密切结合起来，就能在一年之中，使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得到充分的和均衡的利用，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收入，增加积累和社员收入，从而有利于调动社员的集体生产的积极性，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农村人民公社。最后，因为，农业各部门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内在联系，实行综合经营就可以使农业各部门不断共同发展；例如种植业的发展为畜牧业提供量多质优的饲料，从而促进畜牧业的发展；而畜牧业的发展又为农业提供大量有机质肥料和耕畜动力，从而进一步促进种植业的发展。

由于各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不同，各地区农业专门化与综合发展相结合的类型也是不同的。从全国来说，可以大体划分为农业区、牧区、半农半牧区等类型，在农业区还可以再划分为粮产区、棉产区、油料产区、烤烟产区、甘蔗产区等等。在各个地区，既要有一个或几个专门化的主导部门，又要有与主导部门有机地结合起来的若干个辅助部门。主导部门与辅助部门互相促进，使整个农业生产多快好省地发展。

四、农业生产布局要充分而又有效地利用各地区的自然条件。

农业生产离不开自然条件。马克思指出：“经济的再生产过程，无论其特殊的社会性质如何，总会在这个范围（农业）内，与自然的再生产过程交错着。”^②他还指出自然条件对农业劳动生产率具有重要影响，他说：“农业劳动的生产率是与自然条件分不开的，并且适合于劳动的生产率，同量劳动会表现为多量的或少量的生产物或使用价值。”^③自然条件如气候、地形、土壤、森林、植被以及其他自然因素，对农业生产有着重要的影响。在进行农业生产布局时，必须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充分地考虑如何有效地利用各地的自然条件，使农业生产的部署，与当地自然条件相适应，以使用最少的劳动耗费，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

当然，也不能片面地夸大自然条件的作用，把它说成是农业生产布局的唯一因素。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下同），第283、285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第439页。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1069页。

因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人类改造自然、控制自然的能力是会逐步增强的，从而可以逐步摆脱自然条件对生产的不利影响。但是，尽管生产力水平已经大大提高了，我们进行农业布局时还是应该充分考虑如何充分而又有效地利用各地区的自然条件。

五、农业生产布局要充分考虑各地区的农业生产水平和其他社会经济条件。

农业生产水平，对于农业布局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因此进行农业布局时，必须考虑到各地的生产力状况。在进行长期性的农业布局时还必须估计到将来生产力的发展，如农业现代化（特别是机械化和电气化）的发展。随着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我们有可能按照一定的目的，改变外界环境条件和动植物的习性，从而就有必要和可能对农业生产布局作适当的调整，建立新的更合理的布局，例如原来不宜于发展农业的地区也可发展农业了，原来的农业地区内的分工可以得到进一步发展。

其次，农业布局还必须考虑到各地区的劳动力资源状况，应该使全国各地区的劳动力资源得到充分而合理的利用。这又要估计到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对劳动力要求的变化，例如机械化水平提高了，劳动力的需要就减少了。

再次，进行合理的农业布局，也要考虑各地农民的生产经验。例如某一地区的农民对某种作物有悠久的种植习惯，具有丰富的经验，那么在该地区配置该种作物就更有利于生产的发展。

最后，运输问题对农业布局具有重大影响，在进行农业布局时，必须注意交通运输的现状和它的发展前景。考虑农产品运输问题，目的在于消灭过远的和不必要的运输以减少运输费用，节约社会劳动。随着交通运输的发展，农业布局也必然会有新的变化，例如原来以自给自足为主的地区也可变成农产品的商品基地了。

社会主义农业生产布局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不能孤立地从一个因素出发考虑，而必须综合考虑许多因素，既要研究各种自然经济条件，又要研究国家、集体和个人需要，既要妥善解决工业与农业之间的关系问题，又要正确处理国家与地方之间、各地区之间以及地区内部主导部门与辅助部门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些问题实质上包括了工人阶级与农民之间、不同地区农民之间的关系问题。正确处理上述各种问题，才能实现农业生产的合理布局。

三

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农业生产的主体是小农经济，它基本上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经济。但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商品经济也有相当的发展，在一些地区开始形成了商品性的农业专门化生产区。旧中国的农业布局，除了具有资本主义农业布局的一般特点外，还具有极其明显的半殖民地的特点，主要表现在：

第一，旧中国农业专门化区的形成和发展，具有严重的不稳定性。某些作物专门化产区的形成、发展和萎缩，完全决定于帝国主义的利益和需要。例如抗日战争前，长江以北

棉花生产曾一度发展，这与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开设了許多棉紡織厂，以及日本国内对棉花的需要有密切关系。而从抗战胜利到1949年，我国棉花生产下降了50%左右，这主要是由于美帝国主义大量向中国傾銷美棉，严重地打击了我国棉花生产。

第二，旧中国工业与农业的布局是严重脱节的。旧中国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輕工业的布局，同原料产区和消費区是脱节的，例如华北平原和关中平原，是我国主要棉产区，但这些地区很少棉紡織厂，80%以上棉紡織厂都集中在沿海地区，如上海、南通、无錫等地。这就造成了不合理的远距离运输。工农业布局脱节的根本原因在于：帝国主义势力在沿海一带較强，因此，外資工业也集中在此；而本国民族工业又多是依附于帝国主义的，所以民族工业也同样集中在东南沿海。

第三，旧中国各地区农业生产和布局是不平衡的。东南沿海地区农业生产水平較高，出现了一些集約化的农业經營，西北西南的广大地区农业生产非常落后，农业的自給性质还十分显著，地区分工很不发达，这是与工农业布局脱节密切相关的。

旧中国农业生产布局的这些半殖民地特点，造成了我国社会劳动的极大浪费，严重地阻碍着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

全国解放以后，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建立了社会主义經濟制度，这就为农业生产合理布局創造了根本前提。同时，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极端不合理的农业布局，在社会主义建設的进程中，日益显出其与国民經济高速度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因此，党和政府根据客观經濟规律的要求，按照社会主义生产布局的原则，对旧中国的农业布局逐步进行改造。随着国民經济的有計劃发展，社会主义工业的不断发展，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的胜利以及农业生产力的提高，我国农业生产布局正在日趋合理和进步中，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粮食生产布局的日益合理。解放以后，由于普遍貫徹执行了党所制定的以粮为綱，优先发展粮食生产的方針，粮食播种面积增加了，单位面积产量提高了，粮食总产量增加了，这就使原来的余粮区逐步形成为較稳定和巩固的商品粮食产区；使一些粮食自給地区变成了商品粮食产区；使原来的缺粮区，大大提高了自給程度，甚至完全自給有余；同时，随着新工业区的建設，还建立了許多新的粮食生产基地。粮食生产布局的这些日益合理的变化，逐步改变了解放前粮食生产布局很不合理，粮食产銷地区脱节的现象，保证了国家和本地区对粮食的需要，减少了运输費用，节约了社会劳动。同时，由于粮食是整个农业生产的基础，粮食生产布局合理了，粮食生产水平提高了，就为农业专门化区的发展和区内农业的綜合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許多經濟作物专门化生产区的形成和扩大，农业生产的地区分工加强了。解放以来，全国有計劃地形成了和扩大了許多經濟作物的专门化产区。例如，扩大了許多棉花产区：黄河流域中、下游现已成为我国主要棉产区，占全国棉花播种面积50%以上；长江流域中、下游已成为重要的棉产区，占全国棉花播种面积30%以上；此外，还开辟了新棉产区，如新疆便是一个很有发展前途的新的棉产区。其他經濟作物的专门化产

区也先后形成和发展了，例如河南、山东、云南、贵州的烤烟产区，黑龙江、吉林的甜菜产区，长江和珠江三角洲以及四川盆地的蚕桑产区，华南的亚热带和热带作物产区等等。

三、工农业的地区布局日趋合理。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接近了原料基地，如在华北和关中平原棉产区建立了许多现代化的棉纺织厂；在甘蔗、甜菜产区如广东、黑龙江等省建立了许多现代化的制糖厂；在牧区（如内蒙和西北地区）建立了乳制品、肉类和毛皮等畜产品加工厂等等。另一方面，随着工矿基地和城市的扩大与建立，在这些基地和城市的周围建立了和扩大了农业生产基地。

城市郊区农业的建立和扩大，是工农业布局正确结合的重要标志之一。大城市郊区农业，有近郊区和远郊区之分，近郊区一般是以生产蔬菜为主，同时生产瓜果、鲜奶、蛋品等等副食品；远郊区则大体上以生产粮食为主或粮菜并举，并生产比较不易腐烂的副食品如肉类、鸡、鸭、鹅、果品等等。近几年来我国郊区农业有了很大发展，不少城市已作到了蔬菜等副食品完全自给或基本自给，有些城市还有了储备并能支援外地。

四、各地区内部农业综合发展的日益加强。根据党的“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多种经营”的农业生产方针，全国各地都日益注意本地区农业的全面的综合发展，这可以从全国农副业产值的结构变化中看出来。在全国农副业总产值中，植物栽培业产值的比重已由1949年的67.8%下降到1957年的62.2%；在植物栽培业中，粮食作物的比重由1949年的47%下降到1957年的40.1%，而经济作物的比重则由1949年的7.5%上升到1957年的10.8%。这些数字表明：棉花、油料等经济作物、畜牧业、水产业、林业和其他副业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

在发展多种经营中，山区占着特别重要的地位。发展和建设山区，对于我国农业生产平衡的和综合的发展，对于迅速提高农业商品率等都有重大关系。解放以来，由于党和政府的重视，山区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山区的农、林、牧、矿、土特产得到了密切结合和全面发展，增加了农民收入，支援了工业建设和出口需要，出口的农产品中有50%是来自山区半山区的。

总之，解放以来，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不合理的农业生产布局的面貌已经有很大的改变，新的合理的农业生产布局正在形成中。

实现农业合理布局的过程，是一个逐步改造旧的布局，实行新的布局的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过程，是一个随着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过程，这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工作。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极端不合理的农业生产布局，不可能在短期内彻底改变。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不断发达，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不断巩固和发展，粮食问题的逐步解决以及农业机械化和电气化的逐步实现，我国农业生产布局必将愈趋合理，也就是说，农业与工业在地区上的结合将更加密切和完善，农业生产的地区分工的范围将更加广阔，地区的农业专门化程度将更加发展，各专门化生产区内部的农业综合发展也将更为加强。这样，就将更加有利于社会主义农业因地制宜地和高速度按比例地发展，从而更充分地发挥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作用。

批判地对待优秀的文学遗产

黄达文

我們伟大的祖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我們勤劳智慧的祖先創造了极其光辉灿烂的文化。在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并創造出本阶级的文学以前，在漫长的岁月里，我国古典文学出现了許多伟大的作家和优秀的作品。无论是詩詞歌賦、小說戏剧，还是文学理論，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丰富着我国文学遗产的宝库。《詩經》以后的汉魏乐府、南北朝民歌、宋元話本、明清話本戏曲等民間优秀創作；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辛弃疾、陆游等的詩詞；先秦諸子和唐宋諸家的散文；施耐庵、罗貫中、吳承恩、蒲松龄、吳敬梓、曹雪芹等的小说；关汉卿、王实甫、湯显祖等的戏曲；王充、刘勰等的文学理論；这一系列光彩夺目的作品，以不同的形式、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我国人民的生活和斗争，表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精神，給我們留下了丰富而珍贵的遗产。

对待我国这样丰富的文学遗产，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呢？各种各样的虚无主义者采取了一概排斥的全盘否定的态度；而各种各样的“国粹主义”者，则采取了頂礼膜拜的全盘肯定的态度。这两种态度都是錯誤的。不論是虚无主义者还是“国粹主义”者，他們对待我国文学遗产的态度，都是割断历史的反历史主义的态度，只不过是有人从这一头割断历史，有人則从那一头割断历史，归根到底則是“殊途同归”。无产阶级在对待文学遗产的問題上，既反对虚无主义的态度，又反对“国粹主义”的态度，而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主义态度，也就是坚持批判地继承的态度。

列宁在談到无产阶级必須对已往的文化进行改造时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資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所創造出来的全部知識发展的必然結果。”^①毛泽东同志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具体地为研究和继承我国文学遗产指出了正确的道路。毛泽东同志指出：“我們必須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們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創造作品时候的借鉴。”^②根据这个批判地继承的原则，毛泽东同志还为我们指出了

① 《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54頁。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下同），第862頁。

对文学遗产进行批判地继承的基本要求，是要“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而“……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①并且，明确地指出评价文学遗产中精华和糟粕的标准，他说：“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的态度。”^②从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指示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我们所要继承的不是一般的文学遗产，而是“一切优秀的文学遗产”；我们所要吸收的，不是一般有益的东西，而是“可以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的东西。为了给文学遗产作出历史评价，判断其为糟粕还是精华，我们必须根据作品产生的时代历史条件，具体分析作品的思想倾向，“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也就是说，要“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准则，来衡量作品的历史价值，这是我们批判地总结文学遗产必须进行的工作。但是这还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因为我们不是为批判而批判，为继承而继承。我们的目的不仅仅是要认识文学遗产，认识它是为了吸收其中有益的部分，使文学遗产的研究工作能为当前的社会主义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③因此，对于一切优秀的文学遗产，我们必须按照无产阶级的利益，考察它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于人民所起的作用和可能起的作用，而决定我们吸取什么，剔除什么。

我国古典文学研究工作，由于坚决地遵循批判地继承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道路，已经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是，还不能说在对待文学遗产的态度问题上，在某些研究者中已经不再存在什么问题了。从我们接触到的一些情况看来，关于如何对待文学遗产的态度问题，还是存在着不同的看法的。当然，对于古典文学中的具体作品和具体问题出现不同的看法是很自然的，这可以通过学术问题的自由讨论加以解决。即使暂时还有分歧，也可以不必急于求得一致的结论。但是，关于对待文学遗产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态度的问题，却不能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道路，因为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会使我们的文学遗产研究工作有迷失方向的危险。

有些古典文学研究者虽然接受了关于文学遗产的批判地继承的原则，但又把批判与继承割裂开来，认为批判只适用于文学遗产中的糟粕部分，而不赞成对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进行批判，更不赞成按照无产阶级的利益来对优秀的古典作品进行批判。他们认为这样做，就是以今天的思想水平苛求古人，与历史主义相矛盾。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因为它实质上离开了古典文学研究的出发点和目的性，离开了古典文学研究要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要求。

无产阶级应否按照自己的阶级利益和观点去重新估价过去时代的文学遗产呢？

我们知道，一切文学都是一定的社会历史的产物，一定的时代生活的反映，历史上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1页。

②③ 分别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71、857页。

即使是最伟大的作家的作品，也不可能不具有时代的局限；何况，在阶级社会中产生的一切文学都不可避免地被打上阶级的烙印，即使是历史上最伟大作家的作品，也不可能不具有阶级的局限。因此，评价一切文学作品，自然就不能离开历史条件和阶级观点。同时，文学既然是为一定的阶级政治服务的工具，不同时代的不同阶级也就必然要按照自己阶级的利益和观点去看待过去的文学遗产，并且从文学遗产中吸取符合自己阶级利益的成分来创造为本阶级政治服务的文学，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现象。不过，历史上的一切剥削阶级，由于他们和人民的对立，为狭隘的阶级利益所蒙蔽，他们总是不能科学地评价过去的文学遗产，总是不能充分认识文学遗产中最美好的东西。新兴的地主阶级在反对奴隶主阶级的时候，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统治的束缚的时候，这些阶级的某些代表人物，可能从他们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出发，在某些方面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表现了他们的进步性，但他们却不能不受着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这种局限自然也反映在他们对文学遗产的评价方面。

打开文学史，我们就可以看到，历史上不同时代的不同阶级，总是根据自己的阶级利益，自己阶级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估价过去的文学遗产，按照自己阶级的利益决定从文学遗产中继承什么，反对什么。中国文学史中就有许多这样的例子。

在汉代，对于《离骚》这样伟大的作品的思想内容，就有着距离很远的评价。政治上具有进步观点又对汉王朝统治者有所不满的司马迁，给予《离骚》很高评价，他说：“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①然而，坚决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班固，只是称赞《离骚》“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对于它的内容，却认为：“今若屈原，露才扬己……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②王逸又在《楚辞章句序》中反对班固，他的见解，固然有比班固高明之处，但是他又把屈原的疾恶如仇的精神纳入儒家“温柔敦厚”的框框，把《离骚》说成是“依托五经以立义焉”的著作，其出发点实际上是和班固一致的。班固的看法，大体上代表了汉代统治阶级正统辞赋家的看法，这些“名儒博达”之士，自称祖式屈原，却阉割了屈原作品中爱国爱民的思想内容，拟其仪表，窃其华藻，制造了大量“劝百而讽一”的形式主义的文章。

又如《水浒传》这部描写农民革命战争的伟大著作，明、清反动统治阶级畏之如洪水猛兽，他们下令毁板禁阅，禁不了，又有地主阶级文人金圣叹加以删改，妄想以一场噩梦全擒梁山泊的英雄好汉。随后有御用文人俞万春作《荡寇志》，这部反动作品虽然承袭了《水浒传》的某些技巧，而在思想内容上却表达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愿望，把敢于起义反抗的农民英雄杀尽灭光。在清代为了适应统治阶级需要而大量出现的侠义小说如《三侠五义》，正象鲁迅所说的：“似较有《水滸》余韵，然亦仅其外貌，而非精神。”明、清统治阶级就是这样以他们的反动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对待《水浒传》的。当然，

①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② 班固：《离骚序》。

优秀的文学遗产作为客观的存在，其历史价值和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是任何人也歪曲不了、抵制不了的。相反地，《水滸》几百年来一直在人民中間流传不絕，《水滸》的传统也得到继承和发展。从《說唐》、《杨家将》、《說岳全传》这些比較好的小說，从《宝剑記》、《林冲夜奔》、《打漁杀家》这些戏曲中，都可以看出《水滸》在思想上和艺术上明显的影响。从解放后整理出版的扬州評話《武松》中，我們还可以看到民間艺人如何继承《水滸》的传统，进行不断的加工創造，丰富和发展了武松的英雄形象。

无产階級必須按照自己的階級利益和观点来对待文学遗产，也只有站在无产階級的立场上，才能对文学遗产作出真正科学的評价。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階級状况》一书中說得好：“资产者是现存的社会制度以及和这个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各种偏见的奴隶；他胆怯地避开和千方百计地排斥真正标志着进步的一切；无产者却眼睛雪亮地正視这一切，高高兴兴地而且有成效地研究它們。”^①这是因为无产階級与任何剝削階級有着本質的不同，无产階級的利益和历史进程是相一致的，无产階級的世界观辯証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認識真理的最犀利的武器。

历史唯物主义告訴我們：既然一切文学都是一定的社会历史的产物，一定的时代生活的反映，因此，評价文学遗产的历史地位，必須历史主义地把作品放在它所产生的历史条件下，考察作品对于当时的社会生活、經濟基础所起的作用，是促进社会历史的发展还是阻碍社会历史的发展。历史唯物主义还告訴我們：历史社会是发展的，那么，时代前进了，历史条件变化了，作品的社会价值也随着起变化。因此，我們研究不同时代的作品在不同时代的社会价值，也必須把作品放在变化了的历史条件下，考察作品对于新的社会生活、新的經濟基础所起的作用，是促进其发展还是阻碍其发展。既要看到文学遗产在特定的时代所起的作用，又要看到它在不同的时代的不同作用，这才是完整的科学的历史主义观点。如果把历史主义仅仅理解为評价文学遗产在它的产生时代的历史地位，而不考察这些文学遗产在新的社会新的时代的地位，那显然是片面的。

无产階級必須按照自己階級利益和观点检查过去一切文学遗产，这一点所以尤其重要，还因为文学遗产对于我們不仅有着时代的差别，而且有着階級的差别。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說道：

“……社会上的这一部分人对于另一部分人的剝削却是过去一切时代所共有的事实。所以，毫不奇怪的，各个时代的社会意識，不管它表现得怎样紛繁和怎样歧异，总是在某些共同形态下，即在那些只有当階級对立彻底消逝时才会完全消逝的意識形态下演进的。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过去遗传下来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所以，毫不奇怪的，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过去遗传下来的种种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②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版，第528頁。

②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1954年莫斯科中文版，第28頁。

不可能設想，产生在階級对立社会中的非无产階級文学作品（不論它在历史上曾經起过多少进步的、积极的作用），还可能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起着与过去同样的作用。事实上，不少在它的产生时代曾經起过一定积极作用的优秀作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它的积极作用减弱了或者消失了，甚至有些作品所包含的思想内容在过去是进步的，而在今天却成为反动的东西。

例如阮籍、嵇康的佯狂放蕩，陶渊明的隱逸，賈宝玉的出家，作为反抗当时黑暗势力的一种不得已的方式，是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但对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人们来说，消极遁世、明哲保身的思想，却是一种只有消极作用的落后思想。《三国演义》揭露了統治階級内部爭权夺利的丑态和所造成人民的苦难，塑造了一些符合人民理想的英雄人物，今天还有其一定的教育和鼓舞作用，仍为許多讀者所喜爱。但是我們不能不注意到，小說中表现的忠君思想和敌視农民起义的态度，宿命論和英雄造时势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即使在作品产生的时代，也是属于封建性的糟粕。至于小說极力頌扬的“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的刘、关、张之間的义气，是符合封建社会中人民对于朋友关系上同生死、共禍福，肝胆相照，亲如手足的道德理想的。然而刘、关、张之間的义气又包含着共同忠于汉室、忠于刘备个人的封建道德的一面。因此，小說所宣扬的义气，过去曾經起过积极作用，也起过消极作用。具体表现在：封建社会中的劳动人民曾經利用义气这个思想武器来聚集革命力量或者团結起来抵抗統治階級的压迫；而剝削階級也利用它来結党营私、收买走狗，瓦解人民斗志，以维护其反动統治。但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这种沒有階級界限、朋友关系高于一切的“义气”，却已失去了任何积极意义，而成为反动的东西。它和无产階級的集体主义精神是不相容的。在现实生活中，不是有迷惑于所謂朋友“义气”，而致是非不分，敌我不分，甚至墮入反革命泥坑中这样的事例嗎？这足以說明产生于封建社会的作品即使是优秀的作品，也不能不受作者世界观的局限，也不能不受封建思想的影响，因而往往包含着不同程度的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成分，我們必須以今天的眼光来批判地对待这些作品。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利益出发，对于时代更近的資产階級文学，应当进行較之封建社会产生的文学作品更为严格的批判。因为以資产階級个人主义思想为基础的資产階級文学，更容易給讀者以有害的影响。軟弱无力的中国資产階級在文学上几乎沒有給我們留下多少有价值的东西，倒是在中国发生过很大影响的十九世紀欧洲資产階級文学，成为我們今天必須認真对待的問題。自然，这并不是說可以忽視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資产階級文学思想給予中国文学事业的腐蝕作用而放松了繼續消毒的工作。

从文学遗产中吸收其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成分，而排除其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成分，正是无产階級观点在批判地继承文学遗产問題上革命性和科学性統一的表现，这不但根本不是什么以现代无产階級思想苛求古人，而且正是历史主义观点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如果我們不首先批判优秀文学遗产中的消极因素而任其流传，势必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产生不利的影響。而且，正因为优秀的文学遗产是我們学习和继承的对象，它在群

众中还广泛流传和发生着影响，就越加需要我们对它进行检查和批判。正如周扬同志正确地指出的：“我们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世界观和历史唯物主义，对文学艺术遗产进行科学的分析，既要指出过去的优秀作品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意义和作用，给以一定的历史地位，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又要指出它在今天条件下对于人民的意义和作用，这是我们更需要注意而不可忽视的方面。只有同时注意这两个方面，才能避免片面性，才是完整的革命的和历史的观点。”①

当然，分析过去的优秀作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于人民的意义和作用，与评价它的历史地位一样，是一件细致复杂的工作，需要我们坚持不懈地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需要支付大量的劳动进行具体的分析研究，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我们认为，在古典文学研究中，既不能满足于那种讲两句作品的局限性，虚幌一枪以代替严肃的批判，也不能采取粗暴的、简单化的态度对待文学遗产。这就要求我们古典文学研究工作者认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毛泽东文艺思想，坚决地采取批判地继承的态度来对待一切优秀的文学遗产，具体分析地、实事求是地进行文学遗产的研究工作，在文学遗产研究的领域中，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红旗。

① 周扬：《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载《文艺报》，1960年第13—14期。

爱国诗人黄居石

謝公惠

黄居石（1626—1690前后），是明末清初动乱的时代中一位具有爱国精神、民族气节和同情人民疾苦的诗人。有关他的生平事迹的资料，留传下来的殊不多。据《新会县志》的记载：

黄居石，字圮仙，水南人。少颖异，遭鼎革，留意经世之学，于数学所造尤深。

只有这寥寥数字，这就使我们对黄居石的生平，难得有全面的了解，因而对他的诗作也就理解不深。就是清道光十七年同县阮松龄在为他删订《自知集》作序，也只说：

先生生前明天启六年丙寅（1626），至崇禎十七年甲申（1644），年十九，妇周氏归。娶妻之年，正国朝定鼎之日也。康熙三年甲辰（1664），有“徙村”之令，遂侨寓肇庆。十二年癸丑（1673），往湖北宜城署中。十五年丙辰（1676）春，自宜城归家后，多侨寓岡城（新会县城）。十八年己未（1679），有《无家咏序》云：“迫迁皇皇，羁栖无定处。”二十一年壬戌（1682），年五十六，尚有诗见集中，不知卒于何年。是先生之行止，略可考者如此。

这段话，虽可帮助我们了解黄居石的生平有所了解，而对于诗人的生活和政治活动，仍深感语焉不详。作为全面地理解一个诗人的思想行动，现有的这些资料，实在太少了。虽然我们还在不断地调查钩索中，但至今还未有新的发现。黄居石的《自知集》，在几年前，经新会重修县志办事处的多时搜索，仍仅获得原集五卷中的三卷，直至现在，还未获得完整的《自知集》。

尽管如此，就从黄居石这仅有的百数十首诗里，也可知道这个生当民族斗争激烈时期的诗人，怎样在他的诗里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并使我们对深深感到黄居石在生活上虽是艰苦备尝，流离潦倒，却不肯俯首媚事清廷。而且抱着无限同情心，从同胞身受的灾难，写出极其深刻而反抗性又强烈的诗章。如《哀江門》、《徙村行》、《憫故乡》、《牧馬行》和《春叹》等篇。这里先录《徙村行》：

新朝防海不防边，威令雷行刻不延。相传徙村詔昨下，居人犹疑未必然。已报大人巡海上，力役征徭交鞅掌。令尹蒼黃出郊迎，牛酒猪羊忙餽餉。犹恐菲薄慢王师，計田派餉曰“公仪”。民力竭矣胥吏飽，岂无老弱死鞭笞？惊看村前一旗立，迫于王令催徙急。携妻負子出門行，曠野相对啜其泣。孰无坟墓孰无居？故土一旦成丘墟。此身播迁不自保，安望他乡复聚庐？君不见咸陽三日火，頃刻烟生起青瑣。不独眼前事可哀，国亡家破奚独我！吁嗟誰繪郑俠图，流离載道天难呼。回首昔年烟火地，青青草树暮啼鳥。

诗人所反映的沿海人民在“移海界”令下后被迫携妻负子，别井离乡的凄惨情状，在

《新会乡土志》也有記載，节录于下：

明末大将郑芝龙降清，芝龙子成功逃海外，于順治十七年踞台湾，潜与内地通市，資接济。十八年（1661）下“移海界”令，詔沿海居民距海五十里者尽徙内地，禁漁民商船出海。康熙元年，命大臣至广东巡視督徙。二年（1663）冬，番禺蠶民周玉、李荣以繪船数百突入新会，尽焚汛哨，于民居独无所扰，自称“恢粤將軍”。破順德，执知县王元而去。至是平藩（平南王尚可喜）遣兵追破之，周玉就擒，余党以次潰散。康熙三年（1664）五月，当道惩李荣之乱，恐迁民仍通海船，續迁番禺、順德、新会、东莞、香山五县居民，先画一界，以繩直之，其間多有一宅而半弃者。周以深沟，别为内外，稍踰跬步，死即随之。近郭腴田，悉弃界外。民扶老携幼，流离載道，见者惻然！都司耿光，于界处置酒为乐。迁民露宿衢道，多餓死。署县令李肇丰借查究死者情状，排門逮捕邻右，牵累多人，闔城民臥不安枕。……四年二月，迁民失业，餓殍蔽野，弃儿塞路。……至康熙八年（1669）二月，詔滨海居民复业。

这叙述了清王朝为甚么要下“移海界”令的原因和黃居石与广大人民一同亲身感受的慘痛遭遇。詩人悲憤填膺地呼出“民力竭矣胥吏飽，岂无老弱死鞭笞？”而且大胆地指出，“不独眼前事可哀，国亡家破奚独我？”表现了詩人在异族統治下的沉痛心情和对异族統治者深刻的仇恨。

整整五年的“移界”浩劫，詩人出生地的家乡——江門水南在遭劫当中及其前后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詩人在《憫故乡》和《哀江門》中写道：

忆我之家水南村，一湾流水接江門。荔子蔭連青竹塢，稻花香滿綠葵軒。自甯
萑苻无定处，全家漂泊信乾坤。兵燹未宁复移海，室庐倒塌见荒原。今春更逢
西軍至，巷无居人各逃奔。多有赤貧难久客，强携妻子返家园。蓬蒿未除居未
葺，道逢里胥忽惊魂。粟米之征兼力役，民命如芥官令尊。新絲无收旧谷歉，
骨髓已干毛齿存。恨我离乡二十載，北风南枝恨暗吞。即今荒凉无归处，邻里
存亡不堪論。惆悵昔时觴咏地，乱虫寒蛩啼黄昏。

——《憫故乡》

詩人以有力的笔触，描述了水南村“室庐倒塌”、“巷无居人”的荒凉景象，水南村人民在血腥的镇压和胥吏剥髓的剝削下，遇里胥而惊心，“民命如芥”，“骨髓已干”的悲惨生活。

江門一望堪痛哭，乱后徘徊江之曲。日中江上不见人，草自青青波自綠。忆从
丙戌盜纵横，闐闐灰烬无顏色。甲辰移海尽丘墟，古庙独存新市側。雪峰烟起
暮钟残，一床苔蘚坐弥勒。先年展界通魚盐，中泽哀鴻方戢翼。酒炉蠶戶尚晨
星，大半荒蕪塵未得。今春何复戍清人，筑砦开塹无休息。毀瓦頽墻場道平，
回顧萧条目空极。数百年来杂沓场，惟有昏鴉啼山北。

——《哀江門》

这是一幅江村图景的两面：“移界”前的江門，是多么宁静而有生趣的村鎮；“移界”后的江門，却成了灰烬、荒凉的廢墟。“数百年来杂沓场”，现在只有毀瓦頽墻，昏鴉哀啼而已。詩人笔下的哀痛，不就是苦难人民的声音嗎？

在黃居石《自知集》里，有不少关怀人民疾苦和斥責豺狼奴隶的詩作，其中以《牧

馬行》一章為最著。詩云：

昨日潢池兵始下，發向岡城來牧馬。九陌紅塵簇錦雲，百室閉門市亦罷。馬上將軍穿錦袍，馬下健兒皆綵旄。剝啄聲遍城南戶，突進堂上卸弓刀。坐來督令東家主，速餉壺餐及鷄黍。居人供給已空囊，叱咤猶云無下箸。在邑誅求日不虛，豆粥亦派及村居。嗚呼盡馬之力猶恐蹶，盡民之力更何如！

寫出當時驕兵悍將和暴吏們的橫行霸道，貪黷、猙獰形象，寫出閭里、農村的被騷擾、敲詐、勒索情狀，真是入木三分。

我們再從黃居石的《感懷寄僧顯師兄》詩里，也可以片鱗斷爪地找出詩人生平一些行踪來，這是一首很關重要的詩，茲錄于下。

不到東林已四年，他鄉憔悴倍淒然。三春窳亂浮鄖水，九夏牢愁滯楚天。電逐滇黔征羽急，坐昏襄軫陣雲連。吟余異國悲莊舄，賦罷高樓倚仲宣。峴首北游催白髮，宜城歸棹但青編。揚子波濤危遠櫂，梅關風雪凍歸鞭。孤懷磊落劍三尺，萬死馳驅路五千。為客已難堪閱歷，還家不道遭迍邐。承塵日落遙栖鵬，贏博坡新冷杜鵑。繡帳燈殘宵有淚，薛厨風寂午無烟。安身又暫依戎幕，餬口多慚歎硯田。端水不調支遯鶴，相江頻返子猷船。同心詎受青山隔？別夢長隨皎月懸。丈室久疏狂士迹，尺緘猶獲故人憐。何時話掃蒼苔石，一鼎新茶煮活泉。

從這首詩的反映，我們可以知道他一生除了以教學為活外，中間還有一段時間當過幕客，這當然是他的政治活動了。所謂“安身又暫依戎幕，餬口多慚歎硯田”，這時也正是他從宜城歸來之後。康熙十五年（1676），吳三桂的反清戰爭，在廣東得到尙之信的內應。黃居石的參加戎幕，相信是站在尙氏這一邊的。雖然由於找不到有關資料，缺乏確實證據，但無論從他詩作中對尙氏內幕熟悉的程度，特別從他一貫對清王朝的憎恨情緒來推測，他參加尙氏戎幕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但是，在往宜城署中的一段時間，他的具體活動又是怎麼樣的，我們還不大清楚。

“身貧輕作客，世亂易離家”（《鄖城除夕》），這或是原因之一，可是他在宜城之年，也正是吳三桂在滇、黔兩湖掀起反清戰爭之時。“三春窳亂浮鄖水，九夏牢愁滯楚天”，這只是在亂亂中的客邊感慨而已。然而他抱負着“孤懷磊落劍三尺，萬死馳驅路五千”的慷慨心情，究竟干過什麼事業，我們可不知道。因為在他的楚中諸詩里，很少見他有什麼表露。也許其中或由於觸犯清朝統治者的忌諱，被後人刪改也未可知。文獻不足征，多麼可惜！

《自知集》里的《羊城秋意》十章、《秋興》八首、《落花詩》三十首等篇，也是黃居石的重要作品，是很有代表性的名作。尤以《羊城秋意》十章，在當時文壇上最膾炙人口。二百餘年後，清光緒間吳川詩人李文泰把它采入他的《海山詩屋詩話》里，這樣說：“康熙十九年，平南王尙之信以罪誅，新會黃圯仙居石作《羊城秋意》十章，藝林至今傳誦。”跋云：“淋漓痛快，真‘詩史’也。”這裡，錄其重要的幾首：

电掣雷轰漳海边，滿門金紫集貂蝉。南溟水激三千浪，北斗城开尺五天；重錫
土田符已剖，未离襁褓綬先悬。何堪轉瞬成朝露，黃木灣头泣逝川。（之三）

戟門开处士如云，玉帳雄驅虎豹群。秦戍已能亡二世，楚歌誰为散三軍？床头
宝剑藏秋水，壁上彤弓挂夕曛。海島义旗倡五百，几人殉难独从君？（之四）

翩翩珠履集西园，此日惊惶出掖垣。弹鋏客依新幕府，曳裾人返旧衡門；称藩
未尽狂生策，仗剑宁忘国士恩？亚父不留时已去，彭城空鎖夜归魂。（之五）

庫标黃紫十經秋，悉索东南尚未休。几处鑄山穷絕域，頻年煮海截长流；波斯
特献珊瑚树，隴右遙供翡翠裘。早悟多藏容易散，內庭何苦夜持筹？（之七）

万家傾橐筑禅堂，綉閣高悬古佛缸。舍利塔藏金鷲刹，上方云鎖玉龙窗；三城
热血涂丹壁，十郡冤魂結海幢。借問台城飢餓魄，曾持只履到蓮邦？（之九）

《羊城秋意》十首，文詞表面上虽极风华哀艳，感喟蒼凉之至，其实却是无情地揭露了当时新貴豪門尚氏家族的驕奢荒淫和他們內部紛爭的內幕。也可以說，这十首诗，就是煊赫一时的尚氏家族的兴亡史，也是清初一小撮民族敗类的縮影。

有这样的可能，詩人也和当时許多爱国志士一样，在强悍的异族鉄蹄踐踏下，一时无法抵抗的时候，想利用統治階級的內部矛盾，轉变为民族斗争，因而参加尚氏戎幕。然而这个汉奸胚子的尚之信，他的反清，本质上只是权利的爭夺，对人民沒有号召力量，因而必然归于失敗。事与愿违，是黃居石所引为最痛心的。他的《落花》詩云：“檀心着地情何託？綉口逢人只自緘”，无可奈何之感，溢于言表。阮松齡在《自知集詩序》里說：

先生素負才略，其干济又叵測也。乃徒以詩名，老死于奔走窮餓之中而弗克一究其用，是可悲矣！后之覽者，毋徒以区区詩人視先生。

在《自知集》里，也有一些清新婉約的抒情歌唱和贊美自然景物的晶瑩小品，足見黃居石的艺术造就是多方面的。然而即使象这样的詩句，也无法掩盖他的苦悶悲憤的心情。那些閑情逸致、流連光景之作，毕竟是极其少数。黃居石的詩的基本精神和总的傾向，还在于他的爱国、爱民而又富有现实主义的詩作。

黃居石詩，宗法三唐，远紹魏、晋，而又能摆脱拘縛，自标风格。它于溫丽中有沉郁气，于哀艳中有辛辣味。熔經鑄史，文采繽紛，犹其余事。当然，由于时代和階級的局限，也有它消极的一面。甚至本人晚年欲想削发为僧，意图遁迹空門。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于无可奈何中逃禅避祸，留其身以有待，也是黑暗时代中畸士們的一种苦衷。但是这种消极、虛无思想，不能不对他的某些詩作的思想內容产生一定的影响。

总的來說，黃居石是明末清初一位富有爱国热情和民族意識的现实主义的詩人。象他的《徙村行》、《憫故乡》、《哀江門》和《牧馬行》諸作那种金剛怒目、投枪擲匕的气概，似較他同时代的如苏北吳嘉紀、安徽黃生和广东屈大均等爱国詩人更为大胆，更有气魄。在极权专制，文网最严酷的康熙时期，黃居石有此詩作，确是难能可貴的。而其人其詩，湮沒了二百六十多年了，过去甚少为人們所道及。表而出之，作为鈎沉索隱，希望能够引起研究者的注意。

关于学术研究方法論問題的討論 (三)

編者按：本刊自今年第二期起举办《关于学术研究方法論問題的討論》专栏以来，許多学术研究工作着本着百家爭鳴的精神，热烈地参加了討論，共发表了有关方法論問題的短文二十三篇。討論的情况表明，方法論問題，学风問題，是学术研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問題，也是学术界十分关心的問題。在討論中，各个学科都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問題，特别是提出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階級斗争理論和階級分析方法是否适用于历史研究这样一个根本性問題，引起了大家的重視，进行了比較集中的討論。我們认为，方法論問題还有繼續进行討論的必要，但这个专栏的形式，已經显得不能适应討論逐步深入的情况。因此，决定专栏討論在这一期結束。

我們希望繼續就各个学科的方法論問題展开討論，特别是对历史科学研究中的階級分析方法問題作进一步的探討，以便在学术研究領域中进一步貫徹百家爭鳴的方針，批判资产階級的唯心主义观点，高举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紅旗。

抽象概念的階級內容例說

唐 陶 华

在階級社会中，人們的一切思想学說和一切典章制度，都具有階級性，代表着不同階級的利益和要求。因此，要想認識历史上所曾存在过的思想学說和典章制度，就要运用階級分析法。

有些古代的哲学和政治的概念，从表面上看，似乎只表示出抽象的意义，而看不出它的时代特征和階級內容，但只要我們严肃認真地进行探索，仍然不难透过表面的詞句而揭示出其本質来。

試以古代希腊奴隶制社会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为例。

亚里士多德在道德方面提倡中庸之道，反对太过和不及。他曾列有一表：

(不及)	(中庸)	(太过)
怯懦	勇敢	卤莽
冥頑	节制	放縱
吝啬	慷慨	奢侈
卑下	高尚	虚矯
伪謙	信实	踞傲
野鄙	机智	滑稽

奸詐
抗爭

正義
友愛

嫉妒
諂媚

从表面詞句看来，上表所列的中庸美德好象可以超越时代的限制而为一切阶级所采用了。但究其实际，则又不然。亚里士多德本人就曾明白地表示，所谓道德是主观的，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对奴隶主是道德的，对奴隶就不一定是道德，特别是正义和友爱不能用以对待奴隶。他说：“友爱和正义确实不能用来对待无灵魂的东西，对于马，对于牛，或对于奴隶（正由于他是奴隶）就是这样的。”可见上述的中庸美德只适用于奴隶主对待奴隶主，而不适用于奴隶主对待奴隶。亚里士多德又说：对奴隶来说，“只要他们不致于怯懦到不能完成任务，又不致于卤莽到搞坏事情的地步就行了，此外并无其他要求。”可见所谓中庸的道德标准，只是对于奴隶主阶级的要求，而不是对于奴隶阶级的要求。亚里士多德认为，奴隶是不可能有这样高的道德标准的。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说，认为国家是以达到人类幸福生活为目的的工具。他的《政治学》开宗明义第一章便说：“各种国家都是一种社会，各种社会都是以某种幸福生活为目的而设立的。……国家是一切社会中至高无上的、包括一切社会在内的，它的目的便在于最高的幸福生活。”他又说：“国家是……彼此平等的人们为尽可能更美好的生存下去而结成的联盟。”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所说的国家又好像是超时代超阶级的。但他后来又说：“国家不是仅仅为生活而存在的，如果单以生活为目的，那么，奴隶或野兽都可造成一国；他们所以不能成国，就因为他们没有福分，没有自由生活的权利。”可见奴隶被排斥在人类幸福生活以外，奴隶是被认为没有享受幸福生活的权利的。这样，当时可以享受幸福生活的就只有奴隶主阶级，这样，国家的阶级实质就显示出来了。事实上，当时的国家不但不能为奴隶阶级谋幸福，而且还是压迫奴隶的工具。

亚里士多德声称，人是政治的动物，国家的基础就是人对公共生活的天然倾向。这也好象可以成为一个超时代超阶级的抽象的公式。但如果和当时的具体政治实况结合起来看，则又不然。当时的奴隶是没有权利参加政治活动的，他们不是“政治的动物”。据亚里士多德的解释：奴隶并不是人，而是有生命的工具。奴隶只是物件，不过具有人的躯体和灵魂罢了。奴隶既然不被认为是人，当然不是政治的动物，不能参加政治活动了。

列宁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01页）超时代的观点只能妨碍我们历史地分析抽象概念的具体内容和发展过程。

毛泽东同志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72页）超阶级的观点只会妨碍我们对于各种抽象概念的本质的认识。

由此可知，在阶级社会的条件下，超时代、超阶级的东西是不可能有的。虽则有許多抽象概念的时代性和阶级性并不那么明显，但只要我们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历史主义地加以研究分析，还是不难看出其阶级内容的。

从“循名責实”看孔子的“仁”

——与刘节先生商榷

丘 陶 常

刘节先生在《怎样研究历史才能为当前政治服务》一文中，反对把阶级斗争的理论用于古代历史研究。他的论点之一就是“把孔子的‘仁’看成是‘‘自古及今’人类社会上各种具体事件中归纳出来的抽象名词’，说‘当时用孝、悌、忠、恕说‘仁’，我们现在就要用阶级友爱等方面说‘仁’，其为‘仁’一也。”在这里，刘节先生是说孔子的“仁”是一个没有一定阶级内容的抽象名词，因此又是一个可以容纳不同时代不同阶级内容的名词，我看，这个论点是不能成立的。

中国思想史上自古以来就很重视名实之辩，庄子尝说：“名者，实之宾也”，“名止于实，义止于适”；荀子也说：“制名以指实，上以明贵贱，下以辩同异”，“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实辩”。尽管各家对名和实的关系看法不同，但是从来没有人抛弃了实而只谈一个空洞的名的。孔子提出了他的有名的“正名”论，他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他又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我们知道，孔子所以发出这些议论，是因为他看不惯春秋之世窃僭越分，礼崩乐坏的现象，也就是说，“礼”、“乐”这些“名”，已经不符合孔子一心向往的西周社会的“礼”“乐”之“实”了。他的“正名”实际上是要改变现实来适合他的政治主张，其政治目的性和阶级性是很明显的。既然在孔子心目中“礼”、“乐”以至于君、臣、父、子这些“名”都有其特定的“实”，怎么可以把孔子的“仁”看成有“名”无“实”，或者可以容纳任何“实”的抽象名词呢？

诚如刘节先生所说，孔子和孔门弟子是以“孝”、“悌”、“忠”、“恕”说“仁”的。我们且来通过“孝”“悌”“忠”“恕”，看看孔子的“仁”的阶级实质是什么。孔子非常重视“孝”“悌”，看做是“仁之本”。他认为对待父母，第一要做到“敬”，不敬就何以别于犬马；第二要做到“无违”，要求“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要求“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总之，一切都要按照西周以来传统的“礼”办事。孔子又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孔子是把他提倡“孝”“悌”的政治目的说得很清楚的了。再说孔子“一贯之道”的“忠”“恕”。“忠”虽然有“忠焉能勿悔乎”、“为人谋而不忠乎”这一层意思，更主要的是指臣下要忠于君上，他明确地说：“君使臣以礼，臣使君以忠”；“居之无倦，行之以忠”。至于“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然也是有其特定阶级内容的概念。这里不可能详细地论证，但可以說一点，“恕”是作为处理人与人之间，而且是统治阶级内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观念提出来的，在孔子思想中，“欲”什么，

“不欲”什么，“立”什么，“达”什么，是有一定的标准的。这个标准就是“礼”。颜渊问仁，孔子回答说：“克己复礼为仁”，颜渊进一步“請問其目”，孔子回答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孔子还说过：“兴于诗，立于礼”。可见，孔子的“恕”，至少是包含着以“礼”来立己立人和达己达人，我不欲人对我“非礼”，也不要对别人“非礼”的意思。这个“礼”，不是刘节先生所说的“各种社会的共行秩序”，而是西周以来统治阶级的“礼”，是具体的道德规范，是用来维护奴隶制的统治秩序和等级制度的。孔子的“孝”、“悌”、“忠”、“恕”都是为奴隶主贵族的统治服务的。这样，孔子的“仁”的阶级实质也就不言自明的了。当然，孔子是站在奴隶主立场还是站在封建主立场说话，这个问题还需要讨论，这里分析“孝”、“悌”、“忠”、“恕”的阶级实质，为的是说明孔子自己也认为“仁”有特定的内涵，决不是一个空洞无物或者可以任意装进任何内容的“抽象名词”。假如象刘节先生所说的那样可以用“阶级友爱”来说孔子的“仁”，那不但如许多同志所批评的那样是根本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的，我认为，这也是根本上违背孔子说“仁”的本意的。

自从儒家在封建社会取得正宗地位，二千年来，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思想家在解说孔子思想的时候，都附加了一些为他们阶级或集团政治利益所需要的内容，甚至资产阶级改良派康有为也把孔子的“仁”说成是“博施济众”、“爱人利物”的类似资产阶级博爱思想。这种现象本来是没有什幺奇怪的。在封建统治者以政权力量规定了儒家独尊地位的情况下，历史上进步的或者反动的思想家为了推行其主张而不犯“离经叛道”的罪名，往往不得不打出孔子这个“至圣先师”的招牌，来托古改制。其实他们所说的和孔子所说的已经不甚相同或者甚不相同了。刘节先生是研究历史的，对于这些“历史真相”，想必是知道的。历史上的托古改制者虽然有进步和反动之分，但是他们用以解说孔子思想的方法都是反科学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方法。假如看不到孔子的“仁”和康有为的“仁”之间本质的差别，只看到他们都说过“仁”，便曰：“其为仁一也”，这只能是主观唯心主义方法的沿用，而不是什幺科学的结论。假如进一步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孔子思想或他的某些命题可以超越时代和阶级的局限而为一切时代一切阶级所服务，那就更加远离“历史真相”了。其所以如此，正是由于离开了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方法。

由此可见，加强世界观的改造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对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是多么地重要。

对开展自然辩证法研究的一些意见

黄友谋

近年来，我国的哲学工作者和科学工作者，学习和研究自然辩证法的风气一天天地高涨，特别是有些地区，采取哲学家和科学家结成战斗联盟的方式，来进行自然辩证法

的研究和討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可喜的現象。自然辯證法的学习和研究，這不管對哲學家或是科學家來說，都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特別是自然科學工作者，通過自然辯證法的学习和研究，可以逐步体会到怎樣运用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去正確地分析研究自然現象和有關自然科學問題，使他們對本行的專業科學能够理解得更全面和更深透，從而使他們在專業科學研究上能够獲得單靠自發的唯物主義觀點去進行研究時所無法比擬的巨大成效。為了使我們学习和研究自然辯證法的工作能够開展得更好，作者有一些不成熟的意見提出來向同志們請教。

首先談第一個問題。既然說自然辯證法是运用無產階級的世界觀來研究自然現象和自然科學問題，那麼，是不是說自然科學也有階級性呢？正當國內外階級鬥爭形勢極其尖銳的今天，在我們的政治生活、社會生活和學術生活上，強調階級教育和运用階級觀點來分析問題是完全必要的。在自然科學上應該怎樣來正確地看待這問題呢？這決不是一個可以簡單答复的問題。顯然，自然現象是沒有什麼階級性的。自然科學本身也是沒有階級性的。世界上並沒有什麼“資產階級的物理學”和“無產階級的物理學”之分；歐几里特幾何學和牛頓力學曾經為封建地主階級服務，現在它在資本主義制度的國家里主要是為資產階級服務，在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下它卻又為工人階級服務，將來到了共產主義社會時它無疑地也能同樣發揮它應有的作用。服務的對象雖是不同的階級，但歐几里特幾何學和牛頓力學的內容則一，這說明它們本身並沒有階級性。如果我們硬要把自然科學染上階級的色彩，對於社會主義建設是不利的。但是，與此同時，我們又必須注意到另外一面的事實：現代自然科學體系可以說基本上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建立和發展起來的。儘管構成自然科學的大量科學事實、許許多多的自然規律及其有關的應用技術、和在一定條件下被實踐所普遍檢驗過的理論沒有什麼階級性，不管在過去、現在和將來，它們對人類認識自然、改造自然和推動生產力的發展都能起巨大的作用，但我們如果就因而簡單地認為自然科學的理論體系和邏輯結構可以不會絲毫留下非無產階級思想的影响和受到剝削階級的階級局限性的制約，那是不可想象的。特別是位於科學發展最前線的那些未經實踐很好檢驗過的假設和不成熟的理論，在很大的程度上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科學家們的思想方法和世界觀的影响，這是非常明顯的。雖然，由於自然科學是以要求普遍驗證為其主要特點的科學，其中所包含的錯誤因素和有害成分，以後會通過實踐的檢驗或理論上進一步的論證，終於從自然科學這一有機的體系中被排除出去，被淘汰掉。可是，這過程往往是複雜而需時的。如果任其自發地進行，便會不必要地走過多的彎路、拖延過長的時間。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進步的哲學概括、正確的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新的實驗技術和新的數學形式等，應該是通過人的主觀能动性起作用的；也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最需要通过我們自覺的努力，把正確的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特別是毛主席的哲學思想運用到自然科學的研究上，使其發揮威力。如果科學工作者籠統地認為所有的科學思想和科學理論都是超階級的普遍真理，因而放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自然辯證法的学习和研究，這就是說我們把最有力和最

利于我们的思想武器搁置在一边不用，而去盲目地跟别人跑，那肯定会上当的。特别是在目前我国科学技术底子差、任务重、要求迫的情况下，这样做会使我们漂流在现代科学技术的汪洋大海中而心中无数，不知如何着手才能完成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向我们提出的科学研究任务。这是在战略上极为不利的舍本逐末的做法。

再谈第二个问题。在自然辩证法的学习和研究中，还必须注意到这样的一个事实：就是，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本质上毕竟有所区别，自然科学和哲学、政治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终究是不同的。正如不能把有关自然现象的规律和研究方法随便外推到比自然现象高一级的社会现象中一样，也不能把有关社会现象的规律和研究方法无条件地内插到自然现象中去。一个自然科学工作者要做到能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到自己的科学研究上去并且取得成就，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单是词句上生搬硬套固然不行，庸俗地牵强附会也不会有什么好处。必须善于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针对问题的本质，有的放矢。这样就首先要求科学工作者认真地学习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和积极参加阶级斗争和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不然，仅仅把自然辩证法孤立起来当作单纯的技术问题去学习和研究，是达不到目的甚至于会不能理解的。此外，科学工作者又必须精通本行的专业科学，然后才能把自然辩证法的研究落实到具体的专业研究上边去。不可能想象，一个自然科学工作者没有从事本行的专业研究甚至于对本行专业的基本锻炼都没有很好地下过功夫，便可以单靠哲学上的思索来研究物理学而能够在物理学的具体研究工作上拿得出来什么成果。另一方面，对一个哲学工作者来说，在学习研究自然辩证法时，必须采取慎重的态度来对待自然科学上的哲学问题。因为自然科学绝不是单纯的知识，它是有组织、有系统的知识体系。因此，要想正确地理解科学问题、科学理论、科学概念，一般必须具备一定的科学修养，甚至于非经过一定的科学锻炼不可。而这些修养和锻炼恰恰是一般的哲学工作者所缺乏的。不少的哲学家在研究科学上的哲学问题时，只拿一些有名的科学家或某些科学工作者所发表的哲学或半哲学性的著作和言论来做根据，去进行分析批判。这是非常不够的，在有些情况下甚至于是有害的。因为，有些自然科学家尽管他在科学上有大的成就，而他们在哲学上的修养却往往是幼稚的。他们正是列宁所批评的，是“伟大的科学家”，但却是“渺小的哲学家”。我们如果把这些科学家所讲的外行话做根据，来去批判他们的内行工作，则所得的结论会不恰当甚至于是错误，那是毫不足怪的。假如更进一步地根据这些科学家的哲学见解去讨论一般性的科学上的哲学问题，那更是不妥当的危险的做法。科学家的哲学论著最多只能拿来作分析研究科学问题时的参考，决不能拿来作为主要的依据；主要的依据应该放在自然科学的本身上。

总的说来，我们在学习和研究自然辩证法的时候，也和对待其他任何学术问题一样，应采取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我相信，采取哲学工作者和科学工作者结成战斗联盟的方式，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坚决贯彻党关于学术问题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将使我们避免走一些弯路，从而使我们的学习和研究取得更大的成果。

心理学研究与联系实际

阮 鏡 清

心理学自从德人馮特(W·Wundt)在萊比錫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实验室而被人认为已进入所謂“科学时期”以来,快要一百年了。一百年的时间并不算短,但是它的发展却比其他科学还远为落后。就我国的情况来说,接受了外国心理学的影响而开始进行科学研究,也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了。特别是解放以来,由于党对科学的重视,我国心理学的研究工作更普遍地开展着,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这些成绩如果从当前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要求来看,还是远远不够的。例如师范院校中所教的心理学,还不能满足学生将来教学的需要。心理学的发展为什么直到今天还不能令人满意呢?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最主要的是因为心理学一向为各式各样的唯心主义理论所支配,而解放以来心理学工作者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还很不够,在心理学领域中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还存在不少问题,在研究工作上也往往不能深入现实生活和实际密切联系起来,甚至完全脱离了实际,不免大大影响研究质量以至整个心理学的发展。

但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是不是没有可供研究的心理学问题存在着呢?决不是。这是有大量的事实可以说明的。例如今年四月六日《羊城晚报》曾刊载了介绍广州市电信局先进工作者张瑛同志(04查号台话务员)怎样记忆电话号码的方法和經驗的文章,给我们的启发很大。

据张瑛同志说,记忆电话号码通常可采用三种方法。第一种是分类串记法,就是把电话号码分别进行排队,编列成各组,如32393、32493、32593、32693……是一组,13625、14625……是另一组。这样串连记忆,只要记得一个号码,其他号码很容易联想起来,效率便会高些。第二种是加减记忆法,如的彩冰室电话13648,开头的1字是整个荔湾区电话都一样的,可以不记它,后面四个号码3加3等于6,4加4等于8,这样就把13648这个电话号码记住了。又如14263这个号码,开头那个1字不算,其余利用减法去记忆它就容易了,因为4减2等于2,6减3等于3。第三种是联系代号记忆法,在04台工作的话务员,都有自己的代号,张同志的代号是419,于是她把凡与419有关的电话号码,也给它们排列起来,如14419、16419、32419、51419等等。由于419是自己的代号,不用记,其余的又作好了编排,变成有系列的号码,就容易记住了。

除了这三种方法之外,她说还有一种办法是尽力把原来毫无意义的数字,赋予某种意义,使机械记忆转化为意义记忆。这也有助于加强记忆力。例如过去觉得南方大厦酒店的电话13698不顺口,难记住,后来看了话剧“七十二家房客”,剧中有个人物叫“三六九”,另一个人物叫“八姑”,便把这两者揉合起来,除去第一个数字根本用不着记以外,剩下的就是一个“369”和一个“8”姑,13698这个号码一下子就记住了。

张瑛同志介绍了记忆方法之后，还介绍了一条很重要的经验。那就是：“要记住一件事情并不困难。首先要注意力集中，全心全意去记住它。”“记性和别的东西一样，注意力高度集中，假以时日，就锻炼得出来了。”

怎样记忆电话号码，就是心理学上的一个问题。张瑛同志虽然不是研究心理学的，不可能把点滴经验提高到理论，但她也已经接触到这个问题，给心理学提供了可贵的具体材料，并且使心理学研究的某些结论进一步得到验证了。我们能说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什么心理学问题存在并等待我们去研究吗？过去我们研究心理学，多数是只满足于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寻章摘句，人云亦云，而很少考虑到要面向现实，深入有关现场中去发现问题，进一步进行调查研究，观察实验，作成结论，为心理学提出第一手材料。这样脱离了实际，当然在现实生活中的许多问题就无从发现出来，许多事实也无从掌握到手了。结果又怎能提高心理学研究的质量，并促进其迅速发展呢？同时由于我们脱离了实际而只有书本上的空泛知识，又往往经不起实践的考验。过去一般师范院校的学生学习过心理学之后，还不能有效地运用它去解决教学上的问题，主要的原因也是在这里。

心理学研究上这种脱离实际的方法，可以说流行了几十年，一直到了一九五八年，在整风运动和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胜利的基础上，才初步地扭转过来，逐步明确理论联系实际的方向。从这几年来在各方面工作上坚持这个方向所获得的初步结果看来，已足够说明心理学这种联系实际的研究，大可以使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发现不少问题，掌握不少具体事实，因而提高研究质量，推进心理学的发展，而为建立马克思主义心理学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是心理学研究工作的根本方向和指导思想，也是发展心理学最有效的最正确的途径。

为什么心理学联系实际的研究可以使它有效地正确地发展起来呢？这个问题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早已给我们解答清楚了。原来人的“认识的过程，第一步，是开始接触外界事情，属于感觉的阶段。第二步，是综合感觉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这第二阶段即为理性阶段。过去哲学家有只认感性认识为可靠的，也有只认理性认识为可靠的。但前者只得到一些片面的知识，不能发展而提高到理论；后者虽能得到理论，但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只是生观的自生的靠不住的东西了。所以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既很重视感性，也不忽视理性。“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而我们研究一切科学，如果能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方向，把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互相结合起来，则可以不断提高研究质量，并有效地正确地促进科学的发展。这对于心理学研究也不能例外。

当然，心理学研究既然要联系实际，以提高质量，那就要从实际出发，为实际解决问题，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就当前的情况看来，社会主义建设向心理学提出的问题很多，主要有关于教育方面的，有关于生产劳动方面的，有关于医疗保健方面的，其中以教育方面更为重要。心理学工作者必须和其他教育科学工作者一样，深入学校现场，从实际情况出发，在实际中选题取材，进行研究，解决问题。而当从实际出发进行研究

时，我們既要头脑清醒，主次分明，也要目光四射，看到全局。如在现场上既要看到中学，也要看到小学以至幼儿园，既要看到城市的中小学幼儿园，也要看到农村中的中小学幼儿园；在問題上既要看到各学科的教学，也要看到学生思想品德的教育以至体育，既要看到教学、教育方法，也要看到教学、教育內容。如能逐步扩大范围看到业余教育甚至一般社会青少年儿童的教育問題則更为全面。这里还值得提一提的，就是过去心理学者多注意于各科教学方面的心理学問題研究，而对于思想品德教育方面的心理学問題則很少过問，更缺乏有系統的研究。其实这方面的問題虽然較教学問題为复杂，研究工作較为艰巨，但由于培养坚强的革命后代的重要性，在分工上也應該有一部分人不辞劳苦地把这方面的任务承担起来。同时不論各人分工于那一方面的研究，不論从那一个小問題着手，都需要有一个較远大的共同目标，在一些中心問題的統一下，摆脱人与人之間、单位与单位之間的不必要的限制，互相联系协作起来，各尽所能，以利于实际問題的圓滿解决，使研究质量不断提高。

此外，在心理学上树立联系实际的研究方向，強調要深入现场中大量进行調查研究，观察实验，并不是說从此可以忽視了对实验室的工作和对基本理論問題的研究，也不是說可以忽視了对国外材料的适当吸收。过去有些人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在实验室中专搞脱离实际的研究，当然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但是也有一些联系实际的研究，除了要在现场調查实验之外，还必須在实验室中进行一定工作，加以証驗，同时有些問題还应以实验室工作为主来解决的。所以实验室工作对于联系实际的研究，也是有一定作用的，不能忽視。

至于理論研究，如能有的放矢，有許多重大問題也是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的。例如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通过脑电分析研究四岁到二十岁儿童和青少年的大脑发育情况，发现在这个年齡阶段中，大脑的发育有两个显著的加速时期：一个是五岁到六岁之間，一个是十三岁到十四岁之間。在这两个时期內，大脑的发育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一种类似“飞跃”的状态。（見1962年11月11日《人民日报》）这些研究結果在教育学和医学方面都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如儿童的入学年齡問題，有的人主张以六岁为宜，有的人主张以七岁为宜。而根据心理研究所这次对儿童脑电的观察研究，发现一般儿童在六岁和七岁时，大脑的发育程度基本上是接近的。这种事实便可作为教育部門考虑儿童入学年齡問題的一个依据了。又如学生在什么年齡應該接受什么程度的教育才恰到好处，也是教育工作中需要注意的問題。了解了不同年齡的人的大脑发育水平，对教育部門考虑这个問題也有实际意义。此外有些心理学理論問題如果得到解决了，又可为辯証唯物主义哲学进一步提供科学論据，加强思想教育战綫上的武器。这也是有利于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的斗争，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設的。所以心理学联系实际的研究，虽然把重点放在解决当前实际問題的研究上，但决不是忽視对基本理論的研究。而且，我們強調联系实际，也正是同时要在实践的基础上来丰富、提高心理学的理論，逐步建立起馬克思主义心理学的理論。

以上是根據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精神，從聯繫實際出發來談心理學的研究。至於我們在聯繫實際中解決了實際問題，從而提高了研究質量所得來的理論，當然又可以回到實踐中去更好地為解決實際問題服務。但這是另一方面的問題了。

對形式邏輯要概括現代思維的一些看法

楊 芾 蓀

近幾年來我國邏輯學界對於用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研究形式邏輯，批判長期以來唯心主義形而上學對形式邏輯的歪曲，弄清形式邏輯的基本面貌等問題，進行了討論，取得了不少成績。在這樣的基礎上，應該怎樣進一步發展形式邏輯，使它更好地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就成為非常迫切的問題。我以為東方明同志最近提出形式邏輯要概括現代思維材料的意見，（見《哲學研究》1963年第二期）是解答這個問題的十分值得重視的意見。

為什麼發展形式邏輯必須概括現代思維？這是形式邏輯研究對象的特點及其發展規律所決定的。形式邏輯是研究初級思維規律和思維形式的科學。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看來，這些思維規律及其形式是在人們認識客觀世界的過程中表現出來的，只有研究人們認識客觀世界的過程，研究思維本身的活動過程，才有可能認識思維活動的規律、思維活動中思想合乎規律的聯繫、聯結的規律，以及在思維活動中確切反映現實的、實際存在的思維形式的特點。隨着實踐的發展，人們的思維活動也不斷發展，人們的認識也不斷的發展，總是表現為思想內容的不斷豐富、複雜、深入。與此同時，勢必引起思維形式的變化和發展，而思維活動中思想內容的聯繫、聯結的本質，也愈加顯露出來。邏輯學家把存在於人們思維活動中的這些規律及其形式加以總結，形式邏輯就是這樣的形成和發展起來的。這一情況說明形式邏輯的研究和發展是從來不能離開人們的思維認識活動的。

現代思維較之過去任何一個時期都複雜、深刻得多，也提出許多邏輯素材，要我們加以總結。例如：由於好些邊緣科學的出現，子項互相排斥的劃分原則就漸次顯出它的形而上學性質，這樣，也不能不要求我們從理論上重新估定，作出規定。這只是一個例子，類似的情況一定不少，儘管這些想法是否正確也還值得商討，但現代思維終究提出了許多問題，則是毫無疑義的。如果形式邏輯不以此為研究的材料，怎麼能夠向前推進，怎麼能夠解決它落后於現代思維水平的矛盾？

要概括現代思維，必須結合具體科學進行研究才能做到。這是因為人們思維活動不斷發展的成果，具體表現在人們對客觀世界不同方面的認識上，它是通過各門具體科學體現出來的。這也就是說，從思維方面來考察，各門具體科學是人們思維認識活動結果所產生的具體材料，是當代思維所達到的水平的紀錄。在這些材料里，我們可以看到各

門科学如何运用不同的邏輯形式，进行推論，引出新的結果，形成新的理論等一系列的邏輯推演过程，它可以說是人們思維活动的历史、思維方式方法的历史。形式邏輯固然不研究人类認識发展的历史，也不需要代替各門具体科学研究其內容，却不能不联系認識发展的历史，不能不以这种思維发展水平的纪录作为研究的素材，从其中概括出形式邏輯的规律規則等等。列宁曾經指示，要研究邏輯，研究認識的內容，首先应当研究認識的历史。列宁又指出：“总的說来，在邏輯中思想史應該和思維規律相符合”。（《哲学筆記》第232頁）列宁这些指示的基本精神是十分值得我們寻思的。还可以指出，形式邏輯的研究必須和具体科学相結合，这也为邏輯科学发展的历史所証明了的。十七世紀时，培根把当时自然科学为了确定精密的事实和从其中作出正确的結論及概括而采用的一定的邏輯方法，当作一定的思維方式加以研究，从而产生了归納邏輯的体系；邏輯研究与数学相結合，从而产生了形式邏輯的分支——数理邏輯；黑格尔将邏輯研究与哲学史相結合，产生了辯証邏輯体系，虽然黑格尔的体系是唯心主义的，但列宁对黑格尔把他的“概念、范畴的自己发展和全部哲学史联系起来”的方法，給予很高的评价，认为“这給整个邏輯学研究提供了又一个新的方面”（《哲学筆記》第91頁）。这些事实和列宁的评价，也深刻的启示我們：邏輯的研究必須深入不同的科学領域，把各門科学用作認識的工具、手段的邏輯方法，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进行研究。

发展形式邏輯要概括现代思維既如上述，它到底怎样概括现代思維？它从现代思維中概括什么？这首先要了解现代思維的基本特点，并从这里出发来加以考虑。

我們知道，思維是对存在的反映，它是通过表象、概念、判断等等来反映存在的一种能动过程。客观现实是按照辯証法的规律发展的，人們認識客观现实的过程，必須符合辯証的规律，这是思維的本性。但是，长期以来，人們只有自发的辯証思維，人們只能依靠事物本身的辯証法，不完整、不系統、不經常的揭示事物的辯証规律性。在人类認識发展的一定阶段，具体說是在馬克思主义哲学誕生之后，凭借着唯物辯証法这一科学，人們才真正的認識到辯証法的规律是客观现实所固有的，思維必須按照辯証的规律来反映客观世界，思維中的主观辯証法才被意識到，被理解到。这样，就有愈来愈多的人自觉的理解到不遵循辯証法的思維，不可能揭露客观世界发展过程的复杂性，矛盾性，思維运动的辯証法在人們的思維活动中，愈来愈显出它的重要意义，認識客观世界发展过程的强有力工具——辯証法，愈益成为各門科学知識中的思維方法的核心和本质性內容。由于这一情况，它就对形式邏輯提出一系列新的急待解决的問題。主要的有如：

（一）在现代思維中，形式邏輯已經失去了它曾經在一定历史阶段作为普遍的思維方法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怎样認識它的规律和方法等在認識客观现实中、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和地位？它和反映辯証思維的辯証邏輯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二）根据现代思維材料，探索各門科学中所运用的邏輯形式，例如物理学有长足的发展，我們需要对它所运用的推論方法等等，从認識的角度，从邏輯的角度，加以理論概括。

(三)从现代思维材料中，探索形式逻辑的内容，有哪些已被科学的实践所推翻，有哪些内容还不够完善，应当加以充实、补充，有哪些内容有日益突出的作用，应当深刻的阐明。

(四)怎样做到辩证的思想内容与逻辑形式的高度统一。此外，还要从反面材料中，揭露现代诡辩论者的违反逻辑的谬误。他们玩弄现代语言的复杂变化和歧义，主观运用概念的灵活性，否认概念的确定性，任意以曖昧的詞句进行欺騙，以错误的类比混淆是非等违反形式逻辑的手法来反对真理。对于这些谬误及其特征，也必须給以深刻的揭露。

科学发展的道路，一般不是经过对原有体系的废除、割断的道路而达到，形式逻辑的发展也不能例外。因此，在概括现代思维的时候，不应该也不可能否定形式逻辑关于思维的确定性、一贯性、论证性等基本原则。但是，不适当夸大这些原则，把它与思维的辩证原则划一条不可超越的鸿沟，也不是正确的。概括现代思维将会使形式逻辑包含某些辩证逻辑的因素，恐怕在所难免。试举数例加以说明：

同一律是形式逻辑的最基本的规律。它体现了思维的确定性的要求。在逻辑史上（一直到现在）几乎所有的逻辑学家都把同一律的同一与抽象同一性联系起来，把它当作抽象同一性来理解。但是，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就指出，抽象同一性甚至在研究思想事物的一种抽象的科学——数学——中，也渐次被抛弃着。（参见该书第176—177页）显然，根据经典作家的这些指示，必须从理论上探究同一律的同一的意义，否则就不能说明抽象的同一性已被自然科学抛弃，但自然科学却应用了同一律这个工具。

毛主席对确实性的问题，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有非常深刻的阐述。毛主席指出：“战争没有绝对的确切性，但不是没有某种程度的相对的确切性”，这某种程度的确切性，使“战争的计划性就有了客观基础”。“需要克服战争特性中的纷乱、黑暗和不确定性，而从其中找出条理、光明和确实性来，方能实现指挥上的灵活性”。毛主席认为：对战争“只应给以相对的固定性”，“必须根据情况的变化和战争的流动而适时地加以更换或修改，不这样做，我们就变成机械主义者”。毛主席还指出：“没有人否认，就是在某一定时间内适用的方针，它也是在流动的，没有这种流动，就不会有这一方针的废止和另一方针的采用”。这种流动“是数的流动，不是质的流动。这种根本的性质，在一定时间内是决不流动的”。（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85—486页）深刻钻研毛主席这一指示，理解确实性与不确实性的辩证关系，我们对同一律、对思维的确定性原则，将做出更全面、更科学的理论阐述，是可以断言的。

思维的无矛盾性是准确地思维、恰当地判断的必要条件。据此，形式逻辑要求思维必须前后一贯，不得自相矛盾。即使是在辩证地思考问题时，仍然不能违背这个要求。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一书中，曾举出这样的例子：战争的目的要求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但是战争中又提倡勇敢牺牲。牺牲自己就是不保存，不是保存。这一来岂不是战争既要求保存自己，又要求不保存自己。这样的思想具有“甲既是乙，又不是乙”的形

式。但是，不然。毛主席說：“怎样解释战争中提倡勇敢牺牲呢？岂非与‘保存自己’相矛盾？不相矛盾，是相反相成的。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是要付代价的，有时是极大的代价。部分的暂时的牺牲（不保存），为了全体的永久的保存。”（同上书第472页）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离开相反相成的观点，离开两点论的观点，就不可能理解保存与不保存的不相矛盾。如果这样的理解为不错的話，那么，我們就必须遵循毛主席的指示，在相反相成，在两点论的观点指导之下，来阐述思维无矛盾性原理，否則的話，我們就不免片面地理解所謂同一事物在同一時間同一方面或具有某种属性，或不具有某种属性，不能既具有某种属性又不具有某种属性的涵义。

推出的知識必須具有充足的理由，这个充足理由包含了真实前提与正确推理形式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就前者說，形式邏輯只要求做到形式上的真实；就后者說，要求立論要从思维形式上具有論証性；無論前者和后者，都不是要求具体內容的論証性，这是形式邏輯对于充足理由的理解。毛主席非常重視論証中的充足理由。毛主席在駁斥亡国論時會說：“亡国論者看到敌我强弱对比一个因素，从前就說‘抗战必亡’，现在又說‘再战必亡’。如果我們仅仅說，敌人虽强，但是小国，中国虽弱，但是大国，是不足以折服他們的。他們可以搬出元朝灭宋、清朝灭明的历史証据，証明小而强的国家能够灭亡大而弱的国家，而且是落后的灭亡进步的。如果我們說，这是古代，不足为据，他們又可以搬出英灭印度的事实，証明小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能够灭亡大而弱的落后国家。所以还須提出其他的根据，才能把一切亡国論者的口封住，使他們心服，而使一切从事宣传工作的人們得到充足的論据去說服还不明白和还不坚定的人們，巩固其抗战的信心。”（同上书第440—441页）当然毛主席的这些話是对某一个具体問題的論証，但它却具有理論上的普遍意义。如果考慮到毛主席的这一指示以及毛主席接着对这一具体問題的闡述，形式邏輯規律中的充足理由，就應該有更丰富的意义。它固然不能代替具体科学的任务，但是也要符合唯物辯証法的要求，这样，传统的解释就不见得能满足这个要求，而必須加以充实了。

上举各点說明对于形式邏輯的規律必須根据现代思维水平加以概括。究竟应当怎样概括，固然要根据馬列主义經典作家的著作去进行探索，但是無論如何，我認为，总不免要涉及辯証的因素，恐怕是无疑义的。

結合现代思维对形式邏輯的內容进行这样或那样的研究和修改，会不会使形式邏輯辯証化而导致取消形式邏輯？照我的看法，这是不必要的担心。从主要方面說来，我們并没有要求形式邏輯揭示事物內在的矛盾，并没有要求取消形式邏輯与辯証邏輯两者之間眼界的区别，并没有要求否定思维的确定性、一贯性、論証性原則，而只是要求在辯証法的指导之下，来理解这些原則，这是作为思维規律所必要的，它只是更深刻闡明思维規律的問題。从另一方面來說，既然在思维反映现实的过程中，只有依照辯証法的規律，才能获得确实的知識，辯証的規律起主导作用，形式邏輯的規律只能起輔助作用，那么，使形式邏輯的規律服从辯証規律，就未必不是合理的了。既然形式邏輯的規律，

不是不辯証的，它具有潛在的辯証法因素，那麼，使這些潛在的因素由比較的隱藏到比較的明顯，也不是不可容許的。既然認識是一個過程，而形式邏輯與辯証邏輯又共同處在一個統一的过程之中，那麼，要求它們之間有絕對不可超越的鴻溝，在形式邏輯中排斥辯証邏輯的因素，看來也是不可能的。

以上的意見，可能很多錯誤，請批評指正。

我看“論”“史”結合

會 慶 鑒

所謂“論”和“史”的關係，也就是怎樣正確處理馬克思列寧主義一般原理與歷史實際的關係，以及怎樣正確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研究歷史的問題。這個問題人們談得很多，其中有些作了科學的正確的闡述，有些看法則是值得討論的。

例如有人主張“研究歷史不一定要用階級分析方法，如果能把歷史實際講出來就更好”。他們並且認為：歷史材料才是真材實料的东西，做史料研究才是真功夫，才有“永恆的價值”，而什麼立場、觀點、理論分析，都不過是“一時有用”而已。這種看法如果把它說穿了，不外只是兩個意思：第一，就是主張研究歷史不必應用階級分析的方法，無產階級的立場觀點也是“可有可無”，從而否定歷史科學的階級性。第二，就是主張論史分離，觀點與材料相對立，從而否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對歷史研究的指導意義。

我們認為，歷史科學是有階級性的，研究歷史必須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必須應用歷史唯物論的方法。究竟是主張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研究歷史，還是主張“超階級”而實際上是以資產階級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研究歷史？這是我們必須嚴肅考慮的問題。

歷史的事實告訴我們，古往今來的史學都是有階級性的。生活在階級社會里的歷史學家，不管他們是自覺或不自覺的，也不管他們敢不敢或有沒有公開聲明，但他們都是屬於一定階級的人，並為一定的階級服務，他們的史學也就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從史家和史學的角度來說，所謂階級立場觀點問題，依我膚淺的理解，即是說他們為什麼寫歷史，用怎樣的史觀寫歷史，所寫的歷史是為誰服務的。以這個尺度來衡量，就不能認為生在奴隸制社會時代的孔子及其所著的《春秋》是超階級的；就不能認為他是完全站在所謂客觀的立場上不偏不倚地來寫《春秋》的，就不能認為他所寫的《春秋》不是為維護統治剝削階級的利益服務的。我們知道，孔子在其“正名”思想指導下所作的《春秋》，是要“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是要“寓褒貶，別善惡”，是要“為尊者諱，為親者諱”，是要“使亂臣賊子懼”，是要“以達王事而已矣”。《春秋》的性質和作用，若以司馬遷的話來總括它即是：“春秋辨是非，故長于治人”，

“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乎春秋”。所以連孔子本人也說：“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这就无怪乎历代封建統治者为什么要把孔子称为“圣人”，把《春秋》称为“經典”了！如果象有人所认为的那样，研究历史可以不用阶级分析，孔子的史学也是超阶级的，那么，我們如上所举的史实又将如何解释呢？再以古代最伟大的史学家司馬迁及其所著的《史記》为例來說吧！他的史学虽然尽管有其創造性、进步性的一面，但司馬迁之所以要写《史記》，主要仍然是为当时的統治阶级服务，这一点他本人在回答壶遂問他为什么要写历史的时候說的清清楚楚，他說：“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誦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載，灭功臣世家賢大夫之业不述，墮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史記·自序》）难道这还不足以說明司馬迁是很自觉地要为所謂“至明天子”以及“功臣世家賢大夫”載“功”載“德”的嗎？而且他还认为他如果没有这样做的話倒是有“莫大”的罪过呢！如果是連古代的历史学家都不諱言自己治史的目的和为之服务的阶级，那末，生活在今天的那些认为历史研究可以“超阶级”的人，岂不是在自欺欺人嗎？

大家知道，毛主席在《实践論》一文中是这样来概括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与历代史学的根本的不同的，他說：“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內，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剝削阶级的偏見經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一方面，則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們的眼界。人們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認識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時候，这就是馬克思主义的科学。”（《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2頁）毛主席在这里不仅完全正确地論断了历代史学的性质，同时也十分明确地告訴了我們，史学要成为一門真正的科学，这只能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科学。而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科学的特点是在于：一方面它是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辯証唯物主义的理論和方法为基础，另一方面它公开申明是要为工人阶级改造世界、改造社会的革命事业服务。

因而，我們研究历史就必须坚持論史結合、观点与材料統一的原則。毛主席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諄諄地教导我們要“……学会应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認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經濟、政治、軍事和文化，对每一个問題要根据詳細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論性的結論来。”（《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6—817頁）他在《改造我們的学习》一文中又說：“而要这样做，就須不凭主观的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詳細地占有材料，在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結論。”（《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1頁）这些道理，依我粗淺的領会，它的主要意思有两方面：一方面是要要求我們研究历史必須正确地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另一方面是要要求我們必須做到观点与材料的統一。而要做到这一点，一者要有正确的立场观点和認真学好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著作；一者要踏踏实实地来钻研历史，掌握大量的必要的可靠的

历史材料，两者缺一不可。不重视史料固然是不对的，而否定馬克思列宁主义学說的指导作用就更为錯誤的了。

古代的历史学家尽管不一定具有这种自觉，但历代史学的内容几乎都是有論有史、有观点有材料的。一方面，即所謂“論載”，如《左传》的“君子曰”、《史記》的“太史公曰”、《汉书》的“贊曰”以及其它史书中的“史臣曰”等等都称为論。这些史书从我們今天的眼光来看，虽然主要仍是一些史料堆积，但其中还是有評論有結論的。另一方面，即是說历来史家写历史都是受他們的观点所支配，如司馬迁写《史記》虽然声称“余所謂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謂作也”；但也強調“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再如杜佑編纂《通典》的观点，也是十分鮮明的，他在序文中說：“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夫行教化，在乎設官职；設官职，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先哲致治之大方也。故职官設，然后兴礼乐焉；教化驟，然后用刑罰焉；列州郡，俾分領焉；置边防，遏戎狄焉。”因此，他采用了“以食貨为之首，选举次之，职官又次之，礼又次之，乐又次之，州郡又次之，边防末之”的次序排列。

其实，在当代历史研究中的“重史輕論”或要史不要論的观点，实质上都是为了抗拒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指导，以便为其资产阶级的唯心史观大开方便之門，如此而已。

广东历史学界就刘节的《怎样研究历史 才能为当前政治服务》一文的观点展开討論

本刊今年第二期发表的关于学术研究方法論問題的七篇討論文章，其中有六篇文章的作者，从不同方面論述了在学术研究中坚持阶级分析方法的重要性，对于这个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性重大問題，刘节教授持有不同的看法，他在《怎样研究历史才能为当前政治服务》一文中，提出：“阶级斗争的理論用之于当前政治是切实有效的，用以解释古代历史事件，是不是可以不要这样教条化，机械地利用起来呢？这确实成为問題。”

刘节提出的实质上是否認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斗争理論和阶级分析方法适用于指导研究历史的这个观点，引起了广东历史学界的广泛注意。广东历史学会首先在中国思想史組方面开展了这一方法論問題的討論，接着，华南师院、暨南大学、中山大学等高等院校历史系在今年五、六月間也都分别进行了討論。

在这些討論会上，主要是探討了阶级分析方法是否适用于研究古代历史及历史人物的問題，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的关系問題。許多人从自己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体会出发，从教学和学术研究中怎样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的实践出发，从具体探討孔子及其思想学說的阶级性出发，本着追求真理的精神，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对刘节这个观点，展开了不同意见的論争。許多人在发言中一致認為，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是历史研究的根本方法。只有通过阶级分析，才能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規律，才能看出复杂的历史事变的真相，才能認識各种各样思想学說的本质，才能知所批判、有所继承，才能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如果在历史研究中，否認和拒絕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那就必然得出与上述完

全相反的結果，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作了歪曲。因此，在历史研究中要不要階級观点与階級分析的問題，乃是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的根本分歧問題，實質上也是无产階級与資产階級在历史科学領域中两条道路的斗争的問題。

在討論会上，許多人还就刘节提出的孔、墨思想研究中的一些主要問題进行商榷。中山大学戴裔焯教授說，古代社会的思想家虽然没有明确的階級观念，也没有公开声明自己站在哪一个階級的立場上說話，维护哪一个階級的利益，但階級的存在是客观的事实，不承认这一点，就是不承认有階級社会。既然有階級存在，人們就会各有自己的階級立场，我們就应该运用階級分析的方法，去研究生活在階級社会中的人們的思想、学說和行动。例如，忠、孝、仁、爱在不同历史时期就有不同内容，如果把它看作是超階級、超时间的，就是抹煞了它在每一个时期所赋予的具体内容。暨南大学丘陶常副教授說，孔子提倡孝、悌、忠、恕是有其思想內涵和階級内容的，是有所为而发的，是站在剝削階級立场，为剝削階級服务的。我們只能循名責实去研究孔子的“仁”的学說，而絕不能把它的“实”任意抽掉，只剩下一个空空洞洞的“名”。中山大学陈玉森讲师說，我們的“仁”，与孔子的“仁”，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孔子的仁有他的具体内容和狭义性，离开孔子一貫的东西——孝、悌来談仁，就不是孔子的仁，因此，把孔子的仁与无产階級的階級友爱等同起来是沒有任何根据的；孔子的爱是由亲及疏的，无产階級的爱是階級友爱，是爱憎分明的，不能由亲及疏，实行毫无原則的爱。又如，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仅是不能用于我們的階級敌人，即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也是不适用的。举例來說，如果有人不愿意进行批評与自我批評，难道可以要別人也不要进行批評与自我批評嗎？青年讲师曾庆鉴說，不用說，我們从来就是主张用馬克思主义的階級分析方法來从事历史科学的研究的，就是中国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历史家，虽然他們不可能掌握馬克思主义的階級和階級斗争的学說，但也沒有把孔子的学說看作是超階級的。例如汉朝的司馬談在論六經要旨中就談到孔子学說是“叙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分也。”可见孔子的学說是为当时的統治階級服务的，怎么能說孔子是沒有什么階級立场的呢？怎么能說孔子学說是沒有階級内容的呢？梁劍鞘副教授說，孔子时代是階級社会，就有階級斗争，而孔子的学說也的确反映出了当时的階級斗争，这怎么能够說研究古代历史可以不要运用階級分析方法呢？这怎么能够說运用階級分析方法去考察古代历史事变的真相和各种学說的階級实质就不是科学的方法呢？如果按照刘先生所說的不要运用階級分析方法才能把历史事实的真相写对，那末，这样的历史真相究竟是什么东西就不言而喻了。华南师院关履权副教授說，在历史研究中，階級观点与历史观点是統一的，而不是互相排斥的，因为我們在运用階級观点和階級分析方法研究历史的时候，自然也包含了历史观点，那种脫离階級观点而空洞地談論什么历史主义的人，事实上就是客观主义者。徐光仁教授說，研究历史是不能脫离階級分析法的，只有把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紅旗插到历史科学領域中去，才能够做到古为今用，才能够为无产階級政治服务。否則，不独无益，而且有害。

在广东历史学会和中山大学历史系先后举行的討論会上，刘节教授一再申述他自己的见解，坚持自己的看法，并从各个方面加以补充發揮。这样，經過了討論会的广泛討論，对于这一問題的看法上的分歧更加明确，有利于把問題的討論引向深入。

广东史学工作者十分重视这一問題的討論，大家認為必須按照党的百家爭鳴的方針，进一步开展討論，以辨明是非，坚持真理。广东历史学会将根据史学界的要求，繼續組織关于方法論問題的討論。

（谷风）

广东古典文学研究工作者座谈如何批判地

继承文学遗产问题

根据全国文联三届全国委员会二次扩大会议关于正确地对待文化遗产的精神，广东部分古典文学研究工作者应邀参加了讨论如何批判地继承文学遗产和交流这方面的情况以及研究成果的座谈会。座谈会是由广东语言文学学会筹备委员会与《学术研究》编辑部联合召开的。

出席座谈会的有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学院、广东师范学院、省文史馆及其它单位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和教学工作的同志二十多人。会上，发言热烈，广泛交换了意见。廖苾光、黄海章、吴宏聪、吴剑青、刘日波、詹安秦、吴文辉等作了书面发言。

座谈会上，大家认为，在党对文学遗产批判地继承的方针指导下，几年来广东古典文学研究工作是有成绩的；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如怎样对待精华与糟粕，特别是如何对优秀文学遗产进行批判继承的问题。会上，就这些问题交换了意见。

大家认为，从中外文学遗产中，用批判的观点，来划清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比较容易，但从某一优秀古典文学作品，或一个作家的全部作品来考虑精华与糟粕，是比较困难的，在这个问题上混淆的比较多。刘日波、吴宏聪等指出，例如对杜甫的研究，就很少提到杜诗的糟粕。其实，杜诗中至少是排律部分，就有不少糟粕。那些奉赠应酬的东西，不但谈不上思想性，而且艺术性也并无可取之处。李商隐的诗，不论思想性、艺术性，都有好坏两方面。我们对李诗的评论文章，说好话多，有时虽也指出他的一些缺点，但总是蜻蜓点水式的。对有些作品，片面强调艺术性，忽视思想性，甚至如六朝宫体诗也赞美一番，而对优秀作家的作品更是前代人是一片叫好，我们今天也照旧一片叫好，例如对李白的七绝，就有这种情况。近年来，对《文心雕龙》的研究，也同样存在精华与糟粕分辨不清的情况。

在谈到怎样对待文学遗产中的精华问题时，有的同志认为，对优秀文学遗产的研究，不仅是为了给予历史的评价，更重要的是要正确估计它在今天哪些是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工农兵的积极因素，哪些是起了相反作用的消极因素，以求达到古为今用，外为中用。那种认为用时代精神和要求来批判过去时代的文学遗产就会与历史主义有矛盾的看法，是对历史主义的误解。无产阶级的历史主义观点也就是历史发展的观点，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一切文学作品都是一定时代的一定历史条件下社会生活的反映，时代前进了，历史条件改变了，作品的社会意义和作用也必然随之而起变化。因此，评价文学遗产，一方面要分析作品在它产生的时代所起的社会作用，一方面又要研究它在不同时代所起的不同作用，特别是它在社会主义条件所起的作用和可能起什么作用。在谈论这个问题中，发言者列举了一些中外古典文学作品，进行了具体的分析。

有的同志的发言，还从当前国内外阶级斗争思想斗争的形势来考察对优秀文学遗产批判的重要性。他们指出，现在阶级斗争还严重地存在着，资产阶级思想、封建主义思想还有广大市场，它侵袭和腐蚀了一些人，特别是青年人。这样，加强对优秀文学遗产中可能产生形形色色的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内容的批判，就显得十分必要了。优秀的中外古典文学作品，一方面，我们不仅要出版，而且要推荐给读者，可是，就算是最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也含有某些消极因素，会产生消极影响；另一方面，越是优秀的作品，越广为流传，影响愈大，读者警惕性愈低，对其中消极的东西，越容易受迷中毒，例如脍炙人口的《聊斋志异》也有宣扬相信鬼神、宿命论思想的东西，这些东西，在封建迷信的根子未除的人，就会发生有害的影响。有些人正是把古典文学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方式，当作自己“生活的教科书”，模仿书中人物的错误行为。所以，引导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正确地对待优秀文学作品中反映的思想意识、社会生活方式是十分必要的。这种“消毒”工作，也是文学教学工作者、文学研究工作者的责任。

与会者对上述问题的讨论，都很感兴趣，广东语言文学学会筹委会将继续组织一些座谈会，以便进一步展开关于批判地继承文学遗产问题的讨论。

学术研究

一九六三年第四期（总第十期）八月五日出版

編輯者	学术研究編輯委员会 广州越秀北路222号
出版者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刷者	广东人民印刷厂
发行处	广东省广州市邮局
訂购处	全国各地邮局

本刊代号：46—3 定价：每册0.50元
本刊每逢单月五日出版